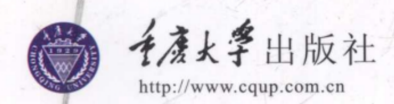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解释互动论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诺曼·K. 邓金 著
周 勇 译
刘良华 校



J I E S H I H U D O N G L U N

■ 为了保持本书作为经典的生命力，在上一译本——《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组织译、校者经过进一步加工处理，推出该书的新译本，并更名为《解释互动论》。

■ 作者从解释互动论的视角，尝试将普通人问题重重的生活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互动论者所要做的即是去解释生活世界的种种意义与表象。该项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则包括表演性文本、自我民族志、诗歌、小说、开放的创造性访谈、文献分析、语义学、生活史研究、自我故事、参与式观察和深度描述等。

■ 本书以下面三点假设作为谋篇布局的基础：第一，在人类经验的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第二，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人们就可以达成理解，那些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也能得以更加有效的实施。第三，所有的解释都是暂时性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本书鼓励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解释互动论到底是指什么。

发表及参阅相关讨论，请登录：

万卷方法与学术规范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4936-2



定价：25.00元

解释互动论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诺曼·K. 邓金 著
周 勇 译
刘良华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3)第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互动论/(美)邓金(Denzin, N. K.)著;周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8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ISBN 978-7-5624-4936-2

Ⅰ.解… Ⅱ.①邓…②周… Ⅲ.人际交往—研究 Ⅳ.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0991号

解释互动论
(第2版 校订新译本)
(美)诺曼·K.邓金 著
周 勇 译
刘良华 校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周 晓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7.25 字数:199千
2004年7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2版 2009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5 001—8 000
ISBN 978-7-5624-4936-2 定价:25.00元

作者简介

诺曼·K. 邓金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传播学、社会学及人文学科领域的资深研究员，已出版过许多专著，包括《解读种族：好莱坞与种族暴力电影》、《解释性民族志：21 世纪的民族志实践》、《电影社会：偷窥的目光——后现代社会的形象》、《研究行动：社会学方法论导论》、《解释互动论》、《好莱坞——一枪接着一枪》、《康复的酗酒者》、《酗酒者的自我》。由于在符号交往行动领域的学术贡献，邓金 1988 年获得查尔斯·库利奖，1997 年获得乔治·赫尔伯特·米德奖。他曾担任《社会学季刊》、《文化研究》（月刊）的编辑，合作主编者《*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本书中文版 2007 年初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质性探究》，此外，他还主编过“符号交往行动研究系列丛书”。

中文版序一

十字路口的社会学写作

近些年来，从历史、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角度对现代知识进行质疑的力度日益加深，许多人均不由自主地像福柯等人那样对现代知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厌恶与否定。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觉得，人文社会学者自身的社会位置与处境也逐渐由以启蒙大众自居于世的“立法者”变成了只能偏安一隅对自我进行启蒙的“解释者”，而一旦想去谋求更多的听众，就要么是空想，要么担心即使能这样做，也会被人认为是在追求“权势”。

在这种形势下，为什么从事社会学写作？社会学写作能够（或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故事”？便成了由于各种原因落入社会学领域的作者们必须予以深思的基本问题。总之，质疑现代知识并在质疑之后寻找合适的写作理由与主题（所谓“合适”是指能让人“心安理得”，甚至献出自己一生的探索热情），这一点可以作为理解邓金这部著作的精神前提。

从理论上讲，光是去质疑现代知识，而且不必像福柯那样，将对现代知识的批判隐藏在漫长繁重的历史探索之中，人文社会学者便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安排妥当，也就是一辈子只写批判现代知识的理论性著作。有些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因此成了以解构现代人文社会知识（或文本）著称于世的“后现代哲学家”。

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宣泄”长期以来在“现代性的生存结构”中苦苦挣扎的压抑心情，而且能够“避免”承受那些“玩世不恭地或是真诚地转向右派”（伊格尔顿语）的人们所承受的公共舆论压力，始终以“精神界战士”的形象保全自己。然而，这样做却无法省略另一种顾虑，这就是可能会让人觉得没有创作出真正具有建设意义的作品，为人们提供另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邓金的选择非常清楚，他不仅要去批判现代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现实主义探索生产现代知识体系当中没有的知识。他说："我们想去搜寻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成功，理解他们曾经有过的创伤、恐惧、焦虑、梦想与希望。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平凡却意义丰富的故事。无疑，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解释计划，而我们所要承受的挑战也很清楚，这就是描述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并将这些历程'表演'出来"。我们之所以给邓金的著作加这样一个标题——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正是为了点出邓金的求知兴趣。

由于是写一本侧重于方法论的专著，邓金并没有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一些普通个体的生活经历及其意义，而只是在论述的过程中，不时点缀一些人的经历片段，其中有挨打的妻子、酗酒者等——尽是些在公共领域没有发言资格的普通大众。邓金对这些人有过专门的研究（Denzin，1987a，1987b，1987c），在他看来，任何旨在帮助他们的社会计划都必须以对他们的真正理解为基础，而许多社会计划之所以会失效，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一点。

借助于"解释互动论"，邓金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理解方式，一种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常规解释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尽力让生活世界中的"沉默者"（这些人要么不在社会科学中"出现"，要么出现了也是扮演一个"沉默"的"任人宰割"的无名者）自己开口说话，说出自己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至于如何进行这种社会学写作实验，邓金在这本专著以"深度描述"的方式对每一个步骤做了详细介绍，虽然这样介绍方法，会让读者觉得过于罗嗦了一点。

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邓金在这部著作中更是对当前的一些批判话语做了归纳，他似乎想在读者心中掀起新一轮的"讨伐"热情。但是，就国内的阅读走势而言，真正能够刺激人们感情的内容或许是他对格尔兹等人的批判，因为格尔兹这些人在国内许多读者当中正被树立为新的

知识偶像。然而，邓金的批评却恰恰要给国内这些读者（包括译者在内）泼一盆冷水，从而提醒我们去思考，格尔兹等人究竟在解释什么，他们是如何做解释的，以他的方式真能将“巴厘岛人的故事”及其“意义”叙述出来吗？

邓金认为，即便是善意对待当地人的格尔兹也是在“自言自语”，也没有在自己的解释人类学作品中给当地人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的确，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或许觉得邓金的论述伤害了自己的感情，因为他居然毫不客气地说：格尔兹的解释“都是格尔兹本人对于斗鸡的理解，巴厘岛人并没有把这些意义带入自己的斗鸡游戏中”。“格尔兹的解释也因此远离了巴厘岛人斗鸡的真实体验”，是“格尔兹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当地人的经验上”，“这是一种独白性的解释”。

从邓金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不是由帕森斯式的社会学概念构成的，也不是由解释人类学家的诗意想象与感受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一个的普通个人的活动、言语、思想、情感构成的，是一幅复杂的交往画卷，社会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如实地描绘这幅画卷。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邓金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列举文学、诗歌、艺术、新闻、电影等领域的叙事方式，因为这些“表演性”的叙事手段最能揭示“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

从邓金的叙事目标出发，人们很自然地还会怀疑起韦伯、福柯等人的现代性研究，甚至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揭示现代社会的生活真相，而只是以学术话语叙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会。可是我们这些人早已习惯了顺着韦伯、福柯等人的体会来理解现代社会，这怎么办？也许今后为了进行社会学研究，人们必须“抛弃”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学知识”，这似乎恰恰就是邓金所要完成的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还原或概念悬置。

但是，另一个问题随之也会产生，真的抛弃了“社会学”，必然会“惹怒”，乃至必须被迫离开社会学体制，接着又会被社会学体制相关的社会体制驱逐，成为一名自由的现实主义“作家”或出没于地下的“歌手”，他们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故事,用来写作或歌唱。那么,社会学家有勇气面对这一可能"失宠"的命运吗?邓金估计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解释互动论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因其学术理念违背了社会科学领域诸多科学主义研究传统的意愿,只有那些钟情于质性的解释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可能会使用本书中所讨论的方法与策略"。

有意思的是,在极力"背叛"传统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解释性的研究者并不一定会落得个无所依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所起用的那些新方法有可能将他引入另一个文化群体当中去,研究者甚至会主动加入另一个文化群体,这个群体正是所谓的由作家、记者、导演等组成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邓金没有直接表明对这一群体认同立场,但是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他的方法论偏好中揣摩出这一点迹象来,这就是关怀普通大众命运的解释性研究者在文学、媒体以及影视界比在社会学界更能实现自己的叙事抱负。

最后说一下,译者最初知道邓金,是因为读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的著作《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第 493 页)列有 4 本邓金的专著,但是这本著作没有列上去。而译者之所以答应翻译此书,除了深受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雷少波先生的热情鼓舞之外,还因为第一次打开邓金的这本书时,看见里面频繁出现叙事、故事等词语,亲切感油然而生;恰巧我的导师丁钢教授也在国内教育学界提倡"叙事转向",致力于揭示普通教师或学生的生活感受(参见《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 1 ~5 辑),故而决定翻译此书。

丁钢教授常对我说,叙事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天赋"。对此,邓金似乎亦是持赞同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里,时常流露出对一些文学大师(包括福克纳、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钦佩,钦佩他们对于普通人物的生活经验的"深度描述"能力,尤其是福克纳,邓金更是反复挂在心头。这让我想起了国内一位同样非常钦佩福克纳的作家余华。他曾谈起自己的阅读体验,说"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而他自己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何尝不是能给读者带去

类似的体验。

事实上，就国内早期的社会学而言，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以及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叙事风格上都能给人一种亲切感。也许这里的关键仍在于社会学写作究竟要去表达什么，是把握并规划某一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还是倾听并理解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带来轻松的学术生活。

周　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版序二

我以前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里读过邓金撰写的一个词条"传记研究法"。[1]大体知道这个人是"传记研究"的倡导者。后来因为整理"叙事研究"的资料，查找到邓金的另一本书——《解释性传记》[2]。我个人对邓金的了解，止于这些。

去年在"学而优书店"买到邓金的《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本书上一译本的书名——编者注），断断续续看过一遍，在书上做了一些简单笔记，总体上感觉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比较琐碎。

这两天重新阅读这本书，主要的原因是忽然记起来：这是周勇博士翻译的书。

在上海读书时，周勇博士是我的同学，我是98级，他是99级。这个人在学生期间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才华。

我特意查看了他写的"译者前言"。他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本书的推崇。在他看来，格尔兹可能错了，而邓金是对的。

我以前读过格尔兹的两本书，对格尔兹比较有好感。如果确如周勇博士所介绍的那样，邓金的这本书就一定值得阅读。

现在看来，这本书确实不错，尽管在这本书中，邓金对格尔兹的态度并非周勇博士在"译者前言"里所说的那样反感。

邓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些关于"叙述"与"解释"的说法，有些说法是常识，有些说法超出了常识。

对做叙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关于"叙述"和"解释"的说法是值得"倾听"的。

如何"叙述"？如何"解释"？我感兴趣的部分包括以下几点：

---

1. (Denzin, N. (1994). Biograph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Husen, T. & Postlethwaite, T.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Elsevier *Science Ltd.* 2nd. ed. vol. 1; Erben M. (ed.) (1998). *Biography and Education*: *A Reader*, Falmer Press.)
2. (Denzin, N. (1987)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1. 访谈是让沉默者发出声音,采访者的任务是开启并倾听、记录。

下面这段文字究竟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是一首诗(本书35页):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对此事进行投票表决
我记得
这事太愚蠢了
你记得你是怎么想的
而不是你说了什么
我说
好吧,我们只是晚了12年
开始吧
我说了些愚蠢的关于女人的事情
比如,我受人尊敬
我坐在那对自己说
这将是历史性的
我们正在做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当然这事不会立刻发生
在董事会之前
还召开过社区会议
其中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来自大学居住区的家长
我们回见了马丁学校的人
想起来真是可怕
我们坐在前面

董事会、大伙
问我们问题,然后他们
态度变得有些恶劣

其实，这是一段采访中的谈话。是被采访者的言说，采访者的任务是倾听，然后把听到的话记录下来。

记录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写成一段话，一句话与另一句话之间用逗号或句号隔开。另一种形式是整理成为一首诗的样子。尽管很少有人会采用诗的格式来整理访谈的内容，但邓金采用了。

2. 叙事是一种描述，不要过多地议论和解释。

邓金说：至于不能科学解释的现象则应照维特根斯坦默的教导，对其“保持沉默”（本书第 52 页）。

维特根斯坦的原话是：“凡能够言说的，能说清楚；不能言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叙事研究的醒世名言。

3. 深度描述的类型

邓金将“深度描述”分为以下几种：“微观的、宏观的历史性的、传记性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插入式的、不完整的、概括性的、纯粹描述的、描述性与解释的。”（本书第 116 页）

按照我个人的框架来看，邓金所列举的几种深度描写及其相关案例主要显示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历史事件”的深度描写。典型的例子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有关公共刑罚——一名遭受酷刑的试图谋杀法国国王路易的男子——的深度描述（本书第 124 页）：

> 1753 年 3 月 2 日，达米恩因试图谋杀国王被判处“在巴黎大教堂正门前公开认罪”，他“必须乘坐囚车，身上只穿一件囚衣，手拿两磅重的蜡烛”……等到了酷刑台，烧红的铁钳将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然后四马分尸，直到焚尸扬灰……监斩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刽子手卷起

袖子，拿起铁钳……先将右边的小腿肉撕开，接着是大腿……然后是胸膛……达米恩哭喊到……“宽恕我吧，上帝”。

邓金认为：“和栩栩如生的深度描述相比，浅度描述可能只会对这一事件做如下简单的交代：1753 年 3 月 2 日，达米恩因试图谋杀国王被判极刑（而福柯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述这一事件）。”（本书第 117 页）第二是现场的“田野事件”的深度描写。典型的例子是格尔兹的“逃离巴厘岛混乱的斗鸡场面”（本书第 118 页）：

整整一车全副武装的警察开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的尖叫声。警察纷纷跳下车……人们夺路逃去，许多人撞上了墙……我和妻子决定……也和大家一起选择逃命。我们沿村里的大道逃去……半路上，遇到另一个逃散者……我们在他后面跟着……（过了一会儿）那位逃散者的妻子（她很熟悉这种场面）搬来一张桌子，上面铺着桌布，然后又弄了三张椅子和三杯咖啡……我们坐了下来……尽力让自己恢复平静。

邓金认为：“与之相比，浅度描述可能只是这样交代一句：警察一来，我和妻子便开始逃离现场，接着我们和当地的一对夫妇喝起了咖啡。”（本书第 119 页）

第三是微观的个人生活史的深度描写，也可称之为“传记叙事”。典型的例子是福克纳笔下的“威尔·瓦纳”（本书第 125 页）：

威尔·瓦纳，这块土地的主人（这块土地原先是法国人的地盘），本县的头头，他是本县最大的地主和最有权力的人，并且是临县的政府特派员，主持当地的和平与公正。对村民来说，他说的话即便不能算是法律，至少也是忠告和建议……他又瘦又高，像根竹竿似的，一头红灰色的头发，嘴边的胡须也是红灰色的。他是农民，高利贷者，还是

个兽医。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精明能干，城府极深，但看上去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有一种拉伯雷式的幽默，并且仍然是个好色之徒（他让老婆为他生了16个孩子）。

除这三种深度描写之外，邓金还提到一种“插入式的深度描述”，即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研究自己的“解释”。邓金仍然选择了格尔兹的例子（本书第128页）：

斗鸡犹如血淋淋的戏剧表演，在其中，人性与兽性、善与恶、自我与本我、积极的力量与本能的破坏交织在一起，将人类社会的仇恨、残忍、暴力与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

格尔兹在下一页里继续写道（本书第128页）：

多数情况下，怒火冲天的公鸡每扑打一下翅膀，每啄一下，每踢一下，便会高高跃起一次，它绝对是以自己的壮美方式象征性地为什么是仇恨做了一次柏拉图式的诠释。

邓金承认格尔兹的解释是一种有意义的叙事类型，不过，邓金多少有些不满地指出：“这些都是格尔兹的解释，而不是当地斗鸡人的看法，也就是说，读者并不知道巴厘岛人在斗鸡时是如何想的，结果当地人的观点在文本中消失了。格尔兹希望读者像他那样理解斗鸡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斗鸡的描述，读者只能读到格尔兹本人的话语。”（本书第128-129页）

所谓“结果当地人的观点在文本中消失了”云云，显示邓金对格尔兹的解释确实有些不满。不过，邓金更不满的是格尔兹的另外几段解释（本书第150页）：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上演斗鸡，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而巴厘岛人也随着斗鸡表演一遍又一遍地被人们阅读。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通过自己的悲剧表演向我们展示其主体性，巴厘岛人也通过斗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的社会

习俗。

邓金的质疑是："这段叙述表达了什么意思？格尔兹将斗鸡文本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做比较，并且认为它们均向读者表达了某种可以理解的主体性。那么，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事实上，这些解释都是格尔兹本人对于斗鸡的理解，巴厘岛人并没有把这些意义带入自己的斗鸡游戏中。"（本书第150页）

针对格尔兹的另一段解释，邓金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格尔兹的解释是（本书第151页）：

> 1）斗鸡者越是了解斗鸡……就越能在斗鸡中取得领先……就越能挑出最好的斗鸡。
>
> 2）斗鸡者在斗鸡过程中的情绪越是高涨，就越是投入斗鸡，其好斗之心就越是坚定。

格尔兹的批评是（本书第151页）：

> 在这段解释中，包含一些值得商榷的描述，诸如"了解"、"最好的斗鸡"、"情绪高涨"、"投入"、"坚定"，格尔兹并没有解释他们的意义，而格尔兹的解释也因此远离了巴厘岛人斗鸡的真实体验。
>
> 格尔兹的这段解释有点断章取义的味道，而且一点人际交往关系的描述也没有，这是一种独白性的解释，其中根本听不到当地人的声音。它也不是对话性的，因为格尔兹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当地人的经验上。格尔兹觉得这些解释如实反映了斗鸡的形式与内容，但事实上，他忽视了当地人的斗鸡描述与解释，也就是说，关于斗鸡，我们只能得到格尔兹的理解和解释。

这样看来，邓金对格尔兹的解释确实有些不满，甚至有点忿忿不平。

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断定"邓金反格尔兹"。

在这本书中，邓金不断引用格尔兹的研究成果，处处显示邓金对格尔兹本人的推崇和尊敬。这与格尔兹的研究品质有

关:他的研究既有深度描述,也有相关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兼有独白式的解释和对话式的解释。

对于格尔兹的研究,邓金虽有微词,但总体上看,邓金对格尔兹的研究是赞赏多于挑剔,满意多于不满。

何况,邓金称格尔兹的解释是独白,也不见得公允。邓金主张研究者为"描述"提供"解释"时,研究者的解释应更多地反映当地人的经验和看法,这是对的。但是,研究者是否就完全不能表达研究者本人的经验和看法?这也难说。

刘良华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英文版前言

1989 年，当本书第 1 版公开发行时，关于质性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可以找到大量的社会科学文献，但在"解释性"的方法方面却看不到任何深入的讨论，也没有提出什么存在主义的观点（参见 Douglas & Johrlson，1977；Kotarba & Fontana，1984）。至于运用解释性的方法来研究个人问题，或者通过这种方法转向考察交往个体的生活，同样也看不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尝试。本书的推出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状况。[1]在这部著作中，我结合自身及其他人的探索实践，向人文学科的学生和学者以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方式描述了批判性的并且带有存在主义味道的解释性方法。[2]

新版延续着初版的主题。1989 年以来，质性研究领域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解释互动论在这次（方法论）爆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事实上，它可以归属于一场更大的由改革主义者发起的理论运动，该运动至少在二十多年前即 1970 年代就已开始。正如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乃是各种复杂的认识论及道德主义的批评一样，解释性的批判性范式及其多元表现构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Schwandt，2000，p. 189），它们拥有自己的学术期刊、研究协会、各种学术会议，并在大学里获得了教职（Denzin & Lincoh，2000c，p. x）。目前，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已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包括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工作、广告学、市场学以及消费者研究。

---

1. 同年，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解释性的传记》（*Interpretive BiograpAy*）的相关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从传记、生活故事出发，深入探讨了解释性方法的意义。将近过了 10 年，我又推出了《解释性的民族志》（*Interpretive Ethnography*），以求深化早年出版的这些著作，其中特别关注我们书写文化的多重方式。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两卷本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的理论框架（Denzin & Lincoln，1994，2000a）。
2. 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或方法，解释互动论已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兴趣与关注（对此，可以参见 Carspecken，1996；Charmaz，2000；Coffet，1999；creswelll，1998；Flick，1998；Hollway & Jefferson，2000 Schwandt，1994）。

20 世纪 90 年代，质性探究领域掀起的强劲变迁势头在新的世纪里仍在持续。今天，几乎没有人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叙事转向。相反，许多人都在各自领域里讲述故事。此外，写作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单纯、呆板的活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写作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社会学与人类学不断地尝试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有的甚至写起了小说、戏剧、表演文本和民族志诗歌（ethnographic poetry）。社会科学杂志也因此在举办各种小说创作竞赛。市民社会的新闻记者也在试验不同形式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呼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持续回荡，声势越来越大。有的学者称此为探究的"第七时刻"（"The Seventh Moment" of lnquiry，Denzin & Lincoln，2000b，p. 2，12）。[1]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时刻，其意思是指人们纷纷从传统中突围出来，致力于倾听以往只能归于沉默的声音，转向各种表演文本，同时关注各种道德话语，强调在民主、种族、性别、阶层、国家、自由以及社区等层面展开批判性的对话（Denzin & Lincoln，2000，p. 1 048）。

在这个第七时刻，在 21 世纪伊始之际，从事批判性的解释性的质性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成这个世界朝积极的方向转变，是作为解释互动论者的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言外之意，我们需要将各种批判质性研究的新颖方式置于自由民主事业的中心位置来加以审视。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1959）中，米尔斯向人文学者发出了挑战，呼吁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常规态度，以便有能力考察经验世界中出现的各种私人困境与公共话题以及公共领域对这些困境的反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此

1. 在过去的著作中，林肯和我曾对"第七时刻"做过界定，依次包括：传统时期（1900—1950）、现代主义时期（1950—1970）、类型模糊时期（1970—1986）、再现危机时期（1986—1990）、后现代或实验主义时期（1990—1995）、后现代实验时期（1995—2000）以及未来（2000—），参见 Denzin & Lincoln(2000b，p. 2)。

外,还可参见 Agger,2000,p. 265;Lemert,1997b,p. 161)。很明显,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在本质上乃是历史的、传记性和互动性的。

米尔斯非常清楚,人类生活在“二手”的世界中,存在决不仅仅是由互动作用或社会行动决定的,对此,米尔斯曾强有力地论述道:“既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也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在人的意识与其物质性存在之间,耸立着的乃是各种交往、图景、范式以及价值。正是这些东西对人类所拥有的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Mills,1963,p. 375)。人类无法直接进入现实。事实上,现实正是由各种位于人以及所谓“世界”之间的符号再现形式包括叙事文本、影视剧本等间接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将世界直接抓在手中,我们只能认识世界的各种再现。我们分析人们对自己或对别人表达自身经验的方式。经验表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诸如仪式、神话、故事、表演、电影、歌声、论文或自传。同样,经验也有多重表现,包括问题性的、日常性的、仪式性的、局限性的以及心灵发现和转折性的经验等。

米尔斯希望他的社会学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他鼓励每个人将历史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他试图将激进的民主意识注入资本主义的体制结构。虽然米尔斯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还没有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他的理论与方法,本书打算继续米尔斯的计划。

本书的视角是“解释互动论”。借助于这个略显笨拙的短语,我想尝试将普通人问题重重的生活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互动论者所要做的即是去解释生活世界的种种意义与表象,至于该项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则包括表演性文本、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诗歌、小说、开放的创造性访谈、文献分析、语义学、生活史研究、生活故事、个人经历及自我故事、参与式观察和深度描述。

从上面所列的那些方法来看,解释互动论无疑是在试验将传统的符号交往主义理论(Bruner,1969;Denzin,1969),与各种批判性的解释性探究联系起来。这些解释性探究形式包括反

思性的参与式观察与后现代及文化人类学(Angrosino & Mays dePerez,2000;Kincheloe & Mclaren,2000;Richardson,2000;Tedlock,2000),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批判性的种族理论(Frow & Morris,2000;Ladson-Billings,2000;Olesen,2000),酷儿理论(Gamson,2000),自然主义、建构主义和案例研究(Lincoln & Guba,2000;Stake,2000),诗歌、生活故事和宣言(Beverley,2000;Brady,2000;Tierney,2000),创造性的行动访谈(Holstein & Gubrium,1995),参与式的行动研究(Kemmis & McTaggart,2000),叙事、语义学、解释以及福柯主义的话语结构分析(Gubrium & Holstein,2000),以及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现象学著作(Heidegger,1927,1962;Gadamer,1875)。

对本书所探讨的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如果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解释互动论,可以参考我以前完成的一些著作:包括,《研究行动》(*The Research Act*,Denzin,1970,1978,1989b),《理解情感》(*On Understanding Emotion*,Denzin,1984a),以及我的有关美国酗酒者的三本专著(Denzin,1987a,1987b,1987c),此外,还有《解释性的民族志》(*Interpretive Ethnography*,Denzin,1997)以及我最近刚完成的一部著作《解读种族:好莱坞与种族暴力电影》(*Reading Race:Hollywood and the Cinema Of Racial Violence*,Denzin,2001)。

本书的结构

本书一共有8章。在第1章里,我将探讨与第七时刻的解释标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叙事与表演转向,与此同时,我还会给出一些范例,这些范例都取自我最近的一些著作。在第2章里,我会界定解释互动论,交代其基本假设与概念,其中我将详细讨论心灵发现这一概念。此外,我还会将解释互动论与萨特的过程性方法以及认识论的女性主义立场作比较,并联系福柯有关权力、话语、真理与知识等方面的观点。

第 3 章将探讨如何获得充满意义的个人经历故事，并分析其中的自我、叙事与各种恐怖处境。第 4 章讨论的是解释过程的基本步骤。在第 5 章里，我将探讨在当今"民族飘零"的日常生活背景下，研究者如何对自己的解释性研究进行场景定位，其中将讨论多重地域的民族志写作及自我民族志学者等问题。在第 6 章里，我将以格尔兹于 1973 年首次提出的深度描述为基础，对深度描述展开讨论，并将其看成是一种叙事策略。此外，我还会评论当前深度描述的各种使用情况及类型。第 7 章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进行解释，其中我尤其关注表演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我还会讨论其他一些书写形式，包括诗歌、分层文本和短篇故事。在第 8 章里，我会总结本书的主要观点，并强调解释互动论的存在主义特征及其与晚期后现代生活的关联。

本书是以下面三点假设作为谋篇布局的基础：第一，在人类经验的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第二，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探索目标，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达成理解，而且是更好的理解，与之相联系，那些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也能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第三，所有的解释都是暂时性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本书鼓励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解释互动论到底是指什么。

诺曼 · K. 邓金

致谢

我应该向下面这些人致谢，他们曾为这项写作计划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本书第 2 版得以于 1997 年面世，全是由于 Sage 出版社的 C. 迪伯拉·拉夫顿的辛苦筹划，她一直耐心地等着我完成写作。此次的修订本是以第 1 版为基础，因此我还得再感谢那些与初版写作相关的人。最初的计划是由莱昂纳多·比克曼提出来的，并且他还在计划构思及后来的修订过程中为我提供指导，没有他，第 1 版的写作便不可能顺利完成。在写作第 1 版肘，德布拉·J. 罗格和卡尔·J. 考夫曾先后让我陷入痛苦之中，他们竟把我的初稿和再稿给推翻了。当然，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让我有机会写一本更好的书。与戴维·R. 迈恩斯之间的讨论，帮我澄清了第 6 章里的许多想法。而罗伯特·斯塔克对于初稿的评论则使得我能够就质性评价研究这一主题提出更为深刻的观点。

杰克·布拉迪奇使得此次修订得以可能。他帮我找回必须的参考资料，恢复电脑里丢失的文档，从而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杰克和罗云·拜一起整理了全部的书目。手稿的校对工作则是由马克·尼姆科夫和米歇尔·伊拉夫斯基完成的。在 Sage 出版社，阿斯特里德·维尔丁帮我查找了诸多遗失的文档，同样是在 Sage 出版社，我还得感谢细心编辑此书的朱迪·席尔霍斯特。本书出版过程中，克劳迪·霍夫曼一直给予着关注，默里·霍尔为我准备了本书的索引。

像往常一样，我得感谢妻子凯瑟琳·E. 雷恩，正是她的善意幽默，使得我从未中断过这项写作计划。

诺曼·K. 邓金

伊利诺斯

目录

第1章 第七时刻的解释标准

Interpretive Criteria in the Seventh Moment

本章将探讨第七时刻的解释标准,其中涉及的主题包括:①何时使用解释性的方法;②评价的道德、伦理及美学标准;③道德批评及立场选择;④各解释类型之间的界限模糊化;⑤公共与亲近性新闻;⑥写作规范;⑦表演转向;⑧表演民族志;⑨表演性的解释。

这部著作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运用解释互动论，并将其当做一种批判性的质性研究模式。解释互动论致力于帮助读者理解经验世界的意义，把握、表达其所研究的各种声音、情感以及行动。解释研究的焦点所在是那些深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根本上改变或塑造了个人的自我概念，以及他(她)对自身经历所赋予的意义。

何时使用解释性的方法

在这一点上，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首先，何时应该使用解释性的方法？其次，怎样运用这种方法来评价各种旨在解决“真实生活”问题的计划？最后，研究者如何着手从事这种解释性的探索？

解释互动论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因其学术理念违背了社会科学领域诸多科学主义研究传统的意愿，只有那些钟情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可能会使用本书中所讨论的方法与策略。我坚信，少即是多，以此为基础，我所选择的方法自然会倾向于微观理论，其旨趣不在于告知(tell)，而在于展示(show)或表演(perform)。在我看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开诚布公，必须将自己的价值观交代清楚。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喜欢质性研究的学者都会使用我提出的这种方法。只有当他们想去考察个人问题(妻子挨打或酗酒)与各种公共政策及体制(它们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之间的关系时，才可能会采用本书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借助于个人自传，解释互动论所要阐述的正是私人生活与对个人问题的公共反应之间的内在关系。

就其应用价值而言，解释性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评价研究(Becker，1967a，p. 23)：

第一，它有助于研究者区分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及计划的不同理解。例如，它可以揭示受殴妻子如何看待社会公益机构为她们提供的各种保护、求助热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此外，通过个人生活故事以及生活经验的深度描述，研究人员还能够

比较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对象分析问题的角度到底有何不同。

第二，借助于解释性的方法，研究人员可以考察各利益群体（政策制定者、社会公益人员以及热线服务专家）到底持有什么样的假设（这些假设常常会被经验事实掩盖），进而分析它们的对错（Becker，1967a，p. 23）。

第三，研究人员可以顺着解释性的方法寻求介入社会情境的具体策略。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对各种机构及计划所提供的服务做出评价与改进。

第四，正是由于采用了解释性的方法，研究人员才有可能提出"关于某个问题的另一种道德观点"。各类政策及计划的解释与评价也因此才得以成立（Becker，1967a，pp. 23-24）。因为将重点放在了生活经验及其意义上，解释性的方法主张任何方案的评估都必须从最直接受到影响的那些人的观点出发。

第五，通过依靠解释性的方法，使用各种更具实质性的材料，研究人员还可以向人们揭示量化评价的局限。与量化评价相比，解释性的方法强调个人生活的独特性，因此，在评价各种计划的效力时，个人案例便成了基本的测量依据。

作为批判性的理论家，解释互动论者总是致力于向世人展示批判性的、解释性的质性研究如何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改造世界。他们时刻都在寻找新的途径，以求重建批判性的解释性理论实践在民主社会之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使命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强调解释与理解，并将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在解释互动论者看来，社会生活除了解释之外，什么都不是。换言之，日常生活是围绕着个体对自己以及别人的行为与经验进行解释和判断而展开的。许多时候，这些解释与判断都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或不正确的理解之上。人们常常会错误地以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别人的经验，然后他们又按这种错误的解释来制订社会计划，进而塑造或改变问题人群的生活。这些计划包括为精神病或无家可归者提供的社区服务，为酗酒者建造的治疗中心，以及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等。

这些计划旨在向各类问题人群提供服务，但实际上，这些计划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解释与其服务对象的经验、解释及意义之间并无多大关联，由此便产生了理解差距或失败，而许多

社会计划之所以发挥不了作用，正是因为其制订者没有真正理解服务对象的观点与态度。在充满问题的生活情境中，解释与理解是如何形成、运作的？其中的意义又是怎样产生的？人文学科及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有义务澄清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科学家还可以依据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来评价那些旨在帮助困难群体的行动计划。如果我们想要制订出真正有效的计划，就必须准确把握、理解并解释受助对象的视角及其经验。这一观点将贯穿于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研究者与社会世界

质性研究者不是那种客观的、政治中立的观察家。他既不会站在一旁冷眼打量，也不会居高临下地研究社会世界。相反，他们的生活史与处境均深嵌于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进程，他们将性别及历史意义上的自我带入社会进程之中。这个自我表现为一系列变动的身份，言外之意，它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其内涵乃是由各类情境中的实践构成，而研究者所探讨的公共话题或个人困境恰恰就是由这些情境实践决定的。

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再也不可能找到"上帝的眼光"，从而能够保证某种方法绝对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何种研究，它所反映的都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也就是说，任何观察都事先预设了某种理论，绝对不存在理论或价值中立的知识，纯净的现实主义或纯粹的实证主义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批判的和历史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版本不一的相对主义。与之相联系，研究的评价标准也变得相对了。总之，这是一种非基础主义的立场。[1]

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性社会学家既不会到科学，也不会到科学的任何修正主义版本中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而是满怀希望

1. 关于评价标准，有三种基本的立场：基础主义、准基础主义和非基础主义。基础主义者将那套在量化研究中使用的实证主义标准带入质化研究中，并且主伙，在评价质化研究时，无须起用另一套标准；准基础主义者认为，必须设计出一套独特的标准来评价质化研究；而非基础主义者则拒绝使用一切认识论标准。

地致力于后马克思主义及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的事业中,虽然这样做一点保障也没有。他或她所要探究的乃是各种话语体系、文化商品与文化文本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进而揭示,在"种族、阶层与性别的决定性表演中",词语、文本及其意义是怎样扮演关键角色的(Downing,1987,p.80)。

第七时刻的解释标准

身处当前的"第七时刻",倘若要去评价某项批判性的质性研究,就必须采用道德及伦理的评价标准。以下将从八个方面来详细解释这一点:

第一,所谓第七时刻的解释标准意味着表明一种政治的、伦理的及美学的评价立场,从而将美学、伦理学以及认识论融为一体。[1]它深知没有什么是价值中立的,知识即是权力。什么东西在美学上是令人愉快的,或者什么东西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切都是由那些掌权者决定的。显然,这一视角将认识论、美学与伦理学之间原有的界线都抹去了。

第二,从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美学意在强调求知方式(认识论)的道德及伦理本质(Christians,2000)。这类求知方式包括关于"人是谁"的构思(存在论)以及追问造成差异的社会原因。此外,还包括考察社会差异关系是如何被施与文本化的政治及知识处理,进而从中界定出什么是真、善、美来。

任何一种评价美学的标准都是基于某一特定的道德观点。绝对不存在所谓客观的、道德中立的立场。例如,非裔女性主义美学家(或认识论学者)会这样强调真理、知识及审美的重要意义,黑即是美。这一主张的形成基础来源于故事陈述,它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故事本身就是知识,智慧只不过

---

1. 相关的界定:美学是指有关"美"的理论;伦理学是指关于"应该"的理论,或者有关什么是"正义"或其他方面的一套原理。道德是指行为或文化实践的方式,而认识论则是关于求知的理论。

是人们共有的经验而已。很显然，这里的智慧乃是指活生生的地方经验，它的表达形式包括各种常识、风俗以及神话等（Collins，1990）。

第三，这是一种对话性的认识论或美学。它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不断地进行道德对话，而且参与对话的每个人都必须热情投入，并承担相应的个人及集体责任（Collins，1990，p. 214）。从政治意义上讲，这种对话美学无疑是在向人展示真正民主社会的可能情形，其中找不到一点种族歧视或压迫的迹象。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艺术、结构、运动、节奏以及颜色构成了这种美学所要追求的价值。它为差异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欢呼，充分表达了坚决支持赋权的行动准则。

第四，这一行动准则主张道德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该共同体分享一套统一的道德价值观，共同治理、和睦相处、友爱、善良以及道德正派等（Christians，2000，pp. 144-149）。这一准则内含一种不可动摇的存在论信念，这就是将个人置于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从而进入范围更广的道德生活空间。与此同时，它还宣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尊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人类生活、诚实以及非暴力则被视为基本的价值，并加以强调（Christians，2000，p. 143）。

第五，这种美学使社会批判及反抗得以可能实现。它帮助人们思考如何使事情有所改观，除此之外，它还在构思人类改革与解放的新途径，并使这一理想通过对话来实现。只要有必要，它就会支持非暴力反抗（Chiristians，2000，p. 148）。

第六，这种美学深知，道德标准总是由具体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来决定的，与之相联系，人们在评价道德标准时，也会从各自的情况与观念出发，诸如女性主义及社群主义的道德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一道德标准，研究工作必须以关爱及共同治理等观念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在不同的场景中运用这一道德标准到底会发生什么。

第七，理解到位的解释性研究终究会成为公共的参与性合作项目。这一项目将研究者与被研究的群体联结在一起，让他

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道德对话。无疑，这是一种参与式的行动研究。解放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社区发展方法与亚洲及其他地区兴起的人权行动主义，都与这种参与式的行动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渊源关系。该项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所有参与者共同组织研究计划，以社区为本的分析，追求解放或变革的社区行动（Kemmis & Mc Taggart，2000，p. 568）。作为一种质性研究，该项工作的宗旨是为了帮助人们走出各类媒体所施与的限制，进而走出困境（Kemmis & Mc Taggart，2000，pp. 568，598）。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应该学会（在公共领域）承担起群体代言人或文化批评者所必须肩负的使命。

第八，与上述特征相一致，这一行动准则要求解释性的工作必须为社会批判与行动提供理论支撑。言外之意，本文必须将行动的呼声表达出来。作为一名文化批评者，研究人员在发表讲话时必须表明自己的道德及伦理立场，也就是说，他或她总是围绕某一特定社区的道德话语来展开自己的言说，一句话，研究人员乃是一名道德及民族志叙事者，他或她必须有自己的立场选择。

道德批评与立场选择

立场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以下几个步骤（Becker，1967b）：

第一，研究者必须澄清自己的价值立场，包括表明与这一立场相关的所谓客观事实和意识形态假设。

第二，辨认、分析作为客观知识的价值与主张，它们同样构成了某种立场，但却与研究者所持有的立场相反。

第三，将这些意识形态性质的、以客观知识自居于世的主张所反映的道德及历史观点揭示出来。

第四，指出这些观点的弊端所在，并分析它们是如何将某一特殊群体的权利剥夺一空的。

第五，申明一种力求参与的、女性主义及社群主义的伦理主张，进而表达一种全新的关于照看（Care）、爱、美以及赋权的观念。

第六，在某一具体的情境案例中运用这种主张，看看它是否能产生改造社会的效果。例如，1970 年代，那些黑人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便曾追问过，诗歌、戏剧、小说或电影到底给黑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程度的改观(Gayle，1971，1997，p. 1 876)。

第七，为了响应行动呼声，研究人员必须制订具体步骤，以求将来能够改变现状。他们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建构全新的价值观点、身份意义、文化商品或文本。虽然势力更强大的文化不是将这些成果推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就是将它们冲得七零八落。他们可以向人们揭示，某一既定的观点或意义到底会对个体的生活产生何种消极的影响。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可以向人们揭示某一文本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对某一群体造成了误解，而偏见和刻板印象又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

第八，为了提倡这项乌托邦计划，解释性的批判性理论工作者还必须寻求新的评价标准与工具。在这一点上，可以回顾一下 1970 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该运动的理论家卡伦加在当时曾为黑人艺术制订了三大标准。首先，黑人艺术必须具备一定的功能，属于整个黑人群体，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使命。其次，就其功能而言，黑人艺术必须"积极反映革命的实际需要"，并为革命提供支持，它不代表艺术家的利益，而是代表"我们的利益"，代表"鞋厂童工萨米、卡车司机 T. C. 和被迫参军的大兵 K. P. "的利益(Karenga，1974)。卡伦加对黑人说："我们无须去画什么碗中的橘子，也不必去画在废墟的尘嚣中孤零零矗立的树林，更没有必要去画什么胖乎乎、面带微笑的白人

妇女……如果我们一定要画橘子或树林，那也只是为了让我们的战士把这些橘子吃光，好增强战斗力，并用那片树林来作掩护"(Karenga，p. 1974；亦可参见 Gayle，1971，1997)。

在卡伦加看来，群体性的黑人艺术来源于人民，因此当它回到人民手中时，它必须"给人民的真实生活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艺术便是色彩更加斑斓、形式更为丰富的日常生活"(Karenga，1972，1997)。

很明显，这是一种内含社会承诺的艺术。它追求民主，憧憬个体与群体自由生存的多元状态。它绝不是精英主义者的

把戏。

各解释类型之间的界限模糊化

第七时刻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试验新再现形式的强烈愿望。就在解释互动论者着手尝试新的书写形式的同时，新闻界也掀起了类似的运动，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以上一代的创新呼声为基础(Wolfe,1973)，当前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实验一种新的写作模式(Harringtom,1997a,1997b;Kramer,1995;Sims,1995)，该模式可以称之为"充满创意的、文学性的个人非虚构新闻"(Harrington,1997a,p. XV)。这种个人新闻进一步深化了 1970 年代那种以七大理解为基础的新闻创新计划。《汤姆·沃尔夫这一代人》的新作者将追踪事实看成是一种社会建构行动，他们将文学与新闻调查融入纪实小说、坦白录、旅行报告以及个人传记中，以求创造一种新颖的写作模式。为了实现展示而不是告知，他们采取了影视手法，来描述真人真事，刻画复杂的人物性格；他们还引入多元视角，包括第三人称叙事、作者旁白及其他叙事策略，以求营造出一种戏剧性的紧张，并让人们觉得作者本人在面对美国社会的剧烈变迁时，不仅表现得像一位具有道义精神的见证人，而且是一位有自己立场的见证人(Denzin,1997,p. 31)。这些新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及其报道都是社会建构行为，新闻记者根本不可能将所谓"客观事实"描绘或报道出来。

我无意重提关于如何区分虚构(文学)与纪实(新闻、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争论，同样，我也不想去划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虚构文本与非虚构文本，因为它们都可以归属于社会或政治建构的范畴，何况它们早已经被用烂了，以至于无法规范那些界限模糊的写作形式，如虚构的民族志。事实上，存在的只有叙事(它们都是叙事)，也就是说，它们只不过是各种再现或书写经验及其多元现实的模式化方法，而眼前的后现代话语也在竭力消解文学、诗歌、新闻、虚构、影视、记录、事实以及民族志写作或再现之间的界限。没有哪种形式绝对优于其他形式，对于作者及解释群体来说，它们仅仅是功能不同而已。

个人新闻的工作框架正是由上述实践及理念构成的。许多人比如哈林顿用写实主义的方法，来对身边发生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描述（Harrington，1992），其中既有真实生活的对话，第一及第三人称的声音，又有多重的视点、插在中间的独白、影像叙事以及其他简单的非学院派的写作风格（Harrington，1997b，pp. XIII-XIV；Kramer，1995，p. 24）。而作者本人的位置也很灵活，他们可以不在文本中出现，也可以是文本的叙事者或参与者。在《黑人与白人的家庭肖像》中，哈林顿曾这样交代自己的角色：

> 我的旅程从坐在牙科诊所的一张椅子上开始，护士和大夫对我说了许多有关他们小孩的故事。另一名牙科大夫走了过来，笑着说："我也有一个故事"，然后他讲了一个种族主义的笑话。我现在想不起它了，只记得结尾时提到一名愚蠢的黑人男子。接着屋里陷入死一般的沉静。这是说给我们白人听的笑话，但我的牙医以及护士都知道我的妻子是一名黑人，他们也知道我的孩子的皮肤是棕色的，明亮的棕色。我一生听到多少种族主义笑话？这第一次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看着那个说笑话的家伙……我想，这个白痴正在谈论我的孩子。（Harrington，1992. p. 1）

看完这段第一人称的叙事，不妨比较一下莱恩·达什对于罗莎·李的描述：

> 罗莎·李·卡宁翰姆庆幸自己今天不必一大早就起来，她半睡半醒地赖在床上。护士与大夫在疗养院里漫不经心地忙碌着。罗莎·李偶尔会听到他们在说着什么。她实在太累了，身子跨了似的……对她来说，一觉睡到天亮，然后拥有一整天的平静，几乎成了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这是她最近的一次度假。罗莎·李今年52岁，长期以来一直在吸食海洛因，是城市中下层的一员……她从未想过将海洛因戒掉。

哈林顿是为自己说话，在文本中，他充分表达了自己。而达什却没有出现在自己的文本中，他是个全知的观察者，飞檐

走壁般地叙述着发生在他眼前的一切情景。达什描绘了一个世界,而哈林顿叙述的则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感受。当然,两位作者都创作了属于自己的场景,并且每个人都在理解场景中所发生的现象。在清晰地描述各自看到的生活片段的过程中,哈林顿和达什均成功塑造了一副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区别仅在于哈林顿刻画的人物是自己,而达什的人物则是罗莎·李。此外,达什的兴趣在于他想知道罗莎·李的感受与想法,这里似乎有一个故事等着他去讲述,而他也的确想去讲述这个故事。与之不同,哈林顿的文本并没有透露出有什么故事等着他去讲述,相反,故事是由作者本人创作出来的,他想赋予某一经验或某个想象中的事件以某种秩序,从而使之产生意义。

两位作者的文本都是以事实及其意义为基础,但是,达什处理的事实是确实存在、不容置疑的事实,而哈林顿所描写的却是印象,其中的事实并不一定确实存在,而是一种美学或情感意义的真实,也就是说,在哈林顿的文本中,即使事实并非如其所言,但却有可能存在,而且在哈林顿的心中,它的确发生了。

类似于哈林顿和达什所描述的文本都来源于人们所感受到的生活,这类作者的叙事目标乃是为了"从里到外地理解其他人的生活,使得作者的理解与叙述就像是文本中的人物自己在做理解与描述那样"(Harrington,1997b,p. xxv)。这样一来,作者就可以在作者、所叙述的生活以及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

一年后,哈林顿重新坐在了牙科诊所的那张椅子上:

> 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了,但当我再一次坐在牙科诊所的这张椅子上等待就医时,依然会想起此前在心中留下的那点最深刻的印象:那个白痴正在谈论我的孩子!
>
>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我的儿子还很小,半夜三更我坐在儿子的屋子里,周围一片漆黑,我看着儿子,他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消失在夜色的阴影中,突然间,我的脑海中闪现……儿子不见了,我变成了孩子……我的父亲变

成了我，接着我也很快消失了。一缕光线掠过儿子的膝盖，他正在长大，成为一名父亲，就像我……这种感受把一切都改变了，只要我“变成”了一名黑人——通过想到我的儿子和女儿，我就感受到一直以来都在忍受的种族歧视。成为一名黑人，哪怕只是短暂的想象，让我产生了对公正的急切渴望。当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白人时，我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的美国，没有哪个白人（无论他是多么热心肠）会主动地设身处地地为黑人着想——只要他或她按一贯的方式考虑问题。（Harrington. 1992，p. 447）

类似这样的写作通过叙述人们在极端以及常规处境下的反应，将读者与报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些故事或新闻事件可以将日常生活政治化，进而将那些塑造个体生活及其人际关系的结构与过程揭示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还可以发起“公共改革”（Harrington，1997a，p. xiv；Harrington，1997b，p. xvii）。[1]

公共领域的重构

在重构公共领域这一刻，个人新闻与各种公共新闻以及批判性民族志新闻写作的呼声融合在了一起。这些呼声正是要将个人及其困境带入公共领域，并使之成为公共议题。可以将这一现象视为解释互动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报道困境的公共新闻期待读者在面对当今社会戏剧性的、意义丰富的日常生活画卷时，成为一名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重构之后的公共新闻为那些旨在揭露社区问题或个人经验的地方性民族志写作腾出了空间。这是公共新闻面对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必然反应，它提倡民主参与，它使得地方社区的个人经验及其意义能够在公共领域里发出声音来。[2]显然，这种民族志体裁

1. 下面一部分内容来自 Denzin（1997，p. 280-297）。
2. 同时也不难理解，“参与一项清理受污染港口的公民行动，其政治性并不低于在文化杂志，用陈词滥调对某一群体渐渐变坏的现象所进行的辩论”（Benhabib，1992，p. 104）。

的新闻写作是要将事实说给那些具有道义精神与责任意识的读者听，这些读者本身就是某项公共计划的参与者，他们期望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及公共问题（Charity，1995，p. 146；Rosen，1994）。[1]

进一步讲，将公共新闻改造成民族志，这一写作模式转换是为了达到以下几个目标，公开发表的批判性私人民族志写作必须完成下列一些事情：

1）向公众报道身边发生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日常生活故事，揭示其中的问题。这些故事要能唤起道德同情，并能帮助公民做出理智的决定，进而拟订行动计划，来解决那些已成为公共议题的私人生活问题，同时促进行动计划能得以顺利地实施（Charity，1995，p. 2；Mills，1959，p. 8）。

2）改进那些能够唤醒公众及个人良知的解释性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在制订决策的过程中集体开展工作，而且还可以辨认、区分各种选择与价值，运用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促成公共领域的对话与协商（Charity，1995，p. 4-8）。

3）它扬弃了调查性新闻写作的常规模式，此类记者致力于揭露腐败，伸张正义。他们“深入挖掘内部故事，将真相告诉读者，蔑视约瑟夫·麦卡希和尼克松……给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安慰，让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不得安宁”（（Charity，1995，p. 9）。

4）寻找精通社区历史及其生活的民族志学者与记者。这些人知道如何与公民谈话，如何倾听他们的心声，又能够在公众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捕捉并表达公众的一致意见。此外，他们还是全力以赴的公民，始终坚信民主的公共生活是可以实现的（Charity，1995，p. 10）。

5）作为地方社区的“守望者（watchdog）”，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的故事，生产一种参与性的协商话语，从而以自己的发言捍

---

1. 公共新闻并非没有批判者，（其批判者甚至）包括那些声称其是新闻的焦点人群。不过这是一种为扩大报纸销量的市场手段，它是保守的，其改革意图是为了增强专业新闻记者的权力，但是其倡导者并不明白社区、公共生活及公民话语的真正含义。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Graber，McQuail & Norris，1998；Glasser，1999；亦可参见 Carey，1995）。

卫公共良知(Charity,1995,pp.104-105,127)。

6)将写作的价值定位于使公众做出意义丰富的判断与行动(Charity,1995,p.50),其核心目标乃是重构公共领域(Christians,Ferre & Fackler,1993,p.14)。

7)表达坚定执着的愿望(Charity,1995,p.146),同时"增强社区的政治能力,使其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Rosen,1994,p.381)。

8)发掘戏剧性的故事,叙述其中的各种真相。以生动感人的描述将个人困境与公共议题联为一体(Charity,1995,pp.72;Mills,1959,p.8)。

9)完善文本形式,使公民变成读者,使读者变成采取民主行动的人(Charity,1995,p.19,83-84)。

在当前的第七时刻,以上所列诸项表明了将批判性的互动论、应用性的行动研究、新型公共新闻以及质性研究融为一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理想,并顺便交代了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途径。

研究者或民族志学者在追求这些目标、进行写作和发挥功能时,会表现得像是一位文学家或新闻工作者。这意味着一种以表演者为中心(performer-centered)的故事讲述模式将会成为民族志学者的重点关注(Degh,1995,p.8)。这样做正是为了唤醒公共良知,使每个人都能对那些在公共领域已被讨论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公共良知即是由那种将个人、自传与公众融为一体的书写规范塑造出来的。

写作规范

女性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的伦理模式已为公共的民族志写作计划提供了一系列的规范。[1]这些规范既是以下面四点不容置疑的新闻写作原则为基础,又是对它们的进一步阐述,这四点原则是准确、没有伤害、有权知道真相和公开个人的道德立

1. 该伦理(模式)推崇社区、团结、关怀、爱、赋权、道义观察以及社区关系等等(Denzin,1997,P.275)。

场。[1]人类学者的道德故事不能给那些在支配性的文化体系中受到压制的人们带去伤害（没有伤害原则），它们刻画的人物应受到保护。事实也好，虚构也罢，这些故事都是正确的，当作者进行故事创作、叙事构思，或者将一组案例组成一个故事时，他有义务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读者（Christians et al，1993，p.55）。

读者有权知道人类学者发现了什么，但是这一权利必须和另一个原则（即没有伤害）协调好。叙述必须表现出“解释充分”这一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具有深度、细节、情感、差异以及连贯性。这些特质能帮助读者形成一种批判性的解释意识。此外，这些叙述文本还必须尽可能恰当充分地再现事实，并且不带任何种族、阶层或性别的偏见。[2]

作者必须真诚对待读者。[3]其作品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人物、情节、氛围以及对白都必须是真实的，能为人们探寻真实的道德自我提供一个合适的论坛。该论坛致力于考察那些在文化中尚未被再现的事物，将当代生活中的不满及暴力事件以叙事的表达方式记录在案。作者在这世上挑起事端，作者的故事（我的故事）成为世上流行的故事之一。作者总会有某种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理论，它贯穿于作者的文本中，显而易见。自我反思的读者常常会被想象成这样一类读者：他们总是在搜寻那些坦白直率、发人深省的作品，这些作品能把他们带入日常生活经验中去。

问题仍在于努力寻求一种叙事声音，正对着这种叙事声音的是那个盛行已久的写作传统。该传统主张，可以把自传以及生活经验看成是反思与自我的构成之所（Clough，1994，p.157）。当然，这种主观性的反思形式可能会是一个陷阱，它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有关自我、行为、性别、欲望以及性生活

---

1. 这些原则是对克里斯蒂安等人提出的新闻记者行为规范的延伸（Christians et al.，1993，PP.55-57）。
2. 克里斯蒂安提醒我注意这一点，特此致谢。
3. 本段中的写作规则皆是引自雷蒙德·钱德勒的《神话故事的十二点记录》（Chandler，1995）。

等等方面的悲伤、荣耀及其他戏剧性的感受。当前急需建构一种反思性的书写形式，这一书写形式能将民族志与实验性的文字文本“融为一体”（Clough，1994，p. 162；1998，p. 134）。

作为坚定的怀疑主义者，这一新型的作者总是在质疑权力与欲望的勾结之势及其各种伎俩。各社区公众之所以往往最后会变成牺牲品，常常就是由这些勾结之势及其阴谋造成的。通过追问到底是谁从某一特定的真理话语那里获得利益，他们的作品让传统的实证主义真理及其确定性变得不得安宁。那些个体记者和公共的民族志学者所从事的乃是一种伦理实践，他们将公众看成是自己的顾客，民族志学者堪称公众的道德倡导者，虽然就每一位研究人员而言，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也许会与所谓公众的最大利益或某一特定群体的公共利益发生抵触。

民族志学者的叙事常常是寓言性的、象征性的，许多都是道德故事，而不仅仅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对读者来说，这类故事既是经验的中介，又是获得权利的方法。通过这类故事，读者或许会发现自己的道德真相。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可以将这类叙事看成拯救自我与社会的乌托邦故事，它将道德指向读者（作者）的生活。民族志学者能够将社会世界的多重“真相”以及人们认为重要并奔走相告的故事揭示出来，而那些个体记者则通过描写故事来激发批判性的公共话语，公共领域及私人生活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就是由这些故事促成的。

表演民族志

接下来，我将讨论表演文本这一概念（Conquergood，1998；Turner，1986a）。目前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蒙大那这个小镇的解释性民族志写作计划（Denzin，1999b，2000a，2000b），我会通过该项计划中的许多材料来阐述我的观点。我在尝试一系列的写作联系，以求能把田野工作变成表演性的文本。我的阐述将围绕一个略显复杂的论点展开。

我们生活在以表演为基础的剧本文化中，表演者或观众之间的界线已变得模糊了。文化本身也成了一种戏剧演出。表演民族志融入了某种性别文化的因素，日常戏剧表演与正式的戏剧、舞蹈、音乐、MTV、录像以及电影之间的界线几乎看不清楚了（Birringer，1991，p. 182；Butler，1990，p. 25；1997，p. 159；1999，p. 19）。但是事态进展远不止界限模糊，表演本身已成为一种现实。在巴特勒看来，只要谈到性别和个人身份认同，便不难理解这一点（Butler，1990）。性别的本质是一种表现，它是做出来的，"虽然主体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行动之前……性别是表达出来的，是由那些描述性别如其所是的语句构成的"（Butler，1990，p. 25）。此外，语言行为也是一种表演，话语同样可以伤人（Butler，1997，p. 4）。

表演文本所处的语境乃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体系，在其中，戏剧、电影、电视、民族志、影院、演出、文本与观众聚在一起，互相交流。正如科林斯指出的那样，这些表演文本不仅刻画生活经验的意义，而且还将其中的意义展现给大家看（Collins，1990，p. 210）。

以安娜·迪芙里·史密斯的作品《镜中之火》为例，在这部剧本中，史密斯向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表演片段。1991 年 8 月 19 日布鲁克林皇冠山庄发生了一场种族冲突，史密斯采访了卷入冲突的人们，她所提供的表演片段便是以那次采访为基础。这场冲突是由一名年幼的圭亚那裔男孩被汽车压死所引起的，肇事汽车当时正在警察的护送下载着一位要人。之后，一群黑人愤怒地暗杀了一名从澳大利亚来的年仅 29 岁的学者扬克尔·罗森鲍姆。此次暗杀是在持续了三天的种族冲突之后发生的。社区的许多成员都卷入其中。史密斯的剧本对所有参与者逐一进行了描述，包括帮会成员、警官、不知名的男孩女孩、母亲、父亲、大学老师、阿尔夏普顿牧师、剧作家诺托扎克·山奇以及非裔美国文化批评家安吉拉·戴维斯。

在康奈尔·韦斯特看来，《镜中之火》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它展示了艺术何以可能建构一个让人们行使权力（而不是剥夺人们的权力）的公共空间"（West，1993，p. xix）。在这部剧

本中，帮会成员、黑人、警察、犹太人群体走到一起，围绕事件展开讨论。剧本跨越了种族之间的界限。史密斯的剧本表明，“美国人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而是生活在地区之间的裂隙中，生活在求同存异的抗争中”（West，1993，p. xii）。

一位匿名的心有余悸的年轻人（加勒比裔美国人）是这样描述那次车祸的（A. Smith，1993，pp. 79-80）：

我看见她推着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骑着单车
是这样的，不是吗
她在推他
他左摇右晃
就像不会骑车似的
车来了
她跑开了
我们看见车子开过来
我们正要跑开
噢，唷！是个犹太人
闯了红灯，他们从没有被逮住过

在表演这个年轻人的上一段讲话时，史密斯对剧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以求能让人知道从目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是怎么回事。

表演民族志同时还会创造某种道德文本或行使道德文本的功能。这种文本能将个人问题引向政治问题，将地方问题引向历史及文化问题。而在康克古德看来，这种文本为平等交换意见创造了恰当的空间，从而避免了以偷窥的、盲目崇拜的、监督的或家长式的眼光来打量别人（Conquergood，1985）。

文本变成激进的街头表演，意味着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并“重新思考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分配机制”（Cohen-Cruz，1998，p. 1）。这些作品，包括讽刺、木偶表演、进行曲、警句、合唱、小丑表演与仪式表演等等，以及流动观察者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成员，将现实转化成了理想的空间，在其中，原本习以为常的东西统统受到了质疑（Cohen-Cruz，1998，p. 3）。街头、公共空间

或表演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文化图景，除此之外，还提供了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Cohen-Cruz,1998,p.1)。

柯文·克鲁兹认为，这类表演可以按照多种方式进行，包括①宣传：也就是发动群众，使之接受某一党派的观点。②现场目击：也就是制造一种也许无法更改的行动景象。③抗议：也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插入一种表演，呼吁他们对抗那些冷冰冰的电影剧本。④乌托邦：也就是致力于将理想蓝图变为现实。⑤传统：也就是发扬共有的文化信念，比如美国小城镇7月4日举行的各种游行聚会。

在我的表演(文本)计划中，我将寻求一种几乎不用构思的最低纲领主义(Minimalism)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戏剧(Branaman,1997,p. xiix;Goffman,1959;Lemert,1997,p. xxiv)或表演人类学(Jackson,1998;Turner,1986)。它只想极力去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叙述性的人类学将描绘、研究各种表演，从而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如何将自身的文化意义表演出来的。

受社会学想象力(Mills,1959)的影响，这一质性研究将致力于探索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诸如传记、性别、种族、民族、家庭以及历史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类作品通常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成，但其观点来自负责观察与写作的社会学家。除此之外，最低纲领主义的叙述性社会科学还是一门有关故事、表演或故事讲述的学科。倘若叙述得当，这些故事便能创造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空间，在其中，“人们聚在一起，倾听、体验，进而寻求更好地理解他们身处的世界”(Jenkins,1999,p.19)。

表演转向

人文学科的表演转向(Conquergood,1998;Madison,1999;Phelan & Lane,1998)，针对批判性的跨学科的解释计划提出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建构、展示、表演文本，并对它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为了说清建构及批判分析的过程中所

涉及的问题,我将优先考虑表演文本和互动表演文本(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互动),从而与单个表演者的"且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区别开来(Denzin,1997,p.96)。借助于相互参与行动,这类作品能将读者带入文本,进而构造一个分享情感体验的空间,其中的现象描述则是通过再现行为完成的。由此一种以文字、叙述与解释作为中介的抵抗模式便会展现在读者面前。优秀的叙述(表演)文本决不仅仅是宣泄,它应是政治性的,不仅能激起人们的行动,更能促使人们反思。

当前对于表演的关注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社会学家(Kotarba,1998;Richardson,1997)、人类学家(Jackson,1998;Turner,1986a)、传播学者(Conquergood,1998)以及教育理论家(Lather & Smithies,1997)纷纷呼吁文本写作应突破纯粹的再现,转向表演性的文本。与此同时,行动者(Stringer,1996)、社群主义者(Christians et al,1993)、女性主义者(Lather,1991)、建构主义者(Lincoln,1997)、合作探究人员(Reason,1993,1994)以及参与性的研究者(Carspecken,1996)则在摸索非同一般的叙述性表演方式。这些作品鼓励社区研究者与社区公众通过以行动为本的表演计划共同建构意义(Conquergood,1998)。这一号召能将女性主义的与社群主义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民族志融合在一起,促使研究人员与那些被研究的群体建立一种合作互惠、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

表演文本

表演文本包含"叙事者、剧情、行动、变化的观点……以及此时此地的经验感受,并使之具体化"(Paget,1993,p.27;亦可参见 Mienczakowski,1995)。以读者—研究者的关系为中心,这类文本会成为"我的故事"的汇集之所。在这里,"我的故事"常常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内容大致为记忆中的创伤感受及其他各种有限的经验。借助于唤醒尘封的记忆,而不是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些曾经发生的故事重新被讲述出来,而生活的真理也随之依稀可见。民族志学者、读者以及表演者在这些故事中相聚,共同分享其中的经历、情感与行为。

这类故事朝记忆转去，而不是转向当下活生生的经历，并且将记忆看成是批评、解释以及行动的诞生之所。众所周知，经验只存在于它的再现之中，它不会溢出记忆或想象之外，人们记起某些事实，这些事实与其他事件联系在一起，事实的意义在讲述过程中常常会被重构。因此，转向表演文本的呼吁声并不希望提供确信不移的真相。反思性的、表演性的文本从唤醒记忆开始其写作，它要求作为观众或合作表演者的读者顺着作者或表演者的眼光，使故事中的经验重新变为活生生的事实。在与表演者一起重温昔日经验的过程中，读者将会活动起来，随之，他们也可能会回想起自己过去的经历。

所以，当哈林顿告诉我们，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抱着年幼的儿子，我们便能分享哈林顿的经历。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在内心深处重新创造了一连串的激动时刻，逝去的生活一一再现于眼前，作者便可以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往日的一切。苏姗·克里杰说：

> 我刚旅行回来，便赶往佛罗里达去料理丈夫姑妈（马克茜恩）的后事。她刚过 70 便去世了。当时她正往楼上寓所搬一些食品杂货，心脏病突发，接着就倒下死去了……
>
> ……这是一次截然不同的经历：去佛罗里达，给这位并不怎么熟悉的老妇清理房间，整理她的衣服和珠宝，寻找她最近拍的照片，使用她以前的浴室，会见她的朋友。（Krieger，1996，p. 65，68）

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天，克里杰在清理厨房布满油污的碗柜时，看见碗柜后面有一只陈旧的手风琴皮箱。她打开箱子，在里面发现了马克茜恩姑妈的银手镯……并不贵，还有一些备用品，现在已失去了光泽。家里真正贵重的银器是马克茜恩姑妈从她母亲那里得来的。克里杰问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你是个妇女，你的价值会不会不一样？你怎样才能把妇女同她留下的财产，她的衣物还有那不值钱的银器分开来？"（Krieger，1996，p. 70）但是这套便宜的银器并不足以衡量马克茜恩姑妈的价值。

1968年6月8日,劳蕾尔·里查德森的母亲在迈阿密海滩因为乳腺癌死去。大约过了30年后,里查德森回忆起这件事,她写道:

> 6月8日,我醒来后,决定当天驱车前往基佛斯特。我给妈妈擦洗了身体,问候护士,与父母做了吻别,然后驾着父亲的道奇·达特车走了。当我开到长基时,猛然觉得应立即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妈妈去世了——才不到一分钟之前",父亲对我说。(Richardson,1997,p.234)

得知这一消息,她感叹道:"我真后悔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那一年我30岁(Richardson,1997,p.234)。

母亲去世10年后,里查德森写了首诗,名叫"最后一次谈话"(Richardson,1997,p.234):

> 我想抱紧你
> 将你消瘦的身躯
> 拥进我的怀里
> 抱着你,手臂轻轻地摇晃着你,直到你安然睡去

某个人或某种文化的生活真相被类似的文本表达出来了。当人们阅读或表演这些文本时,它们就会成为某种文化或某个人的价值的符号再现形式。表演者通过其表演可以将价值表达出来。

现在来听听安吉拉·戴维斯的叙述。她最近对几位布鲁斯音乐女歌手做了一项研究,她们是玛蕾妮、贝茜·史密斯、比莉·赫丽黛。戴维斯发现,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布鲁斯标志着大众文化表演时代的到来,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这种大众音乐表演形式慢慢变成了一种表演文化,并对美国的非洲黑人音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Davis,1998,p.5)。

在这种音乐表演中,玛蕾妮、贝茜·史密斯、比莉·赫丽黛传达了黑人女性对于阶层、种族、性别、暴力、性、婚姻、男人以及亲昵等方面的理解(Collins,1990,p.201)。布鲁斯的传统在这几名具有阶层意识的本土黑人女歌手身上得到了深化。她

们为黑人女性创造了表演空间，在其中，黑人女性尽情唱着布鲁斯，将布鲁斯当成自己的生活。总之，她们在舞台上高唱黑人妇女的心声，制作黑人文化以及一种批判性的公共表演艺术(Jones，1999)。

布鲁斯音乐常常是一些内心即兴发挥的歌曲，其主题一般为爱情或男女之间的阴差阳错(Collins，1990，p. 210)，但是，玛蕾妮、贝茜·史密斯、比莉·赫丽黛超越了那种按歌词演唱的音乐形式，她们把布鲁斯改编成了一种生动的艺术。在赫丽黛那里，它甚至与爵士乐混合在了一起。和布鲁斯音乐(文化)一样，爵士乐也是一种注重即兴发挥(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音乐形式。对此，比尔·伊凡斯，这位伟大的打击爵士乐钢琴师，曾这样说道："爵士什么也不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旦它是什么的话，它便会失去生命力，再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所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正是指它是即兴的、偶然的，它就存在于创造它的那一刻"(转引自 Lees，1996，p. 426)。和比莉·赫丽黛所演唱的布鲁斯音乐一样，这种即兴发挥的表演文本，即爵士乐，也是偶然生成的产品，它只是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是活着的。那么，这种文化是如何使得人们在爱情、冲突以及失去权力等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正是表演民族志所要探索的问题(Jackson，1998，p. 21)。

叙事集锦、表演性写作与表演文本

表演文本建立在叙事集锦之上。所谓叙事集锦是指叙事片段组成的集合。迪拉德曾将叙事集锦与立体图画做过比较：

> 就像立体图画可以将满屋子的东西画在一张 9 平方英尺的帆布上，叙事也可以容纳 50 年的人生历程，也就是先把它处理成一个一个的片段，然后在这种平民百姓的叙事文本形式可能的界限里把这些片段组合起来，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立刻细细品味这些叙事片段，这就是叙事集锦。(Dillard，1982，p. 2)

在表演文本中，故事的顺序安排并不需要根据某种固定的进展，叙事集锦将时间扯碎了，讲述者可以随时向前跳跃或向

后回溯。在这里,时间安排无须根据常规的因果关系,更“没有必要沿着固定的递进顺序”(Dillard,1982,p. 21)。时间、地点与人物全都被打乱了,此一时刻与彼一时刻的间隔随时都可能会消失,一个以上的讲述者可以同时讲话,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总之,这种文本可以是叙事集锦,也可以是蒙太奇,其中凌乱地穿插着图片、空白、诗歌、独白、对话、旁白以及意识流。

上述表演文本所从事的乃是一种表演性的写作(Pollock,1998;亦可参见 Phelan,1998,pp. 12-14)。由于使用了叙事集锦,表演性写作的功能会定位于展示,而不是告知,力求将它所描述的事件表演出来,或者说,这种写作会将所描述的事“做”出来,它是在“探索话语与写作之间到底能形成什么样的交叉关系,其界限在哪……它试图唤醒它所说的一切”(Phelan,1998,p. 13)。表演性写作就其本质而言绝不是什么正规的写作形式,更不是标新立异的先锋之举,或为了显示什么超凡的才华(Pollock,1998,p. 75)。在波洛克看来,表演性写作是一种呼唤,它是反思的、复调(Multivoiced)的。它穿越各类风格,其叙事总是片段性的,永远不会有终点。在表演性写作中,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波洛克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它所记录的是已经上演的世界(Pollock,1998,pp. 80-95)。

倘若我们说,安娜·迪芙蕾·史密斯正在从事表演性写作,意思是指她的写作允许人们在表演的时候体会自己的主体性。表演性写作常常是诗意的,充满了戏剧色彩,它将书面语言转换成第一人称的口头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动感十足。在这类文本中,表演以及表演性纠缠在一起,相互界定对方。与此同时,表演者的表演也为其他人的介入创造了空间。

表演文本自然只能由表演性的写作来完成,它们让过去的经历重新复活,并通过对话、诗歌或故事等再现方式,使之成为一系列刻骨铭心的事件,文本的主题则会演化成一项叙述成果。个人叙事借助于表演行为也会随之被“物质化”,也就是变成真实的事件。表演介于经历与故事之间,叙事传递着经历(Langellier,1999,p. 128),而展示与告知之间的差异也会随着

表演慢慢消失。

在康克古德之后，可以发现以下三种表演（文本）：即模仿性的表演、建构性的表演和充满力度的表演（Conquergood，1998，p. 31）。康克古德认为，社会学家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表演看成是一种模仿，而维克多·特纳的建构表演理论则将模仿改造为建构（Turner，1986a），约翰·席尔勒的言语行动理论（该理论是由朱迪·巴特勒提炼出来的）则强调行为的叙述特征，言语同样也是一种行动，比如承诺与辩护（Searle，1969；Butler，1990）。在巴特勒看来，借助于交往性的表演行为，每个人（他或她）都可以构成某种情景叙述，从而表明自己的个性，诸如是异性恋或者相反。所有的表演都是一种伪装，是对真实事件的复制，是对模仿的模仿。这种模仿试图通过表演把最初的情形再现出来，并以此确立自己的形象，但这其实是个讽刺，因为最初的情形早已不存在了，无论怎样，在表演之前都不可能找到那个通往最初情形的入口。

如果原初的情形已经消失，那么那种将表演看成是模仿的观念便要遭人质疑了，然而，正如陶西格和哈拉维所指出的那样，模仿一样是颠覆性的（Taussig，1993；Haraway，1991，p. 201），就像荒原狼，“机敏的行动者和间谍，尽管是个冒牌的骗子，但我们仍需学会与他打交道”（Haraway，1991，p. 201；此外，还可以参见 Taussig，1993，p. 225）。所以，即便是模仿，同样也可以是一种最初的真实。除此之外，所有的表演都会成为一种行动，表演是一种行动政治，在它周围环绕的是权力。依靠运动、断裂以及行动，表演创造了一个没有核心力量与中心人物的场景，在其中，人们可以进去抗议，打破常规或重新创造（Conquergood，1998，p. 32）。在表演的时候，个人也可以形成自己的叙事与个性。

所有的表演都将成为人们借以质疑现实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借助于它，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果真如此，表演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它能粉碎陈旧的意义和腐朽的传统，将我们投入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促使我们跨越一切界限（Conquergood，1998，p. 32）。即便表演是在复制现实，那也会力求做

到化腐朽为神奇，也会以表演者所特有的方式来复制现实。

里德洛奇、蒙大拿：经历与表演

威廉·基特里奇说，西部蕴藏着巨大的空间，那里的舞台尚未被发掘，正等着人们前去表演（Kittredge，1996，p. 97；此外，还可以参见 Kittredge，1987，1994）。他继续说道："四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表演留下的历史烙印……铭刻在周围的景物（篱笆、公路、河道、电线杆、城市规划、被炸的废墟）中。"（Kittredge，1996，p. 97）与此同时，西部也在人们讲述的各种故事中。蒙大拿既是表演的空间，又是表演本身，但是，没有谁能写出客观中立、绝对权威的关于蒙大拿的表演性描述，任何一种描述都是个人化的、地方化的。接下来便来看看其中的几种表演性描述方式。

1994 年，我与妻子在蒙大拿州里德洛奇市郊外买了一小块地，那儿只有 1 875 口人。[1]我们获得了一英亩土地，此外还有一间木屋，旁边有一条名叫岩溪的小河。木屋后面有一块巨大的残岩断壁。我们所在的小河谷零星点缀着一些湖泊，山上白雪皑皑。河边的低地长满了高山植物。还有广袤的农场，人们在那居住，房子有两辆汽车那样宽。此时正值六月，田间开满了黄色的向日葵花。夏天，从我们居住的木屋上方的小路望去，便可以看见许多马儿、鹿儿在山谷中吃草，高高的白杨树下有一块巨大的鹅卵石。我在那看过彩虹，吃过早餐——那难以下咽的鳟鱼。我钓鱼，我的妻子整理衣被，（我们会）徒步旅行或采集野花。去年圣诞节，我的妻子还搞了一次跨越全国的滑雪旅游。夏天我们会去参加拍卖，做点院子买卖（yard sales），或者开车去市中心买点食品杂货。

阅读了基特里奇的著作，研究了特纳和布鲁纳之后（Turn-

---

1. 关于该市名称（Red Lodge，中译本将其直译为里德洛奇，译者注）的来源，有许多传说，"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说居住在该地的 Crow 族印第安人将红土（Red clay）涂抹在他们的木屋（Lodge）上"（Graetz，1997，p. 23）。

er,1986a;Bruner,1986,1989,1996),我越来越觉得,对我们来说,蒙大拿州的那一小片天地其实是一个不断上演新故事的地方,我们沉浸在新鲜神秘的西部文化中,慢慢学会了如何表现蒙大拿。里德洛奇周围的人们每天都要上演的那些常规节目,我们也渐渐学会了。比如游行聚会,到手工艺品及古玩店里做点买卖,给木屋添购点东西,在山上开车,到外面换换口味,在咖啡店前面的路边喝一杯浓咖啡,到波拉德餐厅(在那家国家注册的酒店里)吃上一顿晚餐,到电脑动画制作工场那里拾一些图画,到哈格斯老奶奶那里买点被褥什么的,到当地一家正在把全部的图书资料输入计算机的图书馆当一回志愿者。

我们看着别人正在做我们也做过的事情,将在蒙大拿的经历分为表演与再现,在表演与再现的过程中建构文化与意义(Bruner,1989,p. 113)。三年前,我无意中听到一位男子和大森林渔具店老板在谈话,他的宝马车在前面还没有熄火,车门敞开着。他穿着一件钓鱼专用的奥维斯背心,驱车带着全家从康涅狄格来到了这里。“孩子们看过一部名叫《大河东去》的电影,我们到哪去钓鱼才能像电影里面的他们钓得那样好呢?这儿有没有谁能教我飞杆钓鱼(Fly-fishing)?”店主说没人能教,但告诉那位男子,“再往河的上游开 20 英里,过了四里桥(Four-Mile Bridge),就可以像电影里那样钓鱼了,你肯定能找到那地方的”(还可以参见 Dawson,1996,p. 11)。

以上这些发生在蒙大拿的经历(表演)当然会不断变化,倘若一味追究它们是否真实,或最初的情形是什么,便会显得有些多余,无论评论哪个经历表演,都不可能找到最初的情形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表演只有两类:一类看上去能让人觉得是这么回事,另一类则不能。

表演性解释、创造地方史

每年我们都想观察一下里德洛奇举行的国庆节庆祝表演活动。庆祝表演按惯例将持续 9 天,其目的是为了再现欧洲白人的种族光荣史,它包括一系列的庆典,诸如身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装,芬兰、爱尔兰及苏格兰歌舞,苏格兰风笛,新科罗拉

多鼓和军号、牛仔诗歌——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白人作为一个种族所拥有的特权和社会成就(Fine,Powell,Weis & Wong,1997,p. vii),从中可以看出,白人象征着一个道德公共体,而白种人的文化精华也通过这些活动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展现(Du Bois,1920,p. 29;Hughes,1962)。

节日中的每一天都有一个名字,其中7天依次被分给了7个民族: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日耳曼、斯堪的那维亚、芬兰、意大利、斯拉夫和苏格兰。剩下两天是蒙大拿节和全国的国庆日。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来自欧洲好几个国家的男人特意挑选了一天来到蒙大拿,并在那开采矿产,后来他们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们的妻子负责学校教育、做饭、照料孩子、开小杂货店,还有就是做一些她们在欧洲时学会的家庭手工业。里德洛奇镇一直在努力保持这一历史传统。

根据当地的历史记载,二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有这种节日。当时地方社区领导决定建立一个公共中心,为一些公共活动提供场所。这些活动包括每年夏天举行的音乐节、各种艺术手工艺品展览以及陈列镇上各民族的旗帜和其他文化物品,国家的节日即是由此演变而来,而里德洛奇也很快成了"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钓鱼的好地方,此外还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以及各种绝技竞演会和避暑的好去处"(Red Lodge Chainbet of (Commerce,1982,p. 4)。除了这些之外,该镇还可以提供其他一些东西,"当地的居民更是一大资源"(同上)。每年夏天的这九天里,里德洛奇都会展现本地民族文化,并鼓励当地的每一位居民成为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表演者。

每位居民只能围绕自己的历史进行表演,他们一边表演一边组织,每天一个民族,但每个民族却很可能做同样的事情,比如扛着国旗游行,从宣告国家成立的地方走到百老汇,身着当地服装。整个下午都在表演某个节目(唱歌、讲故事或跳摇滚),到拉伯寺(Labor Temple)吃民族风味食物(每天早上3点到下午5点),晚上到公共中心唱歌跳舞。这些都是非正式的民族即兴活动,但它们与那些正式的庆典活动有一定的关联。通过正式的庆典活动,上一代人就可以将白种人的特权、文化

记忆以及蒙大拿风格传递给下一代人(Hill,1997,p.245)。

蒙大拿爵士

我喜欢蒙大拿的节日活动,尤其喜欢听农场妇女朗读她们的故事,告诉人们作蒙大拿妻子的感受。这是一个可以尽情发挥的剧场,女牛仔们唱着自己编的布鲁斯——蒙大拿爵士。迪波特画廊旁边有个里恩斯公园,公园里有四个舞台,大家在舞台上搭起了帐篷,一排排白色塑料椅整齐地摆放在草地上。舞台的每一边都安装了喇叭。表演结束后还提供蒙大拿农场人家独有的传统佳肴:烤牛肉、煎豆、凉拌卷心菜、煎土豆、果冻沙拉、褐色甜点,此外还有饮料、咖啡和冰茶等。

舞台上站着一群皮肤黝黑有高有矮的中年妇女,她们是勤劳的女人、母亲、女儿和祖母。她们生活在伯尔图斯山谷附近的农场,山谷附近有许多河流,东罗斯巴德河、岩溪、威尔罗河和科伦布、阿伯萨罗基南部的静水河。有的妇女脚穿牛仔靴,另一些妇女穿着耐克运动鞋。她们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配上红色饰物、白色或蓝色的牛仔衫、裙子,脖子上围着红色的牛仔头巾。她们的头发或长或短,有的留了马尾巴辫子,有的则是卷发。她们朗读牛仔诗歌,讲述故事,许多故事都与寒冬有关,马冻死在雪堆里。有些妇女在唱歌,乡村音乐轻轻地伴奏。人们来来往往,有的会停下来听一会。当这些妇女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农场老工人戴着边沿宽大的牛仔帽坐在下面,双眼微闭,脚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点着地面。孩子们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丈夫们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朗读诗歌。和前面提到的女歌手玛蕾妮、贝茜·史密斯、比莉·赫丽黛一样,这些妇女也唱着自己创作的牛仔布鲁斯,她们这样做,一定有某种真相包含在里面。

死去的印第安人

费德勒认为,只有在美洲土著人包括尼兹帕斯人(Nez Perce)、黑脚人、苏人、阿西尼博瓦人、葛罗温特人(Gros Ventre)、奇帕威安人、克里族人以及北美该族人(Crow)被杀

害、被驱逐或被赶到保留地之后，蒙大拿作为白人的领地，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费德勒看来，蒙大拿作为荒蛮之地之所以充满了神秘色彩，部分的原因正是由于为了将这些“高贵的野蛮人”或“红皮肤”从西部除去，曾引发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些斗争今天已无从知晓。美洲土著人走了之后，最先来到这里的是狩猎者、山民、探险者、卡斯特将军、约瑟夫首长，接着是农场工人和其他分得土地的移民。原来的印第安人寄居地则被冠以这样的名称，例如“死去的印第安人”。

当你进入里德洛奇镇。驱车掠过一樽美洲土著人木雕，你会看见，在一块大石头上，有一副男性印第安人的头像，它是由一名非土著人刻的。蒙大拿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史被里德洛奇的山民编入了自己的节日活动（比如蒙大拿节）。这些历史意义丰富的活动在对死去的印第安人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否认了暴力血腥的过去，而这种暴力却是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统治权的核心因素。

表演蒙大拿

有许多种表演蒙大拿的方式。蒙大拿是一个当地人与外地游客混居的地方，来自康涅狄格的成群结队的钓鱼爱好者和讲芬兰语的当地小孩混在一起，这些孩子钓鱼时用虫子作诱饵，用竹竿作钓竿。这类蒙大拿表演同时融合了许多事物——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牛仔、绝技会表演、古典音乐、古玩收集者、滑雪者、山民、编织地毯的芬兰妇女、写诗的农场主妇和钓鳟鱼的男人。

顺其自然是蒙大拿人的基本性格。我的妻子与我都喜欢自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俯身去闻野花的香味，或者在河边散步。这种“与自然世界的接触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种天赐的经历”（Kittredge，1996，p. 108）。我们所在蒙大拿一角堪称稀有之地，它是天空之家，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用基特里奇和多伊奇的话说，那里经常有美妙的事情发生，因为只要我们表演，就

会发生美妙的事情。

如上诸端便是最低纲领主义者讲述故事以及表演性的质性探究所要展现的东西。在这些讲述中,世界变得生动无比。质性研究者必须让读者理解这些叙述的意义,从而向人们展示社会学的想象力何以可能做出一些对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事情。

第2章　解释性的观点

The Interpretive Point of View

本章将探讨解释互动论作为一种视角与方法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本章将讨论以下几个主题：①关键词；②心灵发现；③存在主义的探究；④自然主义；⑤纯粹的和应用的解释性研究；⑥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⑦性别、权力、历史、情感和知识；⑧解释标准；⑨解释性的议事日程。

解释互动论者试图解释、表演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很清楚，所有的质性方法都是辩证的解释性实践，这些实践不会偏离政治和文化批判。解释性的方法论提倡富有批判想象力的课题项目，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民主的社会。自诞生之日起，这一乌托邦精神就是文化研究和解释互动论的基本特征。

我在本章提出的方法涉及收集、写作、表演深度描述的经历故事。这些故事所表达的是各种充满问题的人际关系。在第 3 章里，我会详细说明从收集到表演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它的基本观点相当简单，研究者倾听、记录故事，然后做一些开放、生动、充满创造性的访谈，对故事作些补充（Douglas，1985；Holstein & Gubrium，1995）。深度描述、解释以及表演文本均来源于这些故事，所以我所提出的这一方法决没有什么神秘或玄虚之处，它所需要的技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就是与人交谈，倾听别人（包括自己）讲话的能力，以及将某个人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话记下来。

这些文本是根据记忆场景而不是经历本身写成的，接下来会有一个例子。

表演种族记忆

1966 年 7 月 28 日，埃奇市在其所属的十所小学取消了种族隔离，当地报纸称埃奇是伊利诺斯州第一个这样做的城市（Denzin，Field，Feinberg & Robert，1997）。

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是由一个成员全部为白人的学校董事会做出的。安德森女士是该董事会唯一的女性成员。我在报纸上看过她的照片，也读过有关她的故事。报纸上说她 1966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6 点 35 分死于家中。她 81 岁了，年事已高，肺气肿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当我去她家采访她时，她已近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条长长的透明塑料管将她和氧气瓶联结在一起，她的呼吸非常吃力，还不时地会咳嗽。她身着蓝色的天鹅绒大衣，大衣很长，漫过了脚跟。一看这身典雅的衣着，我

就知道她是个贵族。她的表情威严,高大华贵,只是行动迟缓,被与她相连的氧气瓶拖住了。她正对景色如画的窗口坐着,窗外有她精心照料的小花园,四周围着篱笆,里面有玫瑰、鸟食、常绿植物和一棵快要死了的白桦树。

我坐的沙发旁边有一张咖啡桌,桌上摆了瓶豆制品果子冻。我把录音机放在安德森女士的椅子边,并在她的衣领上别了一支微型麦克风。我得一直当心别让麦克风搅乱了她的输氧管。她开始说了,说她怎样让取消种族隔离在埃奇市发生的故事,她的故事从19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事是从两个人开始
詹姆士和马利连·丹尼尔斯
他们带领一帮邻居,黑人邻居
他们说:看,你们正在用公共汽车把这些孩子
从大学居住区运到学校
为什么你们不选马丁学校
为什么国王学校不向所有的孩子开放呢

(停顿)

三十年后
我回过头看,真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勇气
让那些人那样说
前前后后讨论了几次以后
我们的投票结果是6比1……
但他们找到我们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
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
那儿有一个种族隔离的学校……
我打心底里想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所作所为
竟允许种族主义的学校在那存在

她咳嗽了几下，接着起身去厨房拿了杯水。出来之后，她看着窗外，电话铃响了，但她没有理会，而是继续她的回忆：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对此事进行投票表决
我记得
这事太愚蠢了
你记得你是怎么想的
而不是你说了什么
我说
好吧，我们只是晚了 12 年
开始吧
我说了些愚蠢的关于女人的事情
比如，我受人尊敬
我坐在那对自己说
这将是历史性的
我们正在做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当然这事不会立刻发生
在董事会议之前
还召开过社区会议
其中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来自大学居住区的家长
我们会见了马丁学校的人
想起来真是可怕
我们坐在前面

董事会、大伙
问我们问题，然后他们
态度变得有些恶劣

我没有被吓倒
但真的是大伤脑筋
一位大学生

站起来说
这些人
这些从非洲来的美国人
不想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学校……
“这些人”
让我操心了 30 年

（停顿）

我们几位董事会成员中
只有一位公开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既然他死了，就可以说点他的坏话
他近乎是个国家卫道士
这是他的谋生之道
投票那晚
他刚从芝加哥回来
这个卫道士被派往那里平息暴动
他对着我说
你没在芝加哥呆过
听听那些黑鬼怎么辱骂你的吧

他投了“反对”票
我想我所受的教育和别人不一样
许多年来
我一直记得母亲说过的话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十年是在久利特度过的
那十年间，我们住在一家黑人家庭的隔壁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经历影响了我
黑人也是人
我无法忘记这一经历，时刻都会想起它
直到今天我仍有一些朋友是黑人

看到了录音机上的那张照片吗

我走进屋子，将录音机上那张巨大的家庭照取了下来，交给安德森女士，然后她又交给了我。这是一张特写镜头的彩色照片，上面有四个人，父母亲站在后面，前面两个是他们的孩子。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小孩是黑白混血儿。安德森女士解释道：

这是我的大女儿
和她丈夫
还有我两个漂亮的外孙女
她们好看吗

当我准备离开安德森女士的家时，我向她提起了报纸上将 1966 年的夏季称为“埃奇市的夏季之怨”，她很快做出了反应：

他们一定是从约翰·斯泰因贝克的小说中
引用了夏季之怨
这句话一定是他们从谁那抄来的
他们没那么聪明

采访结束后又过了六天，安德森女士一大早就从家里打电话给我：

你好，邓金博士
我是艾丽斯·安德森
你上周走后
我想起来
我保存了一本我在学校董事会工作时的记事本
我觉得你应该拿去
我想有人来讲述我的故事
现在我老了
很欢迎你来把它拿过去
如果你想要的话

阅读安德森女士的表演

我已经把安德森女士的访谈改编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文本。安娜·迪芙蕾·史密斯认为,这种文本应将讲述者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必须允许讲述者在自己的讲述中充分地表现自己。

安德森女士以讽刺的口吻表达了她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她鄙视这个种族主义盛行的世界,她用自己的话语创造了一种叙事蒙太奇。她向后回望,将自己投入1966年的夏天,沉浸于记忆与想象交织而成的世界之中。30年过去了,她从詹姆士和马利连·丹尼尔斯的行动中看到了勇气,她回想起她以及她的同事曾经绝不允许种族隔离的学校"出现在那",并将此称为种族歧视。在投票表决时,她说她是以女人的身份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在她的叙事蒙太奇里,安德森女士将自己和其他白人做了区分。在久利特,她家隔壁住的是一家黑人,她因此渐渐明白,黑人也是人。正如那张照片所显示的那样,后来她还把自己的观念传授给了自己的女儿。

埃奇市的取消种族隔离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1966年的夏季可谓是怨声载道。安德森女士的讣告没有提过她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事迹,报纸甚至连她曾在学校董事会效力这一事实都不曾予以报道。

个人传记

研究人员的传记或自我既是解释性研究的起点,又是解释性研究的终点。研究者所描述的事件与问题其实都是他或她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正如戴维德·萨德诺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视角对于"确定社会生活到底隐藏着什么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Sudnow,1979,p. 154)。我想补充一点,个人视角对于分析社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任务已经很明确，这就是去生产关于社会生活经验的详细叙事与描述（Sudnow，1979，p. 154）。在这项事业中，作者“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人可以咨询”（Sudnow，1979，p. 154）。所有重要的成果都是从这一立场产生的：只有你能写出自己的经历，没有谁可以代替你，与此同时，就你的经历而言，也没有谁能够写得比你好，你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澄清术语

在具体展开讨论之前，有几个概念需要界定一下：

1）解释性：对某种意义进行解释，或赋予意义。

2）解释者：向别人解释或翻译意义的人。

3）互动：个体之间的活动，紧急情况下共同行动的能力。人类的互动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性的、象征性的，包括语言的使用，由此便产生了另一术语，即象征性的互动。

4）成问题的互动：作为交往的结果，它赋予个体活动以基本意义，这类有问题的经历能够改变个人看待自己及其人际关系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显示自己的个性。

5）解释互动论：从一定的观点出发，赋予问题重重的象征性互动以意义。

解释互动论者是这样的解释者，他或她以问题重重的活生生的经验为考察对象，这类经验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符号互动，解释者必须将这类经验中的意义解释清楚。

一个范例

下面这段叙事节选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它所刻画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之后的心理状况：

> 他的双手一点力气也没有，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手变得越来越麻木、僵硬，他很怕一松手把斧子弄掉了……突然他似乎头昏了……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他把斧子拿出来，双手抡起，不知道自己都干什么，几乎没有使劲，完全机械地把斧背砍到了她

头上……老太婆……个子矮小,斧背正好砍在她头顶上,她喊了一声,但非常轻……他又砍了一下……鲜血涌出,就像一只装满水的玻璃杯被打翻了……他往后退了一步……尽量不让流淌的血沾上。(Dostoyevsky,1866,1950,p. 71)

在这段蕴涵丰富细节描写的叙述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生动刻画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时的复杂心情。它描绘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行动时的思想与情感,并且不厌其烦地描写他的行动。它将读者带入当时的情境之中。小说中的其他人解释这桩罪行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具有什么意义。解释互动论者必须致力于创作、表演和解释类似这样的叙述。

解释性方法的发展

本书所采用的批判性解释方法与许多著作都有联系。这些著作出自不同的学者,包括马克思、米德、詹姆士、皮尔斯、杜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葛兰西、韦伯、胡塞尔、萨特、席勒、梅洛—庞蒂、舒尔曼、巴尔特、德里达、拉康、格尔兹、哈拉维、希尔·科林斯、安扎尔杜阿、胡克斯、蒂利、罗萨尔多、史密斯、哈贝马斯、霍尔、布鲁默、贝克、戈夫曼、加芬克尔和施特劳斯。今天这一方法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传播学、教育、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商业、健康与医药、英语与比较文学、哲学等。

这一方法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包括解释人类学或社会学、解释学、文化研究、现象学、符号互动论、民族方法论、案例研究法和芝加哥社会学派,但是,要将所有这些方法都贴上"解释性"这一标签,或许是个错误。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性视角,因为研究人员会用不同的理论来界定这种方法,诸如批判的、质性的、自然主义的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有些人的目标在于基础理论,另一些人的关注则在于过程

与想法,并不计较属于何种理论。有些人喜欢在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下从事解释工作,试图推出有关人类社会、人类行为以及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论。另一些人则是从充足的经验以及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经验等角度出发,来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评价自己的理论解释工作。有些人避免使用主观性的概念,比如自我、意图、意义和动机,企图找到观察人类行为之普遍性、恒常性的理论范式,他们是在日常世界习以为常的对话与行为结构中寻找这种理论范式。

关于人文科学领域这些不同的解释方法,兴许可以写出一部专著来,但是由于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因,我决定不去写这样一本专著,而是提出我对解释的理解,并将其命名为解释互动论,这一术语意味着这样一种尝试,将传统的符号互动理论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著作以及传统解释学联系起来。此外,解释互动论还与近年来的诸多理论著作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后现代理论、C. 怀特 · 米尔斯的批判性、让 · 保罗 · 萨特、毛里斯 · 梅洛—庞蒂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建构能对后现代时期人类经验作出解释与批判的研究、表演与文本(Baudrillard,1983;Lyotard,1984;Mills,1959)。

开启解释的世界

作为一种真正质性的社会研究方法,解释互动论试图将活生生的经验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如前所述,这种研究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对于改变或塑造个人的生活意义或人生计划有重大影响的生活经历,很明显,与其他一些旨在揭示更为普遍、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内容及特征的解释性方法相比,这里的解释性方法所探寻的乃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真实"(Sartre,1943,1956),它所关注的是"心灵发现"。

主体的经历与心灵发现

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个谋杀犯和投票决定取消种族隔离的安德森女士,那些交往的时刻会在个人生活中留下痕迹,并有可能引发各种转折性的人生经历(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s),这就是"心灵发现"(Epiphany,Sams,1994),个人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时刻会表现出来。通过详细记录这类经历,研究者便可以揭示个人生活的危机时刻。作为人生历程的转折点(Strauss,1959),这一时刻既可以由遭遇危机的人亲自揭示出来,也可以由别人来揭示。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时刻之后,个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或许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什么是"心灵发现"。在基督教里,心灵发现是指每年1月6日的主显节(epiphany),即基督在非犹太民族的圣贤身上显灵。从这一意义上讲,心灵发现是指基督神性的显现。接下来将介绍马丁·路德·金早年生活中发生的时刻。1956年1月27日晚,26岁的金接到好几个要他性命的恐吓电话,之后他无法入睡,他一个人坐在厨房的饭桌旁,开始忧虑他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司机抵抗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南部基督教领导委员会的领导地位,他坐在那儿,内心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召唤。

金后来说:"我听到了耶稣在说话……他答应永远也不会丢下我不管,永远不会让我孤独作战。"戴维·J.加罗所写的马丁·路德·金传记描述了这一时刻,对此,历史学家豪威尔·雷恩斯评论道:

> 其他传记作家也写过这段经历,但是加罗先生要求我们将它看成是马丁·路德·金的人生转折点,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将来的岁月里,每当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就会想起这段经历。(Raines,1986,p.33)

加罗强调的一点是金在他的一生中总会不断地想起这次"心灵发现",并将之称为"厨房里的洞见"。

在《都柏林人》中,詹姆士·乔伊斯也采用了"心灵发现"这一叙述策略。事实上,乔伊斯后来在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始笔记中,将之称为一系列的心灵发现。对于乔伊斯所使用的这一写作技术,勒温曾做过探讨,他说:

> 乔伊斯强调,令非犹太人惊讶的显灵与都柏林人行走在大街上产生的灵感在反讽效果上是不同的。在他看来,都柏林人那些空洞污秽的左顾右盼……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示意。正如刻意挑选的部分可以反映整体,一个单词或细节也足以显示某个人的性格特征或某种际遇。(Levin,1976,p.18)

下面一段叙述引自《都柏林人》,其中可以看出乔伊斯是怎样运用这一写作技术的:

> 这个一脸愁容的男人……心中满是怒气与仇恨……他痛恨眼前的一切……
>
> 他的妻子是个看上去有点尖酸刻薄的女人,丈夫没喝醉时,她就欺负他,而当丈夫喝醉了时,她就会遭丈夫殴打……一个小男孩从楼梯上跑了下来。
>
> 谁? 这个男人说……
>
> 是我,爸……
>
> 你妈呢? ……
>
> 我晚上吃什么……
>
> 你把我惹火了!
>
> 我的天,我想再教你做一次……
>
> 他……紧紧抓住拐杖……
>
> 我教你再把我惹火……
>
> 小孩子大叫了一声,爸! 接着围着桌子一边跑一边哭,但这个男人……揪住他的上衣……
>
> 听着,你下次得把我再惹火一点(这个男人嚷道,一边恶狠狠地用拐杖击他),听到了吗? 你这个小鬼。(Joyce,1914,1976,pp.108-109)

在这段叙述中,乔伊斯刻画了一位正在朝孩子发火并且动

粗的父亲，在这次互动中，父亲的暴力性格体现得十分鲜明。

接下来将介绍另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殴打妻子，它也是“心灵发现”的实例，其中所描述的是一名受到殴打的韩国妇女的生活经历。现在这位妇女已经和丈夫分开生活了。

>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殴打之中，尤其是刚结婚的那些天，但我想告诉你最近的一次。8 个月前，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在遭到殴打的过程中，我跑出了家门……但他冲出来，抓住了我。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回家里，将我推进浴室，用脚踢我。孩子大哭了起来……现在我常常头疼，出去买东西时，看不清东西，我的眼睛也疼，而且头疼……我不会原谅他！我恨，恨死他了……难道这一切就仅仅因为我是个女人？（转引自 Cho，1987，p. 236）

另一个受到殴打的妻子是这样描述她的经历的：

> 他不让我睡觉，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从半夜一直坐到天亮。他逼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却在一旁喝酒。这事持续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他都对我说同样的话，就像是录音机里放出来的一样。他骂我是无情的婊子，怀疑我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不是处女……刚结婚的那些天里，他老逼迫我脱光衣服，然后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我，接着又逼我跳舞给他看。（转引自 Cho，1987，p. 231）

这些家庭暴力记录生动描绘了遭受殴打的妻子们的悲惨经历，她们的话语让过去的经历活了起来。这些经历构成了妻子与丈夫相处的转折点。乔将这些经历与她们后来的婚姻破裂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这些经历，导致了婚姻解体（Cho，1987）。

心灵发现的类型

心灵发现有四种类型：重大影响的、积累型的、启示性与微小的、事后醒悟型的（参见第 8 章）。影响重大的心灵发现是指那种能够改变个人生活，使之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经历。比如《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次谋杀行为。积累型的心灵发现是由一系列的事件造成的，这些事件塑造了个人生活。例

如，一名妇女在遭受了数年的家庭暴力之后，谋杀了丈夫或提出离婚申请。启示性与微小的心灵发现所暴露的乃是某一处境或某种人际关系中潜在的紧张与问题。乔所描述的妻子遭遇属于这一类型，她们不断地受到丈夫的殴打，正如其中一位所描述的那样，她在新婚不久的那段日子里，曾被丈夫殴打了许多次。至于事后醒悟型的心灵发现，则是指个体再次体验或回忆自己的重大人生转折点。前面提到的韩国妇女便是在回忆自己遭丈夫殴打的经历。

定位心灵发现

心灵发现往往出现在问题重重的交往情境中，个人在其中面对或者经历着某种危机。个人困境常常会演变成公共议题，比如，一个受到殴打的妇女离家出走，到警局去寻求帮助，或者一个酗酒者到酒精治疗中心寻求帮助。

普遍的心灵发现则出现在个体生活四周范围更大的历史、制度及文化场域。正如 C. 怀特 · 米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解释性的学者应致力于理解“广域的历史背景对于各类人群的内心感受以及外显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Mills，1959，p. 5）。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个人问题或困境与范围更广的社会或公共议题联系起来考虑。困境是个人的，例如染上酒瘾，或成了一名伤痕累累的妻子，但议题却与公共事业及体制结构有关，例如，为帮助酗酒者而设立的治疗中心，为挨打妻子提供帮助的避难所。米尔斯说：

> （困境）与个体的性格或人际关系有关，它不会超出这两个范畴。个体必须处理好自我，同时还必须协调好他所意识到的有限的社会生活……困境是私人的事情，个体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
> 另一方面，（议题）则超越了个体当下所处的环境，也超越了他的内心生活范畴，它与整体的社会历史传统和组织结构有关……议题是公共事情：公众觉得心目中的价值受到了威胁。（Mills，1959，p. 8）

米尔斯认为，我们的任务正是去探究如何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境或个人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

困境常常是个人传记性的，公共议题则是历史性的、结构性的。传记与历史因此一同介入了解释过程，这个过程常常会将个体生活及其困境与历史性的公共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当个人或群体的危机来临时，个人便会陷入困境，此时的困境往往表现为个体的猛然觉醒。这些存在危机和转折际遇将个体推入了公共领域，他或她的问题随之也就成了公共议题。

从策略上讲，研究者既可以将心灵发现定位于那些使个人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的交往情境中，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采取回溯（顺藤摸瓜）的方式，沿着从公共到私人的工作路线，去寻找合适的个体对象，他们的困境后来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例如，乔便是先到汉城的受虐妇女中心，接着便找到了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在我自己的关于酗酒者的研究中，我也采取了顺藤摸瓜方式，先走访治疗中心，接着参加酗酒者的聚会，最后走进了酗酒者的个人生活（Denzin，1987a，1987b）。

心灵发现的界限、表现与结构

心灵发现是一种类似社会戏剧的经历，它由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组成，分为开端、中间和结束三个阶段。心灵发现所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结构的断裂。维克多·特纳提醒我们注意，就结构而言，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通常由以下四个阶段组成：“破裂”、“危机”、“调整”和“重建”（或“分裂”），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表现。以“调整”阶段的表现为例，它“包括分析导致不幸、冲突或疾病的潜在因素”（Turner，1986b，p. 41）。

许多表现均与生活危机有关，尤其是“青春期、婚姻与死亡”，特纳认为，调整以及生活危机表现“都有一定的阶段性，在此阶段发生的经历同样也有独特的结构”（Turner，1986b，p. 41）。这一阶段的经历偏离了日常生活，其基本特征是出现模糊且略显怪异的形象，幻觉符号、苦难、耻辱、性别颠倒、哭泣、斗争、喜悦和悔恨（Turner，1986b，p. 41）。

总之，心灵发现是由许多表现构成的有限的经历，一般来

说，它包含四个时刻：断裂、危机、调整、重建或分裂。

普遍的个体

解释互动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是普遍的个体（Sartre，1981，p. ix）。没有人是纯粹的个体，他或她必须被看成是更普遍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进程中的个体，如萨特所言，人“是个综合体，他所处的时代会抹平他，将其普遍化，之后他获得自己的个性，也就是在时代的普遍性中形成自我，并以为自己是一个个体”（Sartre，1987，p. ix）。每个人都是自己，但看起来又和另一些人相似，以心灵发现为基本关注的解释性研究试图揭示个人生活中普遍与特殊、私人困境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所有的解释性研究都是历史的和传记性的，它们总是深嵌于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历史时刻。

什么是解释互动论

解释性研究具有以下诸多特征：①它是存在主义的、互动的、自传性的；②它是自然主义的；③它既细致又严谨；④它既可以是纯理论研究，又可以是应用研究；⑤它依托第七时刻的理论资源，尤其是针对实证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⑥它所涉及的是性别、权力、知识、历史和情感的社会建构。接下来将逐一讨论这些特征。

存在主义的互动文本

只要个体进入社会情境，就会出现互动文本，它真可谓是无处不在，它就是交往本身。解释性的研究者收集、分析存在经验和互动文本，对此，我们称之为“存在人类学”（Goffman，1983，第 8 章）。

戈夫曼、加芬克尔以及他们的学生所研究的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互动及其解释。这些研究人员从戏剧、编剧、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以及现象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探

讨。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眼前的世界当做各种仪式来加以解读，他们强调交往的社会建构性，考察各类交往的易碎特征，他们成功实现了将微观的交往世界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包括性别、种族、民族、工作、医疗、心理、科学、娱乐以及休闲等，联系在了一起。

就解释程序而言，他们这些人的工作有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这项工作既非自传的，又忽视了历史。他们没有将交往放在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予以考察。第二，他们很少讨论存在主义的意义，也没有对相关的交往经验展开分析（Garfinkel，1967，pp. 116-185；Goffman，1961b，1983）。第三，他们将许多外延性的主题插入了交往文本阅读。第四，他们过分注重从广域的社会结构及仪式问题等角度来解读交往文本（经验），而很少涉及交往本身出现的问题（加芬克尔常常忽视这些问题，尤其在处理交往的破裂与中断时更是如此。不过，戈夫曼的著作倒是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戈夫曼与加芬克尔对交往者以及交往采取的是一种非个人的结构主义观点。的确，他们研究的是"时间与人物"，但不是"交往中的时间与人物"。

个人的与范式的研究

加芬克尔与戈夫曼的交往研究方法是范式的、非主位（etic）的（Allport，1942；Pike，1954），而不是个人的、主位（emic）的（Allport，1942；Pike，1954）。范式研究所寻求的是对现象的一般抽象，因此在解释的过程中常常忽视历史，非主位则是指从外围展开探索，即常常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以揭示人类交往的普遍模式。在他们看来，他们所研究的交往过程是超文化的。对戈夫曼而言，普遍模式或许就是交往的外在仪式，而在加芬克尔那里，则可能是指对话过程中的标准规则。很显然，在这种跨文化的普遍视野下，某一具体交往情境或文化中的特殊意义结构都被撂在一边了。

相比之下，个人研究则认为，任何一个情境都是特殊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交往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由交往中的个体完成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所有个体的声音与行动都应予以关

注，并在文本中表现出来。主位研究同样也是个人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通过深度描述、叙事以及记录，来捕捉某一问题情境中所有交往个体的感受与意义，进而将个体借以与他人交往和创造有意义的经历的观念体系揭示出来。主位研究关注的是特殊意义，而非主位研究关注的则是普遍意义。

解释互动论无疑是个人的、主位的，它的兴趣不在于抽象与普遍。由于这个原因，戈夫曼与加芬克尔的交往文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之处。虽然他们的著作解释了交往的结构性规则，但由于这些规则都是超历史的，是非自传性的，所以并不能揭示某一特定的交往时刻对交往者意味着什么，与之相联系，他们在描绘个人生活中的心灵发现以及存在危机时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叙述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无法解释困境中的个体会有什么样的存在危机和心灵发现。

萨特的过程——回溯法

由于上面所述的那些原因，我主张采用另一种方法来解读交往文本。在问题场合，我曾推荐过萨特的过程——回溯法（Denzin，1963，pp. 85-166；1984，p. 183），并将它看成是批判性的解释方法。

过程——回溯法乃是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出发，来理解某一阶层对象。该方法旨在将个体的行动可能产生的结局一步一步地描述出来。例如安德森女士的表决，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谋杀和韩国妇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在这里，“过程”是指解释过程与事态进展之间的一致性，而回溯则是指向后追溯那些导致个体做出当前行动的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因素，通过向前与向后的分析，研究者便可以将研究对象及其行动定格在某一时空之内，进而就可以将个体在交往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生活状况揭示出来，而不同个体所可能遭遇的相似或共同经历随之也可以被揭示出来。

文学自然主义

解释互动论者总是在具体的情境或决策制订场合中构思

并实施解释互动论研究(Ryan,Greene,Lincoln,Mathison & Mertons,1998)。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并且常常使用报告文学中的叙事方法(Richardson,2000,p. 931)。它是在日常社会交往的自然(真实)世界中展开研究,它讲述各种故事,它以“精通人情世故”为基础(Denzin,1989b,pp. 234-235)。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有责任将自己的解释材料与方法尽可能地公之于众。精通人情世故的研究者均会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以求考察不同的经验情景。从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收集个人故事,并在此基础上作解释,它以斯塔克等人提出的案例研究、传记及民族志方法为基础(Stake,1978,2000),它超越了单纯的个案法,启用了多重的案例分析,包括生活故事、生活史及自我叙事。它使用了第3章里将要讨论的所有传记解释方法。

解释性研究者的分类

解释性的研究者可以分为两类。有些人,比如格尔兹(Greertz,1973,1983,1988)、施特劳斯(Strauss,1987)和贝克(Becker,1986)所从事的是纯粹的解释工作,其目的是对社会及文化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奥特纳将此称为“社会道德哲学问题的关注”(Ortner,1997a,p. 5)。这些学者的目标是去解释社会交往,例如,施特劳斯有关慢性疾病和医疗技术的专著便是去“描述相关人员的行为方式及其问题”(Strauss,1987,p. 34)。贝克关于学校教学如何失效的研究同样也是纯粹解释的范例(Becker,1986,pp. 173 ~ 190)。

由此可以引出另一类型的解释工作,即解释性的评论(评价),也就是奥特纳所说的“对当前社会问题展开评论”(Ortner,1997a,p. 5)。这类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乃是决策制订研究,他们对“重大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决策者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提供建议”(Majchrzak,197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须考虑决策者的观点,而是指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批评决策者的观点,并向决策者提出相应的政策(Becker,1973)。解释互动论者是肩负使命的道德思想家,他们从女性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视野出发,探究道德哲学与当

前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解释性的研究者能做什么

正如我在第 1 章里指出的那样，解释性研究能生产出有意义的关于社会进程的描述，分析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存在以及为何会延续下去的原因。解释性的评价研究还可以为改进或消除某一事件及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策略（Becker & Horowitz，1986，p. 85）。

从事这类解释性评价工作的研究者常常代表某一党派的观点（激进的、保守的），而其他人则可能会成为国家顾问（比如，他们为政府效力）。西尔曼曾对后一种情况作过分析，在他看来，当这类社会学家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时，他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便无法保持自由发表议论的姿态（Silverman，1985，p. 180）。

当然，所有的研究者都有立场，他不是代表这个党派的观点，就是代表那个党派的观点。价值中立的解释性研究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想象与理解来研究问题的（Gadamer，1975；Heidegger，1927，1962）。每一个解释者都无法逃脱解释循环，也无法逃避他所处的解释情境。这正意味着研究者在对现象作出解释之前，必须将自己的解释前提交代清楚；相反，倘若不首先澄清自己的理解与价值，那么之后的解释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无从谈起，而且更可能会遭到人们的误解。

后实证主义与独立研究假设

传统的社会研究（无论其形式如何）依据实验或半实验的方式假设社会进程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又被认为是可以准确地测量出来的，方法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收集相关的数据。经过这样的“客观化过程”，传统的社会研究模式就实现了将研究者与其所研究的世界分离开来。

这种模式认为，只要严格按照实证主义的因素关系范式（Lincoln & Guba，1986，p. 24-28），便可以把握社会进程。正如

我在第 1 章里提到的那样，这一模式是以以下几个假设作为基础的：

1)“客观”现实是能够被把握的。

2)研究者可以与他所观察的世界分离开来。

3)观察与归纳不受制于任何制度与现实的因素，言外之意，它们是普遍的、独立的。

4)因果关系是线性的，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同样，没有结果的原因也不存在。

5)研究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活动。

(关于以上各点的讨论与分析，可以参见 Lincoln & Guba, 2000)。

解释与科学

很明显，第七时刻的解释视角是批判的、后实证主义的(Lincoln & Guba,2000)。这一观点反驳了上述诸项假设，反驳理由如下所列：

1)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社会学一直认为自然科学的语言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这一观点认为，在量化、可观察的科学条件控制下，人们可以对社会世界作出科学的解释，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能得到证实。至于不能科学解释的现象则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教导，对其“保持沉默”(Wittgenstein,1922,p. 151)。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的主体性、意图以及意义等会被赶出实证主义的领地。与之相反，解释互动论恰恰是建立在研究、表达和解释人类的主体感受(经验)之上的。

2)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试图解释社会现象的形成原因，它这样做时所使用的分析语言大部分都脱离了日常生活，解释互动论拒绝使用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与分析模式，在它这里，所有导致结果的原因、路径、关系以及条件都得通过研究来确定，都是来源于对活生生的经验的理解。

3）在解释互动论这里，“如何”代替了“为什么”，也就是说，它所追问的是——社会经验或一系列的社会交往是如何被交往个体组织、建构起来的，又被交往个体赋予了怎样的理解？总之，它所追问的是如何，而不是为什么。

4）实证主义社会学预先设定了一套用以展开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独立于交往个体的生活世界。这套框架，无论其来源是古典理论，还是当代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韦伯、弗洛伊德、帕森斯、默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认为可以根据某些抽象的、宏大的或中层的理论来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并对其意义作出分析。活生生的经验及其意义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复杂的变量术语，包括基础、超验结构、劳动分工、官僚组织、自我功能、功能性前提条件、沟通紊乱以及意图行动的潜在后果等，就是这些预先设定的概念使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被从实证主义的分析体系中剥离出去了。

针对实证主义发起的批评还有许多，理由是这一理论框架认为，“从某个单一的观点出发，来俯视整个世界，这种想法绝对是可行的”，这个单一的观点正是所谓白人男性的观点，它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主体，它站在社会之外打量社会。在这一观点看来，人们绝对能够从客观的观察者这一位置出发来描绘社会（Smith，1989，p. 44）。作为社会理论家，这个观察者发表议论，怀疑世界上的真实事物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只是表象，从而使得社会生活感受遗落在社会理论之外。这个观察者提出一套解释框架，认为必须将社会现象看成是客观的社会事实（Smith，1989，p. 45），并且在研究现象时，尽量不去谈论行动、目的、意图以及意义，然后把所研究的现象纳入所谓关于社会的文本，使得社会现象只能按文本预先给它定好的描述表现出来（Smith，1989，p. 45）。在这类文本中，真实的活着的人统统被话语的虚构之物所代替，表现为某种“理想类型”、理论家的冷漠观察结果或某个脚注里的只言片语（Smith，1989，p. 51）。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试图颠覆这种社会科学，她们从女性

的生活经验出发,这些经验来源于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体制,正是它将妇女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如克劳夫所言(Clough,1994,p. 74),女性主义的立场乃是建基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妇女身份(家庭主妇、操持家务、母亲、女儿等),然后向外扩展到公共领域的妇女身份(秘书、行政助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演员、作家)。女人不仅有着不同于男人的理解,而且从妇女的经验出发,能够对现实作出更为准确的再现(Clough,1994,p. 74)。这一观点将抹去日常生活中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差异,进而生产出有关社会世界的具有性别色彩的地方性知识,向人们展示家庭制度是如何通过不断复制文本话语塑造她们的日常生活的(Smith,1993)。

5)解释互动论尽可能地不去使用任何概念,以求做到自由地谈话与表达,它的表达模式常常定格于第一人称、原汁原味以及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想法,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描述性的现象学和解释互动论是在尝试诠释"世界的散文"(Merleau-Ponty,1973),使之通俗易懂。这一诠释工作认为,由情境和感受汇集而成的日常生活绝对不会听从实验、统计、比较和因果关系的摆布,相反,任何一种人类生活情境都是独特的、突发性的,充满了多重味道,包括冲突、意义与沟通。解释者所要把握的正是这些意义与矛盾的核心内容。解释互动论者认为,普通大众的语言完全可以用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6)实证主义者无法了解所有的人,言外之意,他们并没有去观察所有人,但却认为自己提出的主张对所有人都有效(实际上这是他依据几个随机样本胡乱做出的判断)。无疑,这一点乃是当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特征。解释主义者从不把归纳当成目标,更不会随意挑选人类经验的样本,在这一点上,他们愿意接受斯塔克的见解,斯塔克说:"人们往往偏爱案例研究……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讲,它能引起读者的经验共鸣,也正因为这一点,人们很自然地会以案例作为归纳的基础"(Stake,1978,p. 5)。解释性的研究者期望自己的解释能够引导读者反思自己的经验,并归纳其中的意义。对解释主义者来说,无论何种问题重重的社会交往案例,只要对它进行深度描

述(Geertz,1973;Ortner,1997b),并且与个人困境有关,便可以作为解释性探究的合适主题。

通过研究社会交往的片段、顺序以及实例,解释主义者便可以将社会交往的意义、细微差异、内涵与结构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来。这些层面极其多元复杂,而且常常相互矛盾,有的来源于他人的生活史,有的则是个体自己造成的。解释性的探究还得去揭示这些经验背后的知识及控制机制。所有的探索主题均含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结构与意义,解释主义者就像作家或画家那样,让读者在自己的文本或散文中来回穿梭。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还会精心刻画自己捕捉到的人类经验片段,好让读者看了之后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传记与研究

这个世界并非静止不动,它绝对不会与科学家的逻辑分析相吻合,它有属于自己的辩证法和内在逻辑。观察者只能以参与的方式来揭开这些逻辑的意义。世界不是在观察者的想象或组织之外存在。从这些考虑出发,解释互动论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其实是非常合适的探究对象。与主张主客两分的实证主义者不同,解释主义者参与社会世界,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更详细、更生动地理解、表达社会生活的内涵。对此,米尔斯强调指出,“学术界最出色的思想家……从不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学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到你的知识工作中去”。(Mills,1959,pp. 195-196)

解释互动论者认为,一个人要想对人类经验作出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就必须将自己彻底投入到他想要解释和理解的现象中去。梅洛—庞蒂指出,经验世界有着内在的不可确定性(Merleau-Ponty,1973),体系主义者试图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其方法正是跳到日常经验世界之外,但这对于解释主义者来说却一点也不适合。

针对实证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

针对实证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将性别失衡看成是社会世

界的中心问题(Olesen,2000)。与之相联系,性别行动或事件成了基本的研究关注。社会的性别分层体制制造了支配与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妇女置于被支配的位置。研究者必须探索这一关系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没有所谓性别中立的知识,女性主义批评道,不可能存在客观的知识,知识应服务于解放目的。与解释互动论一样,女性主义研究也是批判的、传记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女性主义研究强烈要求文本表达妇女的心声。

总之,有关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解与解释必须与日常生活的性别、情境、结构、实践特征相吻合,由此可以引出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要求:

1)使用多重的案例研究及传记方法。

2)找出研究对象的危机时刻与心灵发现。

3)将个人困境一类的经验与公共议题、制度结构联系起来。

4)深谙人情世故。

5)透过现象,将研究对象的言语、感受、情感与行动揭示出来。

6)遵循解释的五步骤:解构、把握、化约、建构和深化(第3章将对此做详细探讨)。

7)将自己对于现象的价值立场交代清楚。

评价研究的解释标准

倘若从事的是关于某一计划的评价研究,研究者除了遵循上述要求之外,还必须增加下面几点要求:

1)收集计划相关人员的个人经历故事,这些相关人员包括志愿者、献爱心者和有偿的专业工作人员,此外,还要收集计划服务对象的个人故事。

2)区分对于问题及计划的不同理解(地方化的和科学主义的)。

3)分析导致上述理解差异的道德偏见。

4)在自己所研究的情境中,揭示不同真理模式之间的较量(比如理智与情感)。

5)收集有关献爱心者与受助对象之经历的详细叙述或记录。

6)从研究对象的语言、想法、情感及行动出发,将所要评论的现象呈现出来。

7)在了解各类相关人员的经验与想法的基础上,对计划作深刻的分析与解释。

8)以上述解释为基础,对计划作进一步的理解。

9)比较有关计划的科学主义和地方化的解释。

10)说明数据分析是如何曲解、掩饰计划实施的真实状况。

11)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改进计划的建议,并在计划的现有框架内指出改进的可能性。

如果研究者按照上述要求开展工作,其他研究者就可以评估他的工作。除此之外,这些要求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建构自己的解释性评价研究。这类研究承载了特定的价值,代表的是受助一方的立场。

解释过程是由与知识相关的历史、权力、情感以及信仰所决定的,接下来我会讨论这一点。

历史、权力、情感与知识

历　史

历史进入研究过程的方式有四种。第一,被研究的事件和过程是在时间中渐渐显露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事件及其进程有自身的历史意义或暂时性。第二,这些事件是在更大的历史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受其影响、被其限制、由其塑造。这些结构包括语言(各种各样的形式)、微观及宏观的权力关系、习以为常的文化意义(它们支撑着日常社会交往和社会经验)。第三,在个人生活史及自传这一层面,历史同样在发挥作用。

在被探究的事件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生活史走入交往世界。第四，在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自身也有生活史，而且如前所述，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史与解释过程是有联系的，前者会对后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权 力

历史与权力、情感相互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弥漫着权力，它深嵌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性别）关系之中（Foucault，1980，2000）。如福柯早已指出的那样，权力有如毛细血管般遍布于日常生活领域，并沿着其中的支配关系发挥作用。权力是力量与统治，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会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过程，男性与女性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制与体制之间，均可以找到这种支配性的权力。权力是力量，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控制形成的支配关系，常常表现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摧毁。权力既破坏又建构，它在推翻已有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会建构出新的社会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回忆前面提到的乔的研究，即那些被丈夫殴打的韩国妇女。

解释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权力。各种真理及知识话语所表明的其实都是权力关系。研究者常常被赋予权力——进入情境，作出解释，作为回报，他们得向掌权者汇报自己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又常常会把他带回原始情境，由此还会产生新的社会安排。

研究过程的每个方面都存在微观的权力关系。只要研究者进入情境，开始观察，权力就会产生。被研究的世界里存在权力，因为被研究的世界是由一种权威关系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此外，还可以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模式、观察方法和实验、半实验的研究计划等角度来理解研究过程中的权力。科学可以作为“一种实施的权力”进入研究场景（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将科学的权力与威望带入研究过程。

意义与作用

奥特纳指出，福柯主张“我们不要去观察文化形式及实践

的意义……而应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其对象身上以及对其所属世界施加的影响"(Ortnet,1997b,p. 137)。例如,匿名酗酒者的举动其实是在告诉人们,他是个酒鬼。这些实践积累在一起便会产生某种主体形式,在这一主体生产过程中,可以看出话语的作用。将注意力放在作用上,有助于揭示权力在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并描绘话语体系的意义空间。话语的符号秩序与意义系统常常表现为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在这里,理解行动者的观点构成了话语分析的核心任务。

情 感

深入考察即可发现,在解释性研究的过程中,到处都弥漫着情感。研究者本人的心情与感受、研究对象的生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研究者的观察过程等等方面,均充满了情感。情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或表现为大权在握,或表现为手无寸权。解释性研究有关权力与情感的分析能够证明所谓超然、不受情感左右、纯粹客观的解释其实根本不存在。

知 识

知识是一种或一套有关特定现实的观念,它是社会与政治建构的产物。知识与权力有着本质的关联。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不仅创造知识,而且还决定知识的应用场所。他们决定如何界定知识,以及什么不是知识。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并不是起源于某一求知主题……而是源于支撑它的权力关系……所有的知识都是政治性的……正是权力关系为知识存在提供了可能条件"(Foucault,1980,p. 220)。

权力与解释

在实证主义范式中,量化的、应用的评价性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的、正确的知识,只要获得这种知识,它便会被认为是具有切实有效的社会实践力量。但是,在解释主义范式中,知识既不会被认为是客观的,也不会被看成是绝对正确的,相反,知识所反映的是解释框架、情感及其所属情境的权力关系,而从结

果上看，解释性研究所能做的只是去解释个体的交往世界。

解释的标准

第4章里我会详细列出解释的评价标准。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参照第1章里的相关讨论，并对之作些深化之后，可以认为，这些标准包括解释现象的能力，尤其是深化解释的能力，没有它，便无法将经验的历史、关系、过程及交往等方面的特征揭示清楚。解释必须以对现象的了解为基础，一定要与先前的理解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解释还要保留一定的开放性，使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可以根据上述标准来评价研究者在解释五个阶段上的进展情况。这五个阶段是：解构、把握、化约、建构和深化。解构是指对先前的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解释。把握是指研究者获得多种多样的真实经验事例。化约是指研究者从自己所观察的交往经验中提炼出关键或基本的特征，例如挨打妻子的生存空间。建构是指完整地解释事件或过程，例如，将妻子挨打的全部过程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深化是指将现象置于活生生的经验世界中考察，例如，乔就曾将挨打妻子案例放在他之前研究的韩国妇女婚姻状况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当研究者进入解释过程时，他或她总是会处于解释循环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跳出解释过程，而始终是其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

解释场景定位

在第3，4章里，我会讨论解释性研究如何在真实的社会世界中定位，它包括寻找、描绘研究地点，将社会文献与传记材料与研究地点联系起来。研究者必须学会当地的口语，熟悉当地的人际交往及各种仪式与惯例，并将传记材料与当地社会群体的交往与表现联系起来。

深度描述

深度描述试图吃透交往场景中的意义与感受,把握当事人对于事件的解释以及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物流露出来的想法。这些都为深度描述奠定了基础。深度描述还试图将考察对象的经验中那些起支撑作用的意义揭示出来,它是一种以深度描述为基础的解释,它在解释经验的过程中,能让读者领会经验的核心内涵。在它看来,所有的意义都是象征性的,既有表层意义,又有深层意义,与此同时,意义还有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它转向深度描述,常常将传记与活生生的经验联系起来。以深度描述为基础的解释实践乃是去理解个人的观点,并将此看成是解释的黑匣内任务(Ortner,1997b,p. 158)。这一解释模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建构"(Ortnetr,1997b,p. 158),并为那些告别抽象理论的研究者开辟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学术天地(Ortner,1997b,p. 158)。

解释与理解

解释是一种揭示事件或经验之内在意义的过程。这里的意义是指某个人的行为与意图。总之,解释就是对某一符号作刻意的说明(Peirce,1963,p. 108)。意义涉及三个维度,包括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②目标、事件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③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事件或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Blumer,1969,p. 9)。可见,这里的意义既是交往性的,又是解释性的。解释即是澄清意义,它或许会将以这种语言讲出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代码。当然,它也可能将某一文本或交往片段所包含的意义呈现出来。

理解是去体会、领悟某一情境或文本中已有的各种解释(参见 Ricoeur,1979,p. 96)。例如,游客在外国旅行时,常常弄不明白别人的请求,除非他能够将那些请求翻译成本国语。这个例子虽然有些简单,却能将解释过程与理解过程同时包含在内。

描述的两种类型

描述为解释提供框架，也就是说，你得先将你要解释的行为或过程描述出来。描述或深或浅（Ryle，1968，pp. 8-9）。浅度描述只要列出事实即可，例如：

> 1987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8点，X喝了一杯咖啡，当时他正在给出版商写信。

同样的事情，深度描述则可能是这样的：

> X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他想起出版商曾来信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初稿。他把咖啡、香烟拿到写字台上放好，开始写信。他想在信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初稿迟迟没有完成，再找些理由让出版商延长期限。写信过程中，大女儿的电话打断了他，问他如何把一个字输入电脑，他回答女儿之后继续给出版商写信。突然他大发脾气，因为他觉得他在这封信上花了太多时间，他不想解释了，而是直接告诉出版商一个新的初稿完成日期。

深度描述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描述行动的来龙去脉；②交代行动是在何种意图与意义的作用下组织起来的；③追踪描述行动的变化与进展；④将行动描述成可以细细解读的文本，相比之下，浅度描述只需交代一下行动事实，无须去描述行动的意图和周围情景。

解释的类型

解释是理解的基础。解释与理解分为两大类型：情感型和认知型。真诚深刻的理解来源于分享彼此的情感与经验，这正是解释互动论试图建立的理解。认知型的解释与理解同样关注现象的基本意义，但是将情感注入其中，这种解释模式会用数学公式，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表达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但绝不会去描述其中的情感意义。

所有解释性的研究都是以深度描述为基础，没有它，便不可能有真正深刻的理解。当研究者考察消极案例或非常规经

验时，就会出现这种讲求深度的解释模式。

议事日程

解释互动论的核心部分在于深度描述、深度解释与真诚深刻的理解。如何将它们写成文本，并将它们表演出来，是本书的基本主题。已有的解释性文献显然鲜有深度描述，我们有义务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深度描述和解释，但当前并没有谁将这技艺教给他们，这一状况亟待改变。

与此同时，研究者应该实施各种旨在推行解释性评价的计划，这样做是为了将传记研究与米尔斯的社会学计划联为一体（Mills，1959），进而激励研究者在建构自己的解释工作时，能够从自己的生平经历出发。此外，研究者还必须提高自己的比较、历史及交往思考能力，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权力与性别关系。正是这种对权力以及权力如何塑造人类经验的关注，赋予了解释性研究以一种鲜明的批判色彩，而在各种保守的研究中，却很少能看到这种色彩。

解释性的研究者必须对其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提出尖锐的批评，包括批评问题现象背后的普遍文化构造，批评各种有关问题现象的科学主义思想与知识。

结　论

在本章里，我对解释互动论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了介绍。如各种结语所说的那样，所有解释性的研究——对米尔斯的观点作引申——均应直面21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恐怖与辉煌”（Mills，1959，p.225）。社会学家的声音能够传遍世界，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绝不仅仅只是人类经验的记录，用福克纳的话来说，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成为女人、男人的精神支柱，帮助他们反抗苦难、取得成功。我们的文本应该表达人类的痛苦、悲伤

与成就,并让人们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人类之爱和做人的尊严与荣耀。我们是好事者,但是对于我们所描述的生活、经验和故事,我们不会提出任何强制性的要求,我们在这里只是奉献——如果这算得上是一种奉献,我们所讲述的生活与故事文本永远属于那些把这些生活与故事告诉我们的人们。

最后,再说一点,如果你想理解、解释眼前这个世界,揭示其中真实生动的经验和意义,那你一定能很好地运用本书所探讨的那些策略。

第3章 搜寻生平经历

Securing Biographical Experience

本章将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讨论:①问题重重的生平经历范例;②传记方法及其与解释互动论的关系;③传记材料的评估、阅读与解释。

范 例

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它是桑德拉的母亲洛丽塔·K.多比说给民俗学家桑德拉·多比·斯塔赫、她的姐姐和她的表姐听的。她们四个妇女当时正在准备家庭野餐食物。母亲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教书,她教四年级,工作了近20年。

> 你讲述了一堆无聊的琐碎之事,其中的一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昨天在学校里,几乎每个人都疯了,争着要把所有的事都干完。我、校长、体育老师还有教练这几个人在一块。他们把事情全弄糟了。我坐在那儿想尽力弥补,但进展并不好。反正,我猜想每个人都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帮人在那边的办公室会面,我偶尔能听到他们的笑声。我知道他们在那讲黄色笑话,当然讲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这些女的走到靠近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会住嘴。这些女的刚好走到底时,教练下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大篮球。他把篮球往地上一滚,正好撞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我站出来说:"你滚篮球是什么意思?"(大笑)
>
> 那些家伙——一个朝这边走,另一个朝那边走。很快我就听到他们大笑的声音。我走进办公室,把门狠狠地一关。一直到他们回家,我都不敢伸头往外看。哦!我难堪死了。她们来敲我的门,梆梆声音很响,我冲了出来,凭直觉说了一句。直到我明白自己说了什么之后,我才发现我说的一点也不好笑,但是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转引自Dolbr-Stahl,1985,pp.55-56)

现在来看另一段叙述,讲述者是一位53岁的印刷工人,他准备参加两年内他的第二次A.A.聚会。

> 我没办法摆脱这倒霉的事情。父亲去世时,我曾答应他我会戒(酒)的。我确实答应过他,但是我做不到。父亲死时也是如此,父亲每天都要喝一夸脱老牌菲茨杰拉德

酒，长达30年之久，然后医生告诉他不要喝了，他就戒了。我姐姐也是个酗酒者，她也戒不掉。老板说，弗兰克你该戒酒了，我试了试，但是你知道，我早上去上班时走在路上一直发抖。我停下来买了半品脱薄荷酒，这样他们就闻不出我喝酒了。我把它喝了，然后恢复了平静。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感觉好极了。但这种感觉到早上10点就会渐渐消失，所以我会在小冰柜里放一瓶啤酒，并把冰柜放在车子的尾箱中，我出去吸了支烟，又偷偷喝了点酒，这才顶到了中午。接着我到老伙计餐厅吃午饭，要了两杯啤酒，其他人也在喝这种啤酒，这样我就可以挨过下午。

我的确做到了，直到下班都没事，但一会儿我就变得心慌意乱，难以自控地想喝更多的酒。每天晚上我都要不停地喝酒。我妻子知道，我一天是怎么过的。如果我有一天没喝酒，她就会为我感到骄傲死了。

我只想我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父亲做到了，可我没有做到。我真想离开一会，我的身体开始显得依赖酒精了，医生说再喝的话，肝脏就要出问题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只要我喝酒，身体上的所有毛病都会消失，一不喝，这些毛病就会来。你们有谁能帮助我吗？（转引自 Denzin，1987a，p. 25）

接下来是这一段：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得以控制住内心的忧郁，但是这个老毛病常常会再犯，没有人知道我怎么会犯这个老毛病——内心深处的隐隐伤痛。（Gustave Flaubert，1964年10月6日，转引自 Sartre，1981，p. x）

家里的一位朋友曾在一封信中谈到弗劳伯特的悲伤：

我的祖母教她大儿子读书，她希望他一会儿就能学会这些东西。弗劳伯特的妹妹小夏洛特坐在一旁，她学得很快，可他却跟不上。一阵紧张之后，他才发现，他学的那些东西对他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他哭了起来。（转引自 Sartre，1981，p. 3）

最后来看这一段：

> 4月26日，母亲正在整理我的旧衣服，她在祈祷，她说，我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中而不是从家庭和朋友那学到心灵的本质以及心灵的感受，阿门，就这样吧，噢，欢迎你，生活！我将遭遇成千上万次的磨炼，体会其中的生活真相，锤炼我的灵魂，并在人生旅程的煎熬中唤醒几乎消失的良心。(Joyce,1976b,1916,p.526)

概　要

解释性研究的主题是人生经历，是从普通男女的生活中概括出的人生经历。如同我在第2章里所讨论的那样，解释性研究是以有意义的传记故事或人生时刻作为组织线索。这些事件——主人公如何经历它、体验它，它们如何聚集在一起编织成主人公曲折丰富的生活历程——构成了解释性研究的焦点。上述几个例子所反映的都是人生经历中的某些片段。在第一个叙述里，多比·斯塔赫的母亲在中学教书时遇到一些尴尬的两性交往经历。第二个故事中，一位印刷工人去参加A.A.聚会，他想去寻求帮助，以消除他的酗酒毛病。在第三个故事里，萨特描述了弗劳伯特的一些人生经历片段，包括语言学习方面进展缓慢。最后那个故事摘自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叙述了史蒂芬·迪达卢斯拒绝成为一名传教士，最终决定离开爱尔兰前往欧洲大陆，去当一名作家的故事。

在本章里，我将把这些故事当做传记方法的范例，并探讨它们与解释互动论的联系。我首先会对传记方法的诸多类型进行分类，接着详细讨论如何评价解释性研究中的解释。

叙事时刻

我们此刻正生活在叙事时刻(Maines,1993)。有关社会知

识的语言学分析及文本分析目前十分受推崇。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均属于故事或叙事再现范畴。自我是叙事的产物，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区分也已消失。社会物质条件、话语和叙事实践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自我及其身份属性。叙事的双重使命有些复杂，自我与社会均是叙事之物，这就是为什么叙事会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之首要关注的基本原因。

叙事是一种讲述性的、表演性的行为事件，是编故事、讲故事的过程。故事是一种描述，是叙述不同情境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里，故事与叙事几乎是一对同义词）。故事包括开端、中间和结尾。每个故事均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包括叙事者、情节、场景、人物、危机与结局。那些能够记忆并能再现出来的经历将会成为故事所叙述的基本内容，我们没法直接走入同样的经历，我们只能通过再现、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研究过去的经历。

传记式的解释方法依赖于故事、叙述、叙事的收集、分析与表演。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个人生活的转折时刻。叙事是片刻性、即时性的作品（Culler，1981，p. 187；Ricoeur，1985，p. 101）。叙事内容独立于故事讲述，虽然许多叙事只能由亲身经历的人来讲述，例如，桑德拉 · 多比 · 斯塔赫就不能讲述她母亲讲述的故事，虽然她听过母亲讲述之后，也可以将母亲的故事讲给那些愿意听的人。叙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些意义重大的人生经历。

我们如何收集、分析故事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故事。如果我们把故事看成是一种叙事形式，则我们可以通过组织上的、半组织上或非组织上的访谈，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故事。我们还可以通过自由交往、集体性编写自传等方法来获取故事。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可以对作为叙事的故事进行内容分析、话语分析和文化或文本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从形式和结构、从符号学，甚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故事进行分析。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预先存在的各种叙事（即各种虚构），言外之意，故事可以与范围更广的叙事结构联系起来。

让 · 保罗 · 萨特、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姆提醒我们（Sar-

tre,1963;Holstein & Gubrium,2000,p. 103),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故事往往包含意义更为广泛的文化及历史信息。个人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个体,所谓普遍性正是来源于个体所处的历史时代。作为即时性的作品,自我的叙事离不开自我所属的地方文化体系,该体系内的解释实践自然会对自我的叙事产生影响。故事讲述者有自己的力量和自我反思性,他们通过故事描写自己的现实状况,故事与生活相互联系,彼此界定对方。

但是,叙事却有许多模式:矛盾叙事、碎片叙事、宏大叙事、地方叙事和常规叙事。各种叙事均可以赋予重大的生活事件以某种意义。这些叙事常常会成为力量的汇集之所。私人的、公共的以及性别的主体,甚至包括自我均隐藏于叙事之中,并由叙事建构出来。在各种叙事中,个体被推到当前话语体系的对立面,这些故事的主题涉及性、家庭、工作、劳动、种族、私人生活、政治、老年化、失业及死亡。当然,叙事并不生产任何有关事件的真理,也不反映经验的真理,叙事只是产生对事件的反思,从这一意义上讲,叙事所呈现的是个体对所知世界的反思而不是所知世界向个体呈现其“真理”。

威廉·基特里奇提醒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不停地与叙事,与我们讲述或听到的故事,与我们憧憬、想象或想去讲述的故事,纠结在一起……我们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叙事之中”(Kittredge,1996,p. 157)。故事让我们面对周围嘈杂的世界保持一份安定,并帮助我们在情况变得不妙时能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清醒的认识。

自我、叙事与神圣之地

我们生活在故事中,我们通过故事表现自我的人格特征。叙事自我有如一幅图画,它所展现的正是我是谁。叙事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点事情要去操心,它还让我们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的。但我们需要更为宏大一点的叙事,从而将我们与别人、社区、道德以及道德自身联系起

来。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这一刻,我们需要新的故事。

在描写蒙大拿和西部的作品中,基特里奇说,我们应该采用新的不同的表现方式来创作有关蒙大拿的叙事。他要求人们在书写这块神圣之地的过程中能将自我融入叙事之中,我们必须为自己创作出新的故事,它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中,知道破坏自然世界意味着互相残杀……我们需要这样的叙事,它能让我们明白社区生活和互相尊重是一切的基础"(Kittredge,1996,p. 142);我们需要这样的叙事,它能让我们"知道养育我们的世界一旦失去,便再也无法拥有……我们需要能让我们彼此关爱,关爱这个世界的故事,我们需要能让我们采取行动的故事"(Kittredge,1996,pp. 164-165)。

叙事类型

叙事有许多类型:报刊中的叙事、虚构的短篇故事与小说、人们相互讲述的有关自身日常生活的故事、人们讲述别人的故事。解释性研究者收集这两类故事:个人经历故事(personal experience story)和自我故事(self story)。个人经历故事是指那种将讲述者自我与一系列意义重要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叙事(Dolby-Stahl,1985)。多比·斯塔赫的母亲所讲述的"篮球"故事便是个人经历故事,那则描述弗劳伯特学习语言的故事则是他人讲述的个人经历故事,也就是说,是另一个人在讲述弗劳伯特的经历。自我故事是讲述自我的经历,并对其作出解释。印刷工人在 A. A. 聚会上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典型自我故事。他在讲述故事时,对事件与自我一一作出解释。乔伊斯《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最后一段叙述也是自我故事:叙述者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自我故事可以同时处理过去、现在与将来,而个人经历故事则只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自我故事讲述的是讲述者人生历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个人历史是指在访谈、对话、自我故事以及个人经历故事的基础上,对个人的生活进行重构(Titon,1980)。这类历史可以围绕某个人的生活或传记展开,也可以将某一群体或社会机构的活动作为关注的焦点。个人历史常常会在一个范围更广

的叙事结构(生活故事)中安插一些自我故事和个人经历故事。人们只需要将故事置于讲述者的传记中,便可以囊括个人经历故事或自我故事的全部意义。

政治回忆录是一种第一人称的政治性文本。叙述者既可以是所讲述故事中的主角,也可以是事件的目击者,它所讲述的往往是一些痛苦的折磨、监禁经历、社会动乱、被压制的历程和其他生存斗争。这类作品旨在记录并引起社会变革。叙述者将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其中的真相也将随叙述者的描述一一道出(Beverley,2000)。

里查德森发现,与人种志写作相关的叙事类型近来发生了诸多变化,"原有的界线已变得相当模糊,并有扩充之势,引入了诗歌、戏剧、对话、读者剧等等形式"(Richardson,2000,p. 929)。她将这些另类的叙事类型称为"创造性的分析实践"(CAP,creative analytic practice)。这些实践包括自我民族志、虚构故事、分层叙事、书面故事、表演文本、复调文本、读者剧、反应性读物、格言、戏剧与讽刺诗、影像再现作品、寓言、对话和混合的叙事类型等。除此之外,解释互动论者还可以运用其他叙事类型,诸如创造性的非虚构、表演性写作、回忆录与文化批评等。

过　程

在此我将使用解释性的传记方法一词来概括这些不同的叙事和故事类型,意在强调自我、传记、历史与经历在解释中的作用。这一点必须贯穿于对过程的关注以及对个人在此过程中的生活经历的分析之中。与此同时,故事讲述者在描述或解释之前,必须先将自己的生活交代清楚,过程、结构与活生生的经历必须融为一体。

在保罗·汤普逊看来,解释性的传记材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呈现出来。第一,研究者可以给出个人经历叙事,并将它与特定的个人生活故事联系起来;第二,研究者可以围绕某个共同的主题来收集自我故事和个人经历故事;第三,研究者还可以利用已经收集到的材料,作一次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并将重点放在所研究的(人生)过程,而不是此过程中的人物身上(Thompson,1978)。

在我看来,所有解释性的传记研究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叙事)再现类型均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由此可以引出两点启示:第一,研究者应该深刻挖掘个人历史,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关于自己的生活故事,研究者必须明白个体生活是由多种叙事构成的,没有哪一个自我故事或个人经历故事可以容纳个体生活的全部经历,也没有哪个个人历史能够包含有关个体生活的全部自我故事;第二,研究者所考察的(人生)过程包含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处境、观点各不相同,研究者必须收集他们的自我故事,方可以创做出能够解释复杂事实的多元叙事文本。唯有这种多元或混合的传记方法才能够保证历史、结构以及被研究的个体在任何一次探究中均可以得到公平而且正确的对待。

生活的结构

在解释性的文本中,某个人的生活构成其传记经历,个人则是文化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套名称来表明其属下人群的身份类型。这些名称包括男性、女性、丈夫、妻子、女儿、儿子、教授、学生等。它们依附在每个人身上,人们用这些名称来建构自己的传记,诸如,老年男子、年轻男子、离婚妇女、唯一的女儿、唯一的儿子等。

经历从两个层面影响个人的生活,就表面而言,经历的影响很少能被察觉,因为人们对它熟视无睹,觉得它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一个人在商店里买了张报纸,这一经历有什么影响就很难察觉。但就深层的意义而言,经历又是影响人生的核心力量,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类经历即是人生中的心灵发现。解释性的研究者试图获取的正是那些对个人生活产生深层影响的自我故事或个人经历故事。

本章开始部分所引用的那些故事均是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持久影响的经历。多比·斯塔赫的母亲多年之后,仍记得那天她在乡村中学遭遇的尴尬经历,那个令她难堪的体育老师,她

将自己的尴尬经历告诉女儿和儿媳。印刷工人讲述的也是其人生中的重大经历,他至今仍在与之苦苦抗争。在完成《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后,乔伊斯还想再写两部小说,来叙述他与文学以及爱尔兰的关系。而弗劳伯特更是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克服自己的写作及语言学习困难。

事例法

在决定考察对象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妨先将关注点放在"事例"上(Psathas,1995,p.50)。该方法是将现象看成是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一系列的文化观念在发生作用,人们使用这些文化观念来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

类比法(analogy)也许能帮助我们。费斯克指出,"在话语分析中,没有哪句陈述能代表其他陈述,尽管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结构特征,话语分析对陈述展开研究,目的是为了探索当某一语言体系与社会体系交叉在一起时,它所能产生的潜在反应到底有多大"(Fiske,1994,p.195)。这一点正是支持事例法的理由。通过列举语言体系的运用事例,研究者便可以考察某些陈述与其他陈述交叉使用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

帕萨斯是这样界定"事例"的,在他看来,"事例是指某个事件……对其特征与结构进行考察,便可以发现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并且,从事件中还可以看出事件生成机制的文化有效性,比如,对话中的话题转移机制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Psathas,1995,pp.50-51)。研究者的任务是去分析事例以及话语交叉是如何形成的,从而揭示其中到底有何种理解或解释规则在起作用,并阐明事件本身的解释结构。

某一特定的陈述或事件是否会再次出现,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同样,我们也不必去考虑如何对人群进行抽样,因为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哪一事件或事例可以作为某一人群的样本(Psathas,1995,p.50)。事实上,"根本无法通过预先分析来获取事例,这是因为事先我们并不知道每个案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更不要提这一事例与那一事例之间有什么相似性"(Psathas,1995,p.50)。这意味着,我们无须去操心什么对经验

进行归纳，在这一点上，帕萨斯已阐述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旨趣不在于抽象或经验归纳，而在于“依据特殊性这一标准对每一事件展开充分的探讨”(Psathas,1995,p.50)。每一次探讨均必须与手头上的事例相吻合，总之，“必须首先直面特定的现象，然后再展开真正与特定现象相吻合的分析”(Psathas,1995,p.51)。

深化叙事：交往片段

除了收集、创作叙事之外，解释性研究者还需录制活生生的交往情景。如果记录能够把握重点，那么这些交往情景便可以为讲述个人经历故事提供恰当的契机，随之研究者就可以把这些故事加工成表演文本。

12 步呼叫(12-step call)

下面这个交往情景录制于 1983 年 1 月 23 日，它是由当时一位在场的参与者提供给我的。事件发生于上午 10 点 15 分到 11 点 30 分，现场是在一间汽车旅馆的客房，旁边有一辆小汽车和一间消毒室(属于一家物品滥用治疗中心)。参与者包括三个人，M，34 岁，酗酒者，因酒瘾复发拨打了 A. A. 热线，试图获得帮助；P，43 岁，一名已经康复的酗酒者；W，50 岁，另一位康复的酗酒者，他接听了 M 的求助电话。谈话过程中，这三个人围坐在消毒室的桌子旁。他们彼此认识了大概八个月。P 和 W 在 A. A. 中心从事著名的 12 步呼叫服务，专门帮助那些酗酒者戒掉酒瘾。他们均已戒了一年的酒。他们和 M 一到消毒室，便开始录制了这段对话：

M：这儿就光有这些玩意吗？这就是你们 A. A. 中心所做的一切吗？

P：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M：(要了一支烟，双手颤抖，好不容易才点着烟)我不知道，我是说，这儿就这点玩意吗？参加你们那些混账的聚会，阅读你们的《宝典》，不喝酒，待在家里，好好照看老妈，就这些把戏吗？

W：不，不止这些，但必须从不喝酒开始，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千万别喝酒。见鬼去吧，瞧，我现在的生活完全变样了。

M：你该把你们的《宝典》扔到窗外去，我不是说它一点用也没有，我是说这儿就这点把戏吗？我的生活就像佩吉·李唱的那样，它决不会变得一无是处，至少我喝醉了，就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我便可以走出那个老女人的房间，去做点别的什么。

W：《宝典》能帮我清醒过来吗？它里面讲的故事很像我的经历，也像你的经历，你有没有看一下？

M：伙计，我不会要它的。你知道，我就是不会要它。我想我那死去的来自圣迭戈的妻子，我看见老妈坐在家里等着我一身酒气回去，我看见自己在酒吧里寻乐，我喝一杯酒，看见杯中有你们A.A.伙计，我只想去死。

P：没必要非这样做，M，真的没有必要。我喝醉时也像你这样想，给A.A.一次机会吧。

谈话到此结束了。P与W离开了消毒室，M仍坐在桌旁，双手捂着脸，大哭起来，装咖啡的杯子也被他打翻了。

第二天，一名接听了M的12步呼叫电话的A.A.成员，他对我说起这样一则故事：

昨天我再次来接听12步呼叫电话，我去汽车旅馆，当我连续一星期都喝醉时，我就会来到这家汽车旅馆，我觉得回到那里很好，我想看看在那举起第一杯酒时会有什么发生。电话来时我正忙着，我不想去那，但我很高兴我去了。我们饶有兴致地谈论《宝典》，谈论酗酒，谈论我自己的毛病。我真的很高兴，我今天不用喝酒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听12步呼叫电话。想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跟到了地狱似的。桌上有四支玫瑰，还有啤酒。三个月前我还想喝酒，这一点我很确信。我想我不会忘记听到那个酒鬼向我求救时我内心的感受。空啤酒罐，威士忌的味道，乌烟瘴气的香烟，还有电视上的卡通片。我很庆幸我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了。

上述这段交往片段显然为讲述个人经历故事提供了契机。解释性研究所要做的正是从上述类型的交往片段中引出另一段人生经历故事，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就是所谓的深化叙事。

参与、访谈与倾听

解释互动论者致力于将自己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这类研究者试图透过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等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思考其中的问题。该方法无疑会将研究者投入他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去，它要求研究者以田野笔记的方式详细记录眼前世界的种种问题与日常特征，进而揭示其中的结构、交往与意义图式。这类研究者渴望能够分享研究对象所处的世界，直接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以求理解他们的行为到底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参与型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世界的意义。

在实施开放型访谈的过程中，解释性的研究者必须根据自己想知道什么设计一系列恰当的问题，然后以这些问题为基础展开谈话，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当然，当真正实施访谈时，还必须依据谈话对象的具体情况对这些问题做些顺序及措辞调整。启用开放式访谈的依据在于意义、理解以及解释是无法统一的，我们不能通过一套规范的、有固定选项的问卷来获取它们。访谈者必须具有高超的提问技巧与倾听技巧。开放式访谈非常适合参与性观察、互动研究和叙事收集。重要的是要记住，一名优秀的访谈者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将任何一名娴熟的对话者都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事情付诸实践而已，也就是说，访谈乃是对话，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交流。道格拉斯曾提出“创造性的访谈”这一概念(Douglas，1985)，正是指两个人或更多的人聚在一起，以开放的态度创造性地交流各自的经验，以求获得更为深刻的自我了解。

优秀的倾听者无须说什么，他或她只是让别人说。解释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成为优秀的倾听者，他需要具备这几项技能：第一，优秀的倾听者从不闲谈胡扯。第二，他从不打断别人的

讲话。第三,他总是善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从而能将传统的单向回应访谈转换成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倘若访谈者只是在那听,而不与人分享,就会引起被访谈者的不信任。第四,他知道自己想倾听什么,由于解释性的研究者所要获得的乃是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所以他必须懂得某一社会群体或某种处境中的个人大概会怎样讲述他们的故事。第五,优秀的倾听者,必须有一个作为倾听者的理由,也就是说,他或她必须能在自己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中树立起自己的身份形象。

福克纳将 V. K. 拉特里弗——叙述者描述为这样一个人,"对于当地传说的一切他都知晓"(Foulkner, 1940, 1964, p. 36),但是,"关于他知道什么,他甚至连自己都不告诉……哪怕他一个人躺在漆黑的房间里"(Foulkner, 1940, 1964, p. 321)。拉特利夫是个商人,他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推销缝纫机。他了解每个家庭的故事,各家出了什么问题,他全都知道。他很清楚谁遇到了麻烦,谁太平无事,但是他从不对这个家庭讲述另一个家庭的事,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倾听者,堪称我们这些解释性研究者的榜样。

解释传记

传记材料需要加以解释,为此,我向大家推荐这些解释策略:第一,研究者应该将研究对象或案例置于他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中(例如,一名康复的酗酒者,一名讲述故事的母亲,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作家)。第二,研究者不仅需要在个体的生活中识别出问题行为或事件,而且还要把握那些在个人经历故事或自我故事中出现的行为与事件。第三,研究者必须对各种人生经历故事的叙事特征展开分析。第四,研究者必须将个体的叙事与其生活联系起来。

解读叙事与见多识广的读者

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的解释者必须是个"见多识广的

读者”(Dolby-Stahl,1985,p.53;Fish,1980,pp.48-49)。这类读者具有几个特征:①他或她精通故事中所使用的语言(例如什么是12步呼叫)。②了解讲述者的生平经历,哪怕并不全面。③能够体谅讲述者的观点。④熟悉,最好也曾有过故事中发生的经历。⑤对自己的解释负全部责任。⑥熟悉解释理论的总体概况,并能在自己解释故事时灵活运用(这些理论包括心理分析、符号学、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交往行动主义、现象学方法论等)。⑦主张意义的标准取决于读者的反应(Dolby-Stahl,1985,p.52)。⑧坚信故事中没有什么“正确”、“真实”的意义。⑨坚信故事讲述者就是作者,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地获得他或她所表达的意义,并保守秘密。

解释步骤

在本书其他地方,我曾粗略提到过解释的步骤,更具体地说,它分为以下几个步骤(Denzin,1984a,pp.259-260)。

1)获取互动文本。

2)将其展示成独立的单元(unit)。

3)找出其中的关键经历,每一次关键经历组成一个分文本。

4)对已分好的关键经历进行语言学和解释学分析。

5)向参与者逐一展示文本,并解释其中的意义。

6)将文本中实际起作用的解释(理解)提炼出来。

7)根据文本的后续内容来考察这些理解。

8)对文本进行总体把握。

9)将文本中出现的多重解释(理解)揭示出来。

多比·斯塔赫就是按照上述步骤进行解释的。她首先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叙事,然后将其分成一系列的关键单元(滚篮球等),接着她一一分析这些重要片段,并将其中的意义与故事中的其他片段串联起来。在这之后,她将文本中实际起作用的解释提炼出来,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考察这些解释。最后他将故事视为一个整体,并将自己的解释与其他人的相关解释做比较,从而向我们演示了可以怎样来解释个人经历故事。

多比·斯塔赫将她的解释与母亲的传记联系起来，通过引入传记知识，赋予故事以更多的意义（诸如她母亲的年龄，她母亲是教友会的成员，在印第安纳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将故事与传记联系起来，研究者便可以向人们揭示：只有当故事中的人际交往经历与故事人物的实际生活相吻合时，它才具有意义。如果研究者忽视传记，他或她就是在凭空创作，而其解释也将成为无稽之谈。

多比·斯塔赫事先一定知道，母亲所遭遇的那次事件很容易被看成是略带性骚扰味道的玩笑，因为朝母亲滚来的“篮球”有可能让人想起另一个肮脏的字眼，即“睾丸”，接着她又将这一母亲心知肚明且已被人使用了近百年的双关语放入当地的风俗范畴，并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角度将它解读成一个猥亵的词语（Dolby-Stahl，1985，p. 56）。总之，多比·斯塔赫将她的解释与母亲的个人历史串联起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见多识广的读者”的形象，她的解释不仅富有深度，而且与母亲的传记相吻合。

见多识广的读者会把每位故事讲述者看成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个体，多比·斯塔赫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她的母亲，萨特对弗劳伯特，乔伊斯对史蒂芬·迪达卢斯也是如此。

结　论

在本章中，我探讨了解释性的研究者应该如何理解个人的生平经历。他们辛苦收集个人经历故事或自我故事，这些故事重点描述的是个人生活的重要或转折性的经历，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收集到的故事文本与故事讲述者的个人生活史联系起来。他们收集、分析故事中的人际交往片段，然后把它加工成叙事，有时甚至会制作成表演文本，正如我在第2章里提到的安德森女士访谈录那样。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将更深入地讨论在评价研究者的解释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解释评价标准。

第4章　解释过程

The Interpretive Process

本章将讨论以下两个主题:①解释的步骤。②解释性资料的评价标准。

通往解释的步骤

解释过程包括6个阶段或步骤，分列如下：

1）确定所要研究的主题。

2）对现象的前在观念进行解构及批判性的分析。

3）把握现象，包括在自然世界中把握现象发生的地点与场景，获得现象多重的事例。

4）现象的化约。从现象中提取基本元素，并对现象进行提炼，使之脱离原来的自然世界。

5）现象的建构。在把握基本元素、片段及结构之后，把它们重新建构为现象。

6）现象的深化。将现象重新置于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详细讨论上面所列的每个阶段。

确定所要研究的主题

研究什么问题取决于两个方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正如我在第1章里提到的那样，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常常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探究的主题。

社会学想象力

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往往习惯于采用批判的、历史的思考方式，而且常常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考虑问题。他或她试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识别各式各样的男人与女人，并认真审查我们这个时代公共领域的重大议题和私人生活的棘手问题（Mills，1959，p. 11）。这类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能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研究课题中，社会学家并不只是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除此之外，他还有“政治想象力”、“心理学想象力”、“人类学想象力”、“历史学想象力”和“新闻或文学想象力”（Mills，1959，p. 19）。这里的关键正在于研究者是否具有反思的、历史的、比较的和传记的思考能力。

这类研究者总能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后者曾经有过研究者想去理解的人生经历。从研究对象那里，研究者可以发现他所要探究的问题，接着研究者便可以将问题确定下来，不仅如此，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还可以丰富并深化研究者所要探讨的问题。一旦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经历又与研究者所要探讨的问题联系紧密，研究者即可以明确自己的现象分析任务。这一任务正包含在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中。由此研究者便可以考察个人生活是由哪些问题重重的行为或事件组织起来的，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

研究者所要探索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何(how)”，而不是“为什么(why)”。正如我在第 2 章里指出的那样，解释性的研究乃是要去探索交往个体的困境或人生转折经历是如何形成的，个体又是如何理解这些经历，并赋予其以一定的意义的。

具体来说，其他的确定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在自己的生活史范畴内，确定研究何种情境中的困难人生经历。

2)个人困境如何演变成了公共议题，进而又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引发了什么样的制度变化，这些问题研究者均要予以考虑。

3)确定困境中的人们在哪些制度形式和场所中进行交往活动(Becker,1986)。

4)追问这些困难经历是如何形式的，而不是为什么形成。

5)将所要探索的问题整理成简单明了的陈述。

范例：情感经历、酗酒者的自我、电影中的种族等级

在《理解情感》中(Denzin,1984a)，我曾集中探讨过这样一个“如何”问题：“作为一种意识，情感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如何联成一体并被我们体验到的?”为此，我考察了古典的与当代的情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情感经验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选择了两个案例，一个与家庭暴力有关，另一个则是关于自我的情感分裂。我试图通过分析各色人等在这两个具体情境中的激烈情感冲突，来回答自己确定的那个“如

何"问题。

在《酗酒者的自我》和《康复的酗酒者》这两部著作中,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剧烈的酗酒过程中,普通男女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感受作为酗酒者的自我?"第二个问题是"酗酒者康复后的自我是如何形成的?"(Denzin,1987b,p.11)。

这两个问题将我带入那些无名酗酒者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家庭和酗酒者的治疗中心。我发现许多人都曾深受这两个问题的折磨。

最近我刚完成一项研究,1990 年代好莱坞的"警匪片"。在这项研究中,我探讨了一种着力刻画暴力、毒品、帮派和警察的影像种族等级图景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Denzin,2001)。我还比较了美国人、西班牙人和美籍非洲人导演的电影。这种分析需要回溯种族等级的历史,考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好莱坞影片中种族等级。在分析的过程中,我来往穿梭于电影史的长河之中——从无声电影(《国家的诞生》)一直到今天的电影。

实施"如何"问题研究

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施"如何"问题研究。第一,带人到研究地点去。第二,到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们的聚会地点去。第三,研究自己的人际交往经历。第四,考察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经历所做出的种种科学的、传记的、自传的或虚构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必须与研究者所要探索的问题现象有关联(Strauss,1987)。研究者在具体实施"如何"问题研究时,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些策略。

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

所谓解构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是指对已有的研究和理论文献做批判性的梳理,看看有哪些人研究过自己即将探索的现象,他们对该现象做了何种表述与分析(Denzin,1984a,p.11;Derrida,1981,pp.35-36;Heidegger,1982,p.23)。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列出各种有关现象的前在观念,它们是通过何种观察形成的,其界定及分析方式如何。

2)对这些前在的观念、界定与分析做批判性的解释。

3)对已有研究中使用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模型做批判性的梳理。

4)将已有研究中的观念与分歧列举出来。

范例:挨打的妻子

乔关于韩国家庭暴力的社会现象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构范例(Cho,1987)。当乔从事自己的研究时,理论界往往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家庭暴力问题。该理论认为,暴力是家庭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暴力乃是丈夫和妻子在交换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并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丈夫觉得自己在交换中处于劣势,就会借助于暴力来达成交换关系的平衡。据此,研究人员又按“暴力的严重程度”区分了八种暴力形式:扔东西、推推攘攘、扇耳光、拳打脚踢、用其他东西打、猛揍、持刀或持枪威胁和使用刀枪伤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如果妻子觉得暴力比(法律)处罚能够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她们就会忍受这种暴力关系,而一旦(法律)处罚所带来的收益比暴力多,她们就会选择离开。乔认为,这一理论模型有如下几点不足。首先,很难测量收益与损失,什么是离开和留下也无法界定清楚,因而该理论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其次,对于回报与处罚的比率,也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最后,根本无法测量妻子对于自身处境的主观理解,所以该理论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效力。

从方法论上讲,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显然来源于实证主义。我在第 2 章里对该哲学已做过批判分析。按照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解,家庭暴力是家庭生活中的客观现象,因此可以通过量化的手段对它进行测量,而无须去考虑那些人情或情境因素。由此,它对家庭暴力现象做了线性的因果关系分析,其中一点也不涉及主观体验,暴力交往中的心理过程更是被排除在外(Denzin,1984b),它将挨打妻子看成是暴力婚姻中的被

动者。

乔按上面列出的解构步骤对该理论做了解构，并由此以解释互动论者的理论姿态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家庭暴力的观点，这一观点来源于妻子们对于自身遭遇的描述与理解。

解释循环

“探究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提问者的行为”（Heidegger, 1927, 1962, p. 24）。探索者的基本观念与问题是研究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决定我们将如何理解眼前的主题……每一次探索都是由该探索所要询问的东西引导的”（Heidegger, 1927, 1962, p. 243）。解释过程处处都会面临解释循环。海德格尔认为：

> 解释的循环不是一个任意的求知方式均可以在其中活动的圆圈……决不能将它视为可以肆意践踏的荒谬场所，也不应只是简单地安于其中，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Heidegger, 1927, 1962, p. 195）

解释性的研究者进入这个循环的方式是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于研究过程的中心位置，由此便有了双重的解释循环。研究对象讲述的自我故事或人生经历故事当然是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生活的中心内容，但是，解读故事的研究者同样也在自己的解释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样一来，两种解释就会发生作用，研究者越是能够将自己融入研究对象的人生经历故事或自我故事，这种交往作用就越是明显。当然，研究者的解释与研究对象的解释永远也不会重叠在一起，因为说到底，研究对象的经历不是属于研究者，而永远归他本人所有。

把握现象

把握现象是指在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中定位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解构的任务在于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而把握现象则是当前研究者对于现象所要展开的探索。把握现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收集与现象相关的多种案例和个人经历故事。

2）确定研究对象遭遇过什么样的人生危机和心灵发现。

3）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相关的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

范例：挨打的妻子、酗酒者的自我

乔收集了 64 位挨打妻子的个人经历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乔从韩国首都汉城的妇女热线那里获得的。该热线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周六的工作时间有些变化，是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乔曾到这家热线服务机构担任志愿者，她接听了许多挨打妻子打来的热线电话，后来又与其他一些妇女建立起了对话关系，倾听她们的挨打经历，她从对话中整理出了 64 个人生经历故事。

在我自己的关于酗酒者的研究中，我常常会去酗酒者的聚会场所。我对他们说，我对 A. A.（聚会）很有兴趣，我家里也有人酗酒成性。渐渐地我与一些已经康复的酗酒者建立起了友谊，和他们的配偶及孩子也有不错的交往。此外，我还认识了治疗中心的酗酒顾问及其他医疗人员，并成为了他们的朋友，所以，无论是在酗酒者的家里，还是在酗酒者的公共活动场所，诸如酒吧、医院急诊室、消毒室、治疗中心或 A. A. 聚会，我都可以自由出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诉说。我因此能够收集到许多用来研究的个人经历故事，包括第 3 章里提到的那个参加 A. A. 聚会和打 12 步呼叫电话的印刷工人。

研究者将自己把握到的人生经历现象呈现给读者，这些经历即可以是即时呈现的，也可以是重新建构的。当研究者计划围绕某一共同的主题来对这些故事进行分析时，他或她必须收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比较不同场景中的个人经历故事，并从这些故事中找出共同之处，虽然研究者并不需要对使用哪个故事做出限定，只要这个故事对研究者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当然，在选用故事时，研究者必须弄清楚他所使用的故事能够达到第 3 章里所列出的那些解释标准。

现象的化约

化约是从胡塞尔那里引来的术语(Husserl,1913、1962,p. 86)。所谓化约就是将现象从其所发生的自然世界中提取出来,从而对它展开分析。研究者剖开现象,分析、界定它的构成元素和基本结构。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将现象看成是一个文本或一份档案,或者看成是一个正待研究的事例。当然,研究者决不能根据存在主义理论文献中的标准答案来解释现象的意义。研究者在解构阶段就已梳理过那些理论答案,而在化约阶段,研究者仍需要将它们悬置起来。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必须直面所要探究的现象,并且尽可能地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来分析现象。

我在第3章里曾提到,化约涉及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将文本(现象)处理成单元,每个单元均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发生。二是对每个单元展开解释。更具体地说,化约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从所要探究的主题出发,将个人经历故事或自我故事中的关键阶段与叙述提炼出来。

2)解释这些阶段的意义,与此同时,研究者的解释必须能证明自己是个“见多识广的读者”。

3)如果可能的话,收集研究对象对这些人生阶段的解释。

4)对这些解释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关于现象的基本特征与状况说了什么。

5)以上一步得来的现象的基本特征为基础,整理出一份暂时性的有关现象的陈述。

范例:篮球的故事、挨打的妻子们

多比·斯塔赫(1985)对她母亲所讲述的篮球故事所做的解释(参见第3章),为我们提供了现象化约范例。她将这个故事片段从文本中提炼出来,并解释了其中的关键部分,接着指出这些关键部分对于理解整个故事的意义十分重要。对此,她母亲以及她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乔在解释挨打妇女的故事时，则将重点放在挨打妇女的憎恨上（关于憎恨，可以参见 Scheler，1912，1961）。她的解释也是以化约挨打妻子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在她看来，当婚姻生活出现暴力时，憎恨便会按照以下 7 个阶段逐渐产生：渴望夫妻之间真正相爱、遭到拒绝、厌恶、产生报复心、克制报复心、深恶痛绝和暗中计划报复对方。当妻子达到最后几个阶段时，她就会产生谋杀丈夫的企图。一位妻子这样说道：

> 一直到他半夜回来，我都没有睡着。我吃不下东西，也睡不好，我恨，我恨……结婚 14 年来，这种感觉日益强烈，我的神经如此脆弱，以至于只得吃安眠药……我真想杀了他。（转引自 Cho，1987，p. 250）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借助于化约式的解读，乔如上所述将重点定位在了憎恨上。她对前面提到的憎恨 7 阶段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而且每个阶段都会附上一段挨打妻子的真实陈述。

化约与符号学

符号学能为化约提供一条有效的策略。借助于符号学，研究者可以掌握一种技巧，用来解读叙事及交往文本中的词语及符号的意义（Barthes，1957、1972）。符号学式的解读能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在文本的建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字眼与措辞，与此同时，根据符号学理论，这些措辞（符号）又是由某种代码或意义体系组织起来的。在讲述或解读的过程中，文本的全部内涵便会敞开。符号学的解读既可以从部分到整体，也可以从整体到部分，它致力于发现那些使文本得以组织起来的代码以及那些赋予文本以意义的对抗性关系，它关注交往及叙事文本中关键措辞及陈述的多重意义。它要求研究者不仅能对叙事文本做生动的解读，而且可以像语言学家那样冷静地分析文本的结构与意义。

篮球故事的符号学解读

让我们再次来看多比・斯塔赫母亲讲述的篮球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赋予故事以意义的代码显然是指讲述者所处的位

置，讲述者是以母亲和学校教师的身份叙述了在印第安纳一所乡村中学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与这一代码相关的词汇及短语（体育老师、教练、篮球）均含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教练拥有篮球）。故事中的对抗关系包括：①开玩笑的男人和正在工作的女人。②男人的肮脏话语和女人的工作话语。③一些能让人尴尬得要死的琐碎事件。④一些并不可笑但过后让人可笑的事情。

故事的核心意义围绕两个单词展开，一个是“球”（硕大的篮球），另一个没有出现在文本中的“睾丸”。“球”这个词的意思有些复杂，它在故事中多次出现，包括球朝讲述者的办公室大门滚去；讲述者的陈述“你滚球是什么意思？”；那伙男人大笑起来；她陷入尴尬中；意识到“球”这个词有双重意思。

和所有的个人经历故事一样，这位女人的故事无疑也是复杂的：首先，她所讲述的经历是一个让人难堪的笑话；其次，她所讲的故事固然滑稽，但现在当她讲的时候，她早已远离了当初的经历，所以，这则故事的原始符号学意义与现在讲述时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是一回事，最初故事的意义自始至终都与讲述者的难堪相关，但在之后，或者今天重新提起它时，这一经历则变成了可笑的往事。

现象的建构

建构以化约为基础。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对现象进行分类、整理，并将它重组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如果说化约是拆散的话，那么建构则是将碎片重新组合在一起。建构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列举现象经过化约之后的基本元素。

2）参照现象发生时的情形，整理基本元素。

3）分析每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产生的影响以及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4）分析现象的结构及组成部分可以组成什么样的整体。

范例：暴力婚姻中的憎恨

乔揭示了暴力婚姻中存在 7 种性质不同的憎恨（Cho，

1987, p. 249)。关于这一点,她做了进一步解释。她指出,在开始阶段:

> 妻子渴望……爱……但丈夫有外遇粉碎了她的心愿……殴打事件随之开始发生……妻子开始厌恶丈夫……家庭暴力一直在持续……厌恶也日益加深,她想报复丈夫……但她压制住了自己的报复心理……此时她开始憎恨丈夫……她的报复心一刻也没停息……她在酝酿如何报复……她心里想的不是去了断关系……而是承受痛苦、收拾残局。

在这段陈述中,乔对暴力婚姻中憎恨的发展过程做了界定和解释。她按顺序列出憎恨的基本构成元素,并且描述了这些元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

建构目标

研究者对现象进行建构,目的是为了将那些分析出来的经历元素(片段)重新组合在一起,从而再现经历。在对情感做现象学分析时,梅洛—庞蒂曾经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人们将情感生活事实收集在一起,尽力把它们归入某个基本的意义范畴内,以求发现它们的共同行为特征"(Merleau-Ponty, 1964, p. 62)。我们不妨将"情感"替换成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比如挨打的妻子、酗酒、性生活、谋杀、12 步呼叫、离家出走,等等,显然,即使换了个词,梅洛—庞蒂的话仍是有效的。在建构阶段,解释互动论者所要做的正是去收集相关的生活经历,而这样做又是为了寻找那些反复出现的经历、行动与意义。建构这一步做好了,就为解释的最后一步即深化奠定了基础。

现象的深化

深化从化约及建构阶段发现的基本主题及结构开始,研究者将这些结构放入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它们的意义,例如,乔把挨打妻子对丈夫的憎恨置于她们的暴力婚姻中。研究者将对现象进行化约之后获得的研究成果与该现象出现于其中的社会世界联系起来,使现象回到活生生的个

体交往世界。此外,研究者还得把想与个人的人生经历或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并分析现象的意义。研究者必须用研究对象的词汇、语言及情感来描述现象。借助于深化分析,研究者便可以向人们展示普通人如何承受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现象。为实现这一点,研究者需要融人研究对象的交往世界,对现象做深度描述,而且常常创作成表演文本,就像安娜·迪芙蕾·史密斯在表演性的诗歌作品中所做的那样。

深化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获得并展示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这些故事必须包含化约和建构阶段对现象进行分析之后发现的基本特征。

2)展示个人经历故事中另一些对照性的故事,从而揭示事件发展过程的多样性。

3)说明不同经历是如何塑造、改变事件发展进程的基本特征。

4)对收集来的所有故事进行比较,分析每个故事的主题,并按这些互不相同的主题重组一个完整的事件发展过程。

深化的目标

研究者对现象进行深化解释是为了探明各个经历片段是如何改变、塑造自己所研究的现象的。只要交往中的个体赋予自己的经历以意义,经历的基本结构就会确定下来或发生改变,深化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评价解释材料

经过解构、把握、化约、建构和深化这五个阶段后,研究者便可以对现象展开更为深刻的探究。如前所述,研究者实施这些活动是为了给解释和理解创造合适的材料基础,在第2章里,我曾指出解释就是澄清人生经历的意义,解释又为理解奠定了基础。理解,也就是确定交往个体的人生经历的意义,乃是解释互动论者所要追求的目标。

澄清意义

正如我在第 2、3 章里所指出的那样，经历或实践的意义是由一系列戏剧性的交往过程构成的，它涉及个体对于目标、事件以及过程的理解和采取的相应行动。这一解释性的过程将事件或目标带入个人经历领域。事件是该领域发生的事件，而目标则是个体在理解自身经历的过程中确立的，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如何不断地定位自我。这些自我定位乃是情感性的、认知性的和交往性的，表现为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采取相应的行动。与之相联系，意义也是传记性的、情感性的，是个体对自身经历的体会。澄清个体交往经历的意义就是去揭示个体如何在变幻的人生经历中自我定位。而要完成这个解释任务，就必须通过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意义正隐含于个体所讲述的自我故事之中。与此同时，意义又总是取决于特定的力量和话语所产生的影响。

下面一则故事可作为范例，讲述者成功戒酒、戒毒已将近八个月的时间，这段故事是他讲给一位 A. A. 成员听的。

> 过去我常常和一帮朋友在一起吸毒、喝酒，我们搞野餐，搞聚会。记得有一次，是在 7 月 4 日左右，我们曾连续搞了 5 天。但现在我既不喝酒，也不吸毒，我们什么事也没有。我是说我现在好了，所谓好了就是说我再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事了，就像我再也不会有那帮老朋友了。我只有好了之后交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家伙，他打理一家酒吧，他不停地邀我去喝上一杯。我不能告诉他我是个酒鬼，但现在我再也不喝了，这样我连这个朋友也会失去，但是，伙计，我往后看了看这帮人，又看了看自己，他们好像仍在那，我向前走去，他们在后面——我曾呆过的地方。我很高兴，我从酒精中清醒过来了，再也不干那档子事了。

从上面这段陈述中，可以看出康复对一个人的意义与影响。这些意义与影响来源于那个匿名酗酒者的言语与行动。讲述者将康复与失去老朋友、结识新朋友联系起来，接着又谈起了自己过去常去的地方，那儿有一帮老朋友。就这样，他道

出了自己的经历到底包含何种意义。

解释标准

可以根据下列标准来评价解释材料：

1）它们有没有生动地澄明经历？

2）它们是不是建立在深度叙事基础上？

3）它们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内涵是否充分？

4）它们是过程性、交往性的文本吗？

5）它们是否将对于现象的了解都交代清楚了？

6）它们与关于现象的前在理解相关联吗？

7）它们的结构连贯吗？它们包含理解吗？

8）它们是不是开放的？

接下来将对上述八个标准一一做出说明

澄明：解释必须澄明所要研究的现象，必须将现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只有以来自生活世界的材料作为解释的基础，才可能实现这一点，除非让普通大众自己开口说话，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他们的经历。

深度描述材料：解释必须以详细描写事件或经历为基础。深度描述材料的特点在于其细密性，它们在经历发生时就开始记录，并将经历置于社会情境中，它们记录思想、意义、情感与行动，而这一切又都是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得来的。

历史性与关系性内涵：解释材料必须含有丰富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内涵，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描述个人经历在某一段时间里的变化，与此同时，还必须记录其中涉及的重要社会人际关系。从历史性这一标准出发，解释材料所描述的必须是连续的交往经历片段，也就是必须将这些材料置于个体的生活史中。

过程与交往：这两个维度在材料中必须得到清晰地体现。解释性的描述必须是过程性的、交往性的。前面三章提到的所有案例均符合这一要求。

清楚交代所知道的一切：研究者必须将自己对现象进行分析之后所得到的全部相关信息交代清楚，这意味着解释者必须是个“见多识广的读者”，这一点我在第3章里已做过讨论。这

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拉大解释的广度,并尽力排除与解释、理解不相关的东西。当然,这里的解释与理解都是暂时性的,在这一时刻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在另一时刻可能会被当成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解释与理解没有终点,而总是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对此下文还会谈及)。

前在理解:清楚交代所知道的一切还涉及将前在理解与经历解释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前在理解包括相关的背景信息与知识,诸如理论文献中的概念、假设和观点;之前获得的有关研究对象及其经历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者想去观察、倾听、叙述和解释什么,都取决于他或她的前在理解,所以前在理解也是解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忽视前在理解,就有可能把解释引向“客观性的谬误”上去。

连贯与理解:该标准涉及的问题是解释是否在理解个人生活经历,并把它组织成连贯的意义丰富的整体。连贯的解释包括所有相关的信息和前在理解,它所依赖的材料必须是历史性的、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和交往性的。不仅如此,这些材料还必须以深度描述为基础。自始至终,解释者都必须以意义丰富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解释。在所有解释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是否同意已给出的这些解释。

未完成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暂时性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Denzin,1984a,p.9)。当研究者再次回到现象时,新的解释便会产生,也就是说,解释者总是处于解释循环之中。当研究者重新回到现象并对它进行解释时,他或她的前在理解将会决定他们能从现象中观察到什么,又会做出何种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解释得不到任何结论,而是说解释永无止境。不然的话,每开始一次新的解释,研究者都必须把他以前的理解遗忘掉,这样就等于是说,研究者必须把自己关于现象所知道的一切都探索出来,直到彻底弄清楚这个课题之前,都不应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

结　论

在这一章里，我探讨了解释性的研究者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如何对人生经历世界中所发生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除此之外，我还探讨了解释过程包含哪些步骤，又该如何评价解释性的研究，其评价标准是什么。由于解释性研究乃是传记研究，在该研究形成的文本中，普通男女的生活经历占据了核心内容，归根结底，解释性研究者所要考察的现象正是这些人的生活及其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释性的研究者当然希望自己比研究对象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研究对象从自己的生活中常常只能看出情感及一些个人化的意义，而研究者则要从中看出各种力量（权力）与影响（Dilthey，1900、1976，pp. 259-260）。一般来说，研究者总能从研究对象的行动中得出一些研究对象本人没有说出来的解释，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者作为旁观者的位置决定了他能够看到某些研究对象不能看到的东西。对研究对象来说，各种影响人生经历的因素很少会同时摆在他们面前，而研究者却可以从研究对象所缺乏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的生活。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有一系列的解释方法，这些方法也是研究对象所缺乏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研究者必须做到能让研究对象理解针对他们的生活所作的任何解释，不然的话，他们便无法接受这些解释。

第5章 解释的场景定位

Situating Interpretation

所有的人生经历研究都必须在真实自然的社会世界中进行。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正是解释的场景定位。第4章里曾讨论过如何把握现象，本章将对这些讨论做进一步的分析。在把握现象的过程中，研究者从研究对象那里收集各种各样的案例和个人经历故事，研究对象在各自的人生中都曾经历过研究者所要探索的问题或现象，研究者从他们那里获得人生经历故事与自我故事，并对它们进行解释。

解释的情境化或场景定位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们何时、何地聚在一起，相互作用（时间、历史与场景描绘问题）。

2）设法进入场景。

3）学会场景中的日常交流语言，理解其意义。

4）将个体、传记及社会类型与相关的交往场景联系起来。

时间、历史与场景描绘

> 当前民族志的任务是去揭开这个谜底：什么是地方性？在这个领土边界日益模糊的全球化世界，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地方性到底是什么？（Appadurai，1991，p. 191）

民族志写作变得越来越地方化，研究者心中的外国以及偏远地区观念已被重构，随之，民族志与“田野工作”这两个领域也以政治学及现象学的方式联成了一体（Gupta & Ferguson，1997，p. 3）。作为解释性的研究者，我们通过自己的解释实践开辟了观察的领域（the field of observation），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其中开展探索工作的领域。

阿帕都莱认为，从各地均能看到全球化的痕迹，他用“民族飘零（ethnoscapes）”来描述20世纪晚期人口的全球流动（Appadurai，1996，p. 48；亦可参见 Mccall，2001，p. 50）。与之相联系，民族志的“民族”也变得不可靠了，因为群体认同不再扎根于单一的地理区域。此外，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各种商品包括身份认同的流通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越过边界，并在网络世界中自由传播，交互作用。

事实上，解释民族志学者现在非常清楚，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的案例或区域上，这一做法已经过时了。马尔库斯提出，应该将民族志纳入“多重地域的想象力”之中，从而实现对其进行重建（Marcus，1998，p. 14）。在马尔库斯看来，这种多重地域研究向“传统的民族志写作与田野工作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多重地域的想象力试图探索、描述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这

在以前被看成是不适合的，现在却是民族志写作引发争论，推出情境意义的基本方式。突破单一的地域之后，"民族志写作仍然存在，它遍布于四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而不是只有一种体系"（Marcus，1998，p. 14）。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事民族志写作，这一趋势瓦解了微观与宏观、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区分（Abu-LUghod，2001，p. 264）。单一地域研究变成了更为灵活的多重地域民族志写作（Marcus，1998，pp. 79-80）。例如，关于电视观众的深度民族志描述"便需要采取多重地域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正如乔治·马尔库斯提出这一概念时，用它来形容世界体系中的商品，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Abu-Lughod，1997，p. 114）。

阿布—卢赫德向我们介绍她用多重地域民族志的方法做过一项关于电视的女性主义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她和一群埃及农村妇女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名叫《爱之屋的母亲》。该电视剧是在开罗由一群城市专业人员制作完成的，编剧是法茜娅·阿尔—阿萨尔，一位活跃的埃及左派妇女活动家。谈到她的民族志，阿布—卢赫德说："这里，相关的体制是国家。我从观察村民对于电视剧的反应开始……但我还是想追溯一下电视剧在开罗拍摄时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分析其中的'文化'作用力（Abu-Lughod，1997，p. 114）。在她的民族志文本中，穿插着她与扎娜布的对话（扎娜布是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此外，还有阿尔—阿萨尔的说明，在其中，阿尔—阿萨尔对她创作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初衷做了解释，她这样说道：

> 我想为老龄妇女创造一个崭新的角色……我今年 60 岁了。过去，人们认为，妇女一到 60 岁，儿女们都已经成家，剩下的就是坐在家里等死。我有四个孩子，但是，作为一名作家和政治家，我有自己的考虑与追求，我并不觉得我在变老，我想在电视连续剧里表达这一点。（Abu-Lughod，1997，p. 117）

场景描绘

研究者必须将人物与情境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我称为场景

描绘，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①界定场景中的行动顺序与结构。②在空间中确定情景与人物（例如这些交往情景是在哪里发生的）。社会是由交往个体组成的，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进行交往活动，人们或是将自己的问题带人交往的社会场景，或是在特定的场景里遭遇困境。在这些场景中，人们讲述各自的困境，这些故事即是解释性研究的基本材料。

场景描绘的重点在于叙述"谁"做了"什么"，和"谁"一起，什么"时候"，"地点"在哪。例如在乔的研究中，那些挨打妻子们均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谁），她们向汉城的一家热点电话求助，向那里的专业工作人员讲述自己的故事。该热线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但星期六是早上 10 点到下午 2 点（这里，"什么"是指讲述经历；"和谁"，专业工作人员；时间与地点，也都做了交代）。

场景描绘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研究者必须弄清他所要考察的现象在社会结构中是如何分布的，否则他便很难对那些略显有悖常规的现象（事例）展开准确的研究。其次，通过场景描绘，研究者能将历史维度纳入自己的探索中，进而从历史与传记的角度揭示个体与事件、危机或困境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场景描绘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将个体与情境联系起来）。再次，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场景（例如群体聚会场所、热线电话、暴力家庭、诊所等等）自身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场景与其他场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作用关系。第二，场景自身的历史变化状况（何时形成等等）。

第四个原因与传记和个人经历有关，场景描绘是每个人（包括研究者）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例如酗酒者和挨打妻子必须清楚自己的交往活动是在何时发生，地点又在哪里。挨打妻子在打热线电话之前，必须知道热线电话的工作时间，同样，倘若酗酒者不知道 A. A. 聚会的地点和时间，他也无法到那去讲述自己的故事。研究者要想进人某个社会情境中展开自己的探索，也要走过一段类似挨打妻子第一次寻求帮助的经历，这是解释现象必不可少的过程，即亲身体验自己所要研究的

现象。

范 例

在我研究 A. A. 聚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旧群体（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另一个是新群体（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新群体继承旧群体的交往方式，事实上，新群体常常是在旧群体成员的引领下才加入了 A. A. 聚会。A. A. 聚会 30 年前形成的风俗与传统仍然在新群体中流行。新群体在讲述个人经历故事时，仍或多或少地会使用当初（旧群体）的叙述框架。很明显，如果我不去研究这两个群体交往场景的历史渊源关系，我就无法知道这一点。

场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是它自身在当地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乔指出，韩国汉城的妇女热线开通于 1983 年，这是该市第一条专门为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帮助的热线电话，所以她所研究的这些妇女是第一批打电话向该家机构倾诉自身经历的人群。倘若当地社会新开了一家类似的处理个人困境的机构，人们兴许就不会向原来那家机构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之后她们的故事很可能就会出现在新的机构场景中。在这里，故事讲述取决于当地社会为讲述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场景。

走入赛博世界

考虑一下下面两段叙述。两位陈述者新近加入了一个互联网新闻论坛群体，该群体名叫"切换 · 康复 · 相互信任"（Alt. Recovery. Codependency，简称 A. R. C），是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的成千上万个论坛群体中的一员。这些群体的网络形式一般被称为"使用者网络"（Usenet）。互联网用户进入这些论坛群体，在上面发布信息，然后信息又在所有相关的网站上传播开来。有的用户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做出回应，并去浏览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信息。有的用户则只是浏览一下，不做出任何回应（这样做被称为"隐姓埋名"，Denzin，1998，1999a）。

"我可以在互联网上尽情敞开自己的问题，当然，我或

许还会使用其他方式，在互联网上，我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帮助（A. R. C 的男性浏览者和新成员，1996 年 9 月 5 日）”。

“我第一次浏览这个新闻论坛群体（A. R. C）时，感觉好极了。我可以在上面读到一些人的康复经历，并分享其中的快乐。我才刚刚开始发现自我，以后的路还很长，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感激你们让我分享这一切”（A. R. C 的女性浏览者和新成员，1996 年 9 月 1 日）。

寻找场景进入的通道与步骤

要想描绘场景，就必须获得进入场景的通道，这要求研究者遵循以下步骤。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所要做的乃是去把握现象（第 4 章对此已经做过讨论），熟悉研究对象的活动场景（第 3 章对此已做过简单探讨）。

1）识别问题发生的活动场景。

2）解释特定场景中的人物的欲求，并对其中的交往活动与经历展开探索（Adler & Adler，1987，pp. 39-43）。

3）熟悉这些场景，包括它们的地点、活动时间，等等。

4）叙述场景的历史发展（尽可能了解其早期的状况），同时熟悉它们与其他场景的历史渊源关系。

5）确定哪些人经常出入这些场景。

6）获取场景创造者的个人历史。

7）在场景中倾听人们的诉说，收集他们的人生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个人的生活危机和心灵发现。

8）提出并提炼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询问研究对象，或倾听他们的诉说，了解他们生活中持续出现的问题。

范例：挨打的妻子、酗酒者的自我

在第 4 章里，我曾讨论过乔是如何收集她研究韩国汉城那些挨打妻子的生活经历所必须的材料的。从她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上述 8 个步骤。她选择的场景是妇女热线，在研究的开始阶段，她研究了这家热线机构的历史，了解谁在使用这条热线。

她获得了热线创立者的个人历史，并利用担任志愿者的机会，收集了许多个人经历故事。她找到了进入该场景的通道（该场景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但周六是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她在那辛苦做了 7 天的志愿者，并且每天从早上 9 点开始，下午 7 点结束，这才获得了进入该场景的通道。她做了一大堆的杂事，包括校对，给工作人员端咖啡、送水果，帮助为报社整理各种各样的案例故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成了这家热线服务机构的正式成员。

在我研究 A. A. 在线网络的过程中，我没有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浏览其成员发布的各种帖子。此外，我还跑到酗酒者及其集体经常聚会的地方，包括“公开”的 A. A. 聚会，凡是对 A. A. 聚会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去参见。正如我在第 3 章里提到的那样，我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普通男女是如何经历他们的酗酒生活的，又是如何康复的，围绕这两个问题，我收集了许多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

就场景描绘而言，我觉得自己遇到的问题以及我采取的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参加过一次早期 A. A. 群体的一次聚会，得到一张名单表，上面列有 A. A. 群体的所有成员，包括成员的名字、聚会的时间与地点。每周他们有四十多次聚会，时间要么是中午，要么是晚上 8 点。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频繁参加他们的聚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早期 A. A. 群体的每一次聚会我都参加了。我在这个聚会遇到的人又会在其他聚会中出现，慢慢地，他们也把我当成参加过许多 A. A. 聚会的人。

我开始接触那些引我进入 A. A. 聚会的人们是在 1960 年代，他们是聚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和他们一起喝咖啡，他们对我说 A. A. 群体刚成立时发生的一切，以及什么时候各色人等开始聚会，因此，从这些人身上，我得到了早期参加 A. A. 聚会的不同群体的生活史。他们还告诉我谁参加了哪几次聚会，谁有问题，谁的状况正在好转，等等。

在收集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如何倾听 A. A. 成员叙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成员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讲述自己

的经历，我就在一旁收集他们的人生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除了参加 A. A. 聚会以外，我还去过当地的咖啡厅、小饭店，等等，在那里我可以听到一些已经康复的人讲述的生活故事。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我才得以勾画自己的工作蓝图，进而对当地社会的 A. A. 聚会展开研究。

学习语言及其意义

由于研究者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研究场景，所以语言及意义问题便显得十分重要。每个群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Barthes，1967)，或一套特殊的行话，其中有一些并不通用的术语和其他群体无法理解的概念。其他群体往往会把它们当成是普通的日常用语，但实际上它们含有特殊的意义，它们还有一套代码或语言规则。从这一意义上讲，研究者就必须去考察语言的历史传统。因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研究者必须从学习语言开始。

语言学习的步骤

语言学习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找出场景中经常使用的关键术语。

2)确定场景中不同类型的人(例如，初学者、新成员、老资格成员、男人和女人)是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

3)收集使用这些术语的书面和口头文本。

4)深入某一社会结构或文化群体，从地点、性别及时间等等角度，考察这些术语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5)收集包含这些术语的故事与陈述。

6)将这些术语与个人经历联系起来，分析个体是如何用它们来表达自身经历的意义。

学习语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参见下面的讨论)。

语言与理解过程

语言支撑着理解与解释过程。正如我在第 2 章里所指出

的那样，解释就是去揭示事件、陈述及过程中所包含的意义，而理解是去把握那些已被解释出来的意义。解释与理解就其本质而言是情感性的过程，涉及经历与意义的分享。如果经历所表达的意义及其所使用的语言不能被人理解，就无法实现经历分享。语言上的相通能让人们共同体验过去、展望未来(Cough,1984,p.1)。当人们语言相通，分享其中的含义时，就能达成相互理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交往活动，各自都知道某些特定的术语到底是指什么意思(Perinbanayagam,1985)。正是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术语构成了经历分享得以形成的基础。

范例：A. A. 群体的语言

为了研究 A. A. 群体，我不得不学习一门新语言。我在前面已经列出了自己的学习步骤，我找出关键术语，考察不同类型的 A. A. 成员如何使用这些术语，接着又开始阅读 A. A. 群体的基本文献(《宝典》、12 步法、12 条惯例，参见 Alcohol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1976,1953,1989)，了解 A. A. 语言在不同群体身上的用法，收集含有 A. A. 术语的故事，进而分析这些术语是如何与个人经历联系起来的。

A. A. 群体是一个拥有特殊语言的社区群体。该群体使用了一套外人无法立刻明白的术语、代码和意义，比如“屁股(Bottom)”、“鲍伯博士”(Dr. Bob)、“怎么样”(hlow it works)、“家庭-组合”(home group)、GSR、12 & 12，等等。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聚会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术语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屁股”是指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以至于只好向 A. A. 求助；“鲍伯博士”是 A. A. 聚会的开创者之一(罗伯特·史密斯博士)；“怎么样”是指聚会的开始阶段阅读 A. A. 的 12 步法(A. A.'s 12 steps)；GSR 是指群体服务代理人(Group Service Representative)；12&12 是 12 步法和 12 条惯例的缩写形式。有些术语在 A. A. 群体的基本文献中已做了界定，另一些术语则散布于 A. A. 群体的各种传说中，需要跟随 A. A. 成员学习，才能知道其中的意义(可以直接请教，也可以在一旁听他们讲

话)。我是通过阅读 A. A. 基本文献(Denzin,1987a),并在各种聚会上倾听他们的谈话,才学会了这些术语。如果我不知道这些术语的意思,当他们在聚会上讲述各自的故事时,我就无法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同样,倘若缺乏这点知识,我便不能融入他们,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参见后面的讨论)。

初学者、新成员和老资格成员

当 A. A. 成员深入领会酗酒者的自我时,A. A. 术语随之便会成为他或她所掌握的 A. A. 词汇的组成部分,同样,当某个成员学会了 A. A. 语言,他或她就会成为 A. A. 群体中的一员。在 A. A. 群体中,根据加入时间的长短,语言使用至少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学者(刚刚接触 A. A. 群体)、新成员(新近做出承诺,成为 A. A. 成员)、正式成员(加入时间至少有 1 年)、老资格成员(加入时间超过 10 年的成员)。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同类型的成员是如何使用 A. A. 语言的。

初学者

下面这个自我故事是一位酗酒者在治疗中心讲出来的,当时他对自己的顾问谈起了 A. A. 步骤:

> 这该死的步骤是什么意思!见鬼,我连数字是几都想不起来。我怎么做得了这些混账的事情?要多长时间?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这是什么计划?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怎么缓解,我连它的意思都不知道?什么是更高的动力?性格缺陷又是指什么?我该怎么做?天哪!我一点头绪都摸不着!我该怎么办?帮帮我。(30 岁的商人,第一次来到治疗中心)

从这个人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几乎看不懂 A. A. 语言。他不知道"步骤"、"计划"、"缓解"、"更高的动力"、"性格缺陷"、"改正"等等术语是什么意思。因为弄不明白这些司空见惯的术语,他更谈不上将这些术语用于自己的生活中。如果他成了 A. A. 群体的成员,那么过一段时间,他就知道这些词的意义,便不会再对它们感到头疼了。

新成员

对比一下下面这段陈述，讲述者是一名男子，他刚刚加入 A. A. 群体七个月：

> 我读了《宝典》中的一个故事，“恶性循环”，这说的正是我。我清醒了几天，然后又喝了起来，不停地喝。我来这七个月了，戒了三个月的酒。我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总会有点什么事情。老板训我，母亲看我不顺眼，汽车发动不起来，错过了一场球赛。怎么劝都没有用，我还是会喝。我都快把工作丢了。今天老板对我很客气，一切都干得不错。后来我遇到一位引路人，他定期带我去参加聚会，效果还真不错。昨晚我又想喝点，姐姐打来电话，说我在戒酒这一点上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她也是个酒鬼，我说我要戒酒，把她吓了一跳，她不想我把酒戒掉。三个月前，接完电话后，我兴许会去喝上五杯，但今天我不想这样做了。(48 岁，机械师，单身，现场谈话，1985 年 1 月 10 日)

这个人刚参加 A. A. 群体聚会不久，他对一个第一次参加聚会的初学者(女性)讲了上面一段话。七个月前，这个人也是个初学者，但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而且按照 A. A.《宝典》中的建议去做(Alcohol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 1976)。

老资格成员

下面这位讲述者 76 岁去世时，已参加 A. A. 聚会三十多年。他按 A. A.《宝典》中的叙述框架讲述自己的故事。A. A.《宝典》中有 44 个故事，这些故事的编撰思路可以表达成这样一句话：“一般来说，我们的故事叙述了我们过去的生活情形，发生过哪些事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 比尔·威尔逊与我要讲的故事是一样的。我曾经与他有同样的处境，在商业圈中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前途一片光明，一流的教育，恩爱的父母，漂亮的妻子，舒

适的家庭,什么都不缺少。起初,社会应酬频繁,生活得不错,但是酒喝得越来越多,我去上班时得在包里放一瓶啤酒。在身体颤抖得很厉害之前,我就陷入了困境。我开始下班后很晚才回家,我改过几次,但后来整个晚上都不回家,我开始变得对家庭不负责任。

我想我该换份工作,我这样做了。情况暂时变得好起来了,但后来我喝得更猛,有些日子里,我中午就离开了,有时候我会在星期一打电话说我病了。就这样,事态一步一步恶化,一个小时不喝酒,我就受不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我,我说"带他们见鬼去吧!"我在市中心租了一套高档公寓,过起了单身生活,开始没完没了地喝酒,接着我去疗养院戒酒,但一出院我又喝上了。那是 1940 年代初期,疗养院里,人们谈起了有关 A.A. 聚会的事情。我读了杰克·亚历山大的文章,一位朋友弄到一本《宝典》,他让我看,可我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扔了。

我不停地喝酒,最后工作丢了,什么都丢了。我去另一个疗养院戒酒,这次出院时,我决心把酒戒掉。我参加了 A.A. 聚会,看到了那本《宝典》。这次我把它看完了,它很适合我。他们说,只要我按照里面的计划去做,就会有希望。我开始成为 A.A. 聚会的常客,我找到一位指导者,我戒成了,变清醒了。我找回了失去的工作。一年后,妻子、孩子也回来了。我把这一切归功于 A.A.,归功于比尔·威尔逊·萨姆博士、鲍伯博士以及所有开创 A.A. 聚会并尽力使它继续下去的元老成员。起初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都要开车 500 英里,为了参加晚上的聚会。你知道,后来没这么多聚会。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帮助,就像今天你们这些人一样。(现场观察,1982 年 5 月 2 日)

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三位讲述者知道比尔·威尔逊是谁(A.A. 聚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第三位讲述者都曾经提到过《宝典》,该书正是由比尔·威尔逊写成的,当这两个人提到它时,他们便将自己纳入了 A.A. 的发展史。事实上,第三位讲述者在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还曾和比尔·威尔

逊做比较，说他和威尔逊一样，也曾有一份前途光明的职业，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感情也好等等，像他说的那样，他与比尔·威尔逊的人生经历甚是相似。他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顺便也对美国 A. A. 聚会的故事做了一番回顾，因此将读者带入了 A. A. 传说的核心部分。

第三位讲述者还提到 A. A.《宝典》中有一个戒酒计划。"计划"这个词正是指 12 个步骤和 12 条惯例。除此之外，还包括 A. A. 精神治疗计划，诸如更高级的动力、日常沉思和祷告、平心静气地祷告、第四和第五步骤、传达启示，等等。第一位讲述者对这些术语缺乏了解。简而言之，借助于使用"计划"一词，第三位讲述者可以引出一连串与 12 步法及 12 条惯例相关的意义与行动，也就是说，"计划"这个词包含诸多行动与意义。

第三位讲述者的文本既有有关 A. A. 的历史信息，又有包含特定意义的 A. A. 术语。第二位讲述者参加 A. A. 聚会只有七个月，但其叙述表明他知道如何使用 A. A. 术语，在他的故事中，也出现过 A. A. 群体惯用的术语，包括"戒酒"（按"计划"戒酒）和"指导者"（A. A. 成员，引导其他成员按照计划戒酒，直到康复）。

解释语言

作为一种语言学过程，解释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所要解释的语言，二是学会如何解释这些学过的语言。以那位初学者向顾问询问什么是 12 步法为例，显然他必须去学习他所问的那些术语。从他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无法理解这些即将与他发生关联的术语。此外，就学会如何解释语言而言，研究者还需考察讲述者是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为此，研究者必须了解术语、讲述者以及听众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弄清讲述者使用这些术语时所表达的具体意义。

一旦人们学会并使用某种语言，这种语言便会赋予人们的生活经历以一定的结构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是语言在替人说话（而不是人在说语言），语言为讲述者提供一套特定的术语，让讲述者用来表达自身经历的意义，而且是其他术语无法表达

的意义。那位初学者需要刻苦掌握的正是 A. A. 群体的惯用术语，不然，他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经历，他遇到了（语言）障碍，所以他会寻求帮助。

解释性的研究者必须学会并领会语言的双重结构，要能听懂研究对象的口头语言，了解其可能的用法，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需学会解读语言中的代码，正是这些代码使得研究对象所讲述的自我故事中包含一定的社会文本（信息）。就这一点而言，可以将语言看成是探明研究对象对于自身生活经历有何种理解的入口。

作为新成员的研究者与求知主体

人们使用或理解语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分析三位不同类型的 A. A. 语言使用者时已做过解释，这三种类型是：初学者、新成员和老资格成员。如前所述，语言学习的第二步是在场景中观察不同类型的人是如何运用语言的，为此，研究者需要分析以下两个相关的因素：①场景中的社会群体类型；②个体及其经历与交往情境之间的关系。在情景定位阶段，研究者开始着手收集、区分不同个体的传记信息。

研究者就像是 A. A. 群体的新成员，他或她必须学会如何描绘自己研究的社会交往场景，否则便无法将个体与情境联系起来。和新成员一样，研究者必须学会一种新语言，并懂得如何用它来表达个人经历。

研究者试图成为其所研究的社会组织中的一员，并且是一个对该社会组织了如指掌的成员，他或她想去了解这一群体的典型成员是何种样子，他或她想知道所有相关的东西，这样才可以进行深度描述，获得个人经历故事，也就是说，研究者希望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求知主体，这可能吗？真的有这种全知全能的求知主体或所有与场景相关的事情都知道的人吗？答案当然是没有。关于这一点，许多批判理论家比如哈贝马斯、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姆都曾做过论证（Bottomore，1984；

Kincheloe & Malaren,2000)。在他们看来,求知乃是一种社会建构,在求知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达成未被扭曲、充满意义的交往。求知主体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个体进入社会结构,进而理解那些对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影响的力量。

全知全能的求知主体只是一个神话。研究者可以期望的最好结果乃是找到能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思的研究对象,他们会把自己的或别人的故事讲述出来,和研究对象一样,研究者也是处于解释循环之中,他或她总是从自己的前在观念或解释出发,来理解当前的交往场景与结构。那种圆满的、客观的、全知全能的求知主体或状态永远都不可能存在。在以后的章节里,我还对这个问题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

结 论

在本章里,我对解释性研究的场景定位分为四个步骤做了说明。在我看来,现在已不大可能去做什么单一场景的民族志研究(Single-sited ethnography)。在当今世界,民族志研究所涉及的场景已越来越多元化,民族志学者跟着他们的研究对象,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自由飘荡,包括进入赛博空间、新闻论坛群体。为了完成这种多重场景的民族志研究,研究者需要应对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场景描绘,寻找进入场景的通道,学习语言,从个体、传记以及社会群体类型的角度去分析场景中的交往活动,等等。我从不同的场景中收集了三个范例,并且把研究者比喻成某个社会交往群体的新成员。

解释性的研究者必须去观察社会群体及其结构是如何为居于其中的个体创造体验及表达自身困境的条件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又得去追溯社会结构(即交往场景)背后的发展史。无论这个社会结构是由何种交往场景构成,A. A. 群体的聚会也好,使用者网络或物品滥用热线电话也好,其创立之初的情况都必须被揭示出来。在本章里,我曾讨论过 A. A. 聚会是由哪种类型的人创立的,这些特定类型的人都有自己的生

活史，他们的生活史会在群体其他成员的传记中出现。解释性的研究之所以会表达出历史学的味道，还因为他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探索场景中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的生活史，他们有什么样的人生转折和个人经历故事，这些不同的经历故事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第6章 深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本章所探讨的主题是深度描述。描述是指用文字来描绘某件事情。在解释性的研究中,深度描述和记叙是对个人经历中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描写,这类描写必须能将行为背后的意图和意义揭示出来。与之相比,浅度描述不涉及细节,只是简单地报道事实,它们常常还会被称作"说明(glosses)"。本章将比较这些描述形式,并给出相应的范例,此外,还会指出两种叙述形式之间的联系。

双重危机

正如我在第 1 章里讨论的那样,人文学科的叙事与表演转向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关于解释性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是质性研究者能直接把握现实吗?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经验是由研究者本人通过文本写作建构起来的。这正是所谓的"再现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人们将再现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挑了出来,虽然人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的基本框架乃是将文本与现实等同起来。

第二个问题与解释性的质性研究的传统评价标准有关。这正是所谓的"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这些概念,诸如"有效性"、"普遍性"、"可靠性",等等。事实上,这些概念在女性主义与解释性的话语中已被重构,现在人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绝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中立的文化观察者,事实上,社会科学家更像是在"写文化",或者是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制造文化。写作是一种解释行为,用帕第·拉瑟尔的话说,研究者不是在"描绘"文化,而是在"书写"文化(Lather,1993)。

从这一点来看,研究不应把深度描述看成是原始文献。格尔兹曾提醒我们,这类全面细致的民族志描写是"解释的解释",是将世界转换成戏剧的常规方式,研究者并不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呈现世界,而是在创造世界。借助于深度描述,研究者就"可以用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表现自己的社会学想象力"(Geertz,1973b,p. 23;亦可参见 Abu-Lughod,1997,p. 113)。

深度描述可谓是解释民族志的基本特征。这类作品总是会去关注"各种社会现象自发出现的方式,以及人们理解自我与世界的方式"(Rofel,1994,p. 703)。这些社会现象由日常实践构成,而日常实践又"深深受制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意义与权力"(Rofel,1994,p. 703)。

阿布—卢赫德在进行媒体研究时,曾讨论过深度描述的必

要性。她指出,许多大众文化研究都显得有些“单薄”。在她看来,我们必须“回到格尔兹的深度描述……我们需要从事有关电视做品的民族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群体一起沉浸在电视中……关键在于要能够从电视节目中体会出一直以来……自马林诺斯基开始……我们都在探寻的社会及文化状况……在特定的地方,我们需要社会话语的深度描述”(Abu-Lughod,1997,pp. 112-113)。

在勾勒自己的研究计划时,阿布—卢赫德声称,关于电视的深度描述“能够表达出一些重大的问题……去描述埃及的电视,就是去描述埃及的超国家性、国家性、地方性和个体性……研究电视可以产生出更多的地方干预……在进行深度描述的过程中……我可以嘲讽权力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得下层群体过着眼前的生活。电视只是该权力体制维持自身运行的新手段之一而已”(Abu-Lughod,1997,p. 128)。电视研究使阿布—卢赫德加入了论战的行列,和她一起辩论的有埃及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这些人十分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电视节目的失真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电视常常只是傲慢地给出“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

作为表演性写作的深度描述

解释互动论者渴望将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呈现在读者眼前,解释性的作者在进行写作时,其主要目标就是想让那些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文本中所描绘的人生经历。果真如此,读者很自然地就会与自己的经历做比较(Stake,1978,p. 5)。这些正是深度描述想要做的事情。深度描述是一种表演性的写作(performative writing),它创作出栩栩如生的事情,为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想象自己在这样的场景中会这样做。深度描述记录的是来自生活经历的声音或“世界的散文”(Merleau-Ponty,1973),它将一系列的经历串联起来,从而为细致深入的解释奠定基础。

作为一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表演性写作形式，深度描述绝不仅仅只是记录人物的所作所为（这一点我在第 2 章里早已指出过），而是去详细描述情境、情感以及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必须能将其所描述的东西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从而唤醒人们的情感与内心感受。它将历史插入经历，以求能将交往情境中的个体的经历意义及其发展顺序揭示出来。在深度描述中，交往个体的声音、情感、行动与意义不仅能被人“听”到，而且能被人“看见”。表演性的文本正是来源于深度描述。在第 2 章里，安德森女士关于那天晚上投票表决的描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深度描述是以里查德森所谓的“创造性的分析实践”为基础（这一点第 3 章里已做过讨论），包括第一人称叙事、诗歌、表演性文本、虚构故事、非虚构的文学、分层描述、写故事、反应性的阅读、个人记忆和文化批评。

作为记载的深度描述

深度描述能够刻画出栩栩如生的活动场景，也就是说，这一现实主义的描述方式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其所描述的经历与事件。作为记载的深度描述还有许多类型，接下来我将一一考察它们，并将它们与浅度描述做比较。这部分的探讨涉及以下主题：①深度描述的范例；②浅度描述的类型与范例；③深度描述的类型；④优秀的与蹩脚的深度描述；⑤描述、记载与解释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度描述的界定可以通过将它与浅度描述进行比较。以下是拉尔提供的浅度描述范例。

> 你听到有人来了，口里嚷嚷着“今天是 2 月 3 号。”那么他在干什么呢？很明显，浅度描述有点像留声机，只能记录人物说了什么。浅度描述只能告诉人们他说了一句话而已。（Ryle，1968，pp. 8-9）

这正是一个浅度描述或记载，除了某人说了一句话，便再

也没有其他细节。在前面几章里,我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许多深度描述(回想一下安德森女士的记忆),这里不妨再看看下面几个范例。

范 例

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福柯开篇即向我们做了一次有关公共刑罚的深度描述,遭受酷刑的是一名试图谋杀法国国王路易的男子:

> 1753 年 3 月 2 日,达米恩因试图谋杀国王被判处"在巴黎大教堂正门前公开认罪",他"必须乘坐囚车,身上只穿一件囚衣,手拿两磅重的蜡烛"……等到了酷刑台,烧红的铁钳将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然后四马分肢,直到焚尸扬灰……监斩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刽子手卷起袖子,拿起铁钳……先将右边的小腿肉撕开,接着是大腿……然后是胸膛……达米恩哭喊道……"宽恕我吧,上帝"。(Foucault,1979,p. 4)

这则深度描述将人们带入一种残酷的历史情境中,这就是处死谋杀犯的公共刑罚。和栩栩如生的深度描述相比,浅度描述可能只会对这一事件做如下简单的交代:1753 年 3 月 2 日,达米恩因试图谋杀国王被判极刑(而福柯却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述这一事件)。

手指的方式

现象学家戴维·萨德诺曾这样来描述他学爵士乐时手指划过钢琴键盘的那一刻:

> (我)坐在钢琴前,准备弹奏一段和弦。这段和弦作为整个作品的一个部分就如同手指与琴键的关系一般……这是练习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
> 这段和弦分 A,B 两部分,两个部分之间没有什么联

> 系……弹奏 A 部分时，手指只能轻弹，弹奏 B 部分时，需要摊开手指，伸展地弹奏琴键……初学者很难连贯地从 A 部分过渡到 B 部分。(Sudnow,1978,pp.9-10)

这段叙述描绘了初学者的手指弹奏方式。初学者试图在琴键上找出手指弹奏的正确地方。对此，浅度描述可能会是这样一句话："我在学习弹奏钢琴时遇到了困难"。一个月之后，萨德诺又对自己的弹奏经历做了一次描述，这一次他是在一帮朋友面前弹奏钢琴。

> 曲子不是我创作的，它环绕在我左右，我深深陶醉于音乐中……我用心演奏这段起早摸黑不断练习的爵士乐……我的身体像脱缰的野马……我的左手指可以按"正常的间断"在 A，B 两个部分的音乐之间滑动，完全符合乐谱的节奏，与整个乐曲的旋律也颇为吻合，虽然熟练程度还比不上乐曲中的贝斯和鼓手，但我的演奏与这些背景音乐已配合得相当不错了。(Sudnow,1978,p.30)

在这段叙述中，萨德诺描绘了自己的演奏爵士乐经历。他叙述了自己的演奏行为，并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演奏感受，而在前一段叙述中，萨德诺只是对自己的手指运动做了描述(因为他那时刚开始学琴，还谈不上有什么演奏感受)。

逃离斗鸡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曾描述过他和妻子是如何逃离巴厘岛混乱的斗鸡场面的：

> 整整一车全副武装的警察开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的尖叫声。警察纷纷跳下车……人们夺路逃去，许多人撞上了墙……我和妻子决定……也和大家一起选择逃命。我们沿村里的大道逃去……半路上，遇到另一个逃散者……我们在他后面跟着……(过了一会儿)那位逃散者的妻子(她很熟悉这种场面)搬来一张桌子，上面铺着桌布，然后又弄了三张椅子和三杯咖啡……我们坐了下来……尽力让自己恢复平静。(Geertz,1973a,pp.414-415)

和萨德诺一样，格尔兹也对自己曾经遭遇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描述。与之相比，浅度描述可能只是这样交代一句：警察一来，我和妻子便开始逃离现场，接着我们和当地的一对夫妇喝起了咖啡。

作为记载的浅度描述

接下来，我将讨论浅度描述的基本特征。如拉尔所言，浅度描述只是对事实或所发生的现象做简单的报道，然而，深度描述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一点。社会科学领域四处可见这种浅度描述。在社会科学中，相关参数、图表、比率、变量、结构模式、统计表以及各种社会指标均属于浅度描述。在质性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某些浅度描述，比如，研究者对自己所要描述或解释的代码、内容只是做简单地说明，便草草了事。事实上，大量的社会学解释都是以浅度描述的材料作为基础，结果便是理论太多，描述太少。我历来主张应该协调深度描述与浅度描述的关系，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萨德诺关于自己学习演奏钢琴的经历的研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浅度描述与词语类型

浅度描述只是简单地说明事件，也就是说，它只是对事件的某些片段做肤浅的了了几句的交代，常常只是用几个词语来概括复杂、意义丰富的事件。它往往用一些宏大的词语，诸如社会学术语和概念，来完成本该由细小的词语来完成的叙述。在浅度描述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活生生的生活经验。

在浅度描述中，研究者常常使用抽象的远离经验的社会学术语来代替生动的、贴近生活经验的概念和术语（Geertz，1983，pp. 57-58；Schutz，1964.）。贴近经验的概念是指“某个人——比如某个病人、某位主体或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某个资料提供者——顺其自然地界定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时使用的概念”（Geertz，1983，p. 57）。而远离经验的概念则是指“专家

……实验者、民族志学者……所使用的用来实现其科学目标的概念……‘爱’是一个贴近生活经验的概念，‘精神宣泄对象’则是一个远离生活经验的概念”(Geertz,1983,p.57)。贴近经验的概念来源于日常语言，远离经验的概念则是来源于社会科学理论。浅度描述所使用的语言乃是远离经验的概念，而深度描述所使用的则是贴近经验的概念。

浅度描述的类型

浅度描述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概况简介(Everyday Glosses)，它散见于非社会学家的叙述中。

日常概况简介

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个体常常只能对自己的行动与经历做简单或局部性的介绍(Garfinkel,1967,pp.4-5,20-21)。当然，个体在简单介绍自己的日常事务时，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Garfinkel,1967,p.42)。加芬克尔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实例。

我和朋友在讨论一个人，这个人有些傲慢，他的态度惹得我们不高兴。为此，我的朋友说：

> “我讨厌他!”
> “你怎么了，为什么讨厌他?”
>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知道我的意思!”
> “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讨厌他。”
> (他一脸迷惑地看着我)“你怎么回事啦?我们从不谈论这个，不是吗?”

当你问某个人某些概括性的词语(比如“我讨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时，这个人也许会觉得意外，因为他觉得和他一起说话的人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社会科学领域的浅度描述

其他三种浅度描述均是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发现的。其中第一种出现在这种场合：社会学家试图用浅度描述来对其所研究的事件或过程做深刻的、详尽的理论阐述。出现第二种浅

度描述的场合是社会学家收集了许多深度描述，却把它们归纳成简单的结论，而且常常使用社会学的理论术语来进行这种归纳。第三种浅度描述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作者确实提供了某种深度描述，但他描述的却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情景，结果同样也是一种远离经验的叙述。

范 例

情场暴力——深理论，浅描述

社会学家达尔·科林斯曾对美国青年文化中的“约会制度”（Dating system）做过描述与解释。在他看来，暴力（强奸）乃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

> 约会制度中常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暴力因素。在一阵讨价还价之后，女人一般都会接受被男人当成暴力的对象。约会制度形成于二战前夕的1937年。威拉德·沃勒尔曾对“复杂的约会交易结构”（Rating and dating complex）做过分析，他认为，在这种讨价还价的约会体系中，正值妙龄的男男女女们都会尽力在他们的情欲战争中占据上风，与此同时，这一体系也会以情欲的强烈程度对他们进行分类……其最高阶段是结婚。（Collins，1975，p.251）

这段陈述使用了诸多术语，比如“复杂的约会交易结构”来概括那些值得关注的社会交往经验，包括约会过程中的强奸、暴力以及结婚。在这段有关美国约会制度的描述中，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没有，更不要提什么活生生的经历了。

小群体的交往

在对小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复杂的理论分析时，考夫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段浅度描述：

> 无论哪个群体，当其内部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出现冲突时，代表们均会尝试做出令人满意的报价……有时，冲

突迟迟不能消除……有些群体的代表彼此之间会产生分裂……另一些群体则可能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其反对者。(Cough,1988,pp. 22-23)

考夫所描述的是群体内部的复杂交往(谈判)关系,到处都是冲突、分裂与敌对,但是他并没有描述其中的任何一种冲突、分裂与敌对,而只是点出它们的存在。考夫的描述由社会学词汇写成,只是对群体内部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下概括。

医疗工作:笼统的深度描述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称为笼统的深度描述。施特劳斯访问了两位家长,他们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他们给孩子安放了一个灵敏度很高的监视装置。医生告诉他们必须昼夜照看好他们的孩子:

我们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我们)别无选择……医生叫我们照看好她,不能让她激动。他们还告诉我们要注意观察她的反应,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天到晚守在她的身边。我们担心自己会睡着了孩子会死去,我们轮流睡觉,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Stratuss,1987. p. 52)

这段叙述的作者是孩子的母亲,施特劳斯对这段叙述做了些评论,他从这对父母的活动中概括出一些特征,他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手的诊断:这对家长根据对孩子的了解自己诊断孩子的病情。那么何时监控,又是怎样识读监控器上的数据呢?

在这里,社会学家先对父母的深度描述做了一番解释,并把它与事先确定好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接着他简单描述了一个真实的经验,这便是笼统的深度描述。

典型的(虚构)深度描述:回应性的惊呼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研究者似乎是在进行有关自我经验的深度描述,但事实并非如此。戈夫曼描述了一名男子正在街上

行走：

> 他的衣着举止让每个看见他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把酒戒掉了。他头脑清醒，耳听八方……他的左脚被人行道上一小块突起的地方拌了一下，身体几乎要跌倒，但他立刻就恢复了平衡，继续往前走。
>
> 从这一点来看，他的行动能力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他那敏捷的步法足以让所有对他的责难缺乏凭证。当然，在他继续前行之前，也许他会做出某些与力学规律没有一点关系的行为。（Goffman，1981，pp. 88-89）

这些行为被戈夫曼称为“反应性的惊呼”，包括主人公说过的这类话：“怎么搞的！”（Goffman，1981，p. 90）、“见鬼”、“狗屎”（Goffman，1981，p. 97）。但是，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只是一个戈夫曼用来展开理论分析的理想类型。戈夫曼并没有描述哪个人的真实的活动经历，尽管读者可能会把他当成真实的人物。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容易掩人耳目的深度描述，但它终究不是真实的深度描述。

深度描述的类型

社会学家已经创作出了好几种类型的深度描述。他们当中有些人描述的是微观的行为，比如萨德诺弹奏钢琴。有些人描述的是交往情景，比如逃离斗鸡。有些人描述的是历史情景或早年的生活经历。而另一些人则喜欢描述特定场景中的人物活动及其社会关系。这些描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不完整的，更可以是插入式的。研究者可以将自己的解释融入描述之中，或者一边解释，一边描述。总之，解释是描述的组成部分之一（例如萨德诺那段关于在朋友面前演奏的描述）。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些不同类型的深度描述，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深度描述，乃是另外一个问题。

类型区分

完整的深度描述既是历史性的、传记性的，又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深度描述都是完整的，有些深度描述将重点放在关系上，另一些放在个人上，还有一些是放在情境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叙述的侧重点的差异，来对深度描述进行分类。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分出以下几种深度描述：微观的、宏观的历史性的、传记性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插入式的、不完整的、概括性的、纯粹描述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的。

微观的深度描述

微观深度描述所记载的是经历、交往或行动的片段，这类描述通常不包含解释——而仅仅是描述。接下来是萨德诺提供的另一个深度描述实例。

> 为了顺利演奏下一段的开头，我要略停一下，好让自己调整一下手指的位置，酝酿下一段和弦，想象自己一点一点地把它演奏完，并且与和弦的其他声位配合得天衣无缝，让人觉得我们是在"一起演奏这首音乐"。（Sudnow，1978，p. 31）

萨德诺的描述集中于记录他的行为，这就是微观的深度描述。

宏观的历史性的深度描述

宏观的历史性的深度描述是以生动刻画早期的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福柯关于公开处死企图谋杀国王的凶手的描述堪称该种描述的典范。这类描述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某一历史事件是由哪些重要的行动构成的（比如用铁钳撕开达米恩的身体）。

传记性的深度描述

传记性的深度描述是以情境中的个体或人际关系作为自

己的记录中心。下面这段叙述节选自福克纳的家庭三部曲，它所描述的是小说中的主角：

> 威尔·瓦纳，这块土地的主人（这块土地原先是法国人的地盘），本县的头头，他是本县最大的地主和最有权力的人，并且是临县的政府特派员，主持当地的和平与公正。对村民来说，他说的话即便不能算是法律，至少也是忠告和建议……他又瘦又高，像根竹竿似的，一头红灰色的头发，嘴边的胡须也是红灰色的。他是个农民，高利贷者，还是个兽医。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精明能干，城府极深，但看上去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有一种拉伯雷式的幽默，并且仍然是个好色之徒（他让老婆为他生了 16 个孩子）。（Faulkner，1957，p. 5）

福克纳将瓦纳置于某个社会结构（县）中，描述了他的身份、职业、身体特征，并对他的家庭史做了简单介绍。传记性的深度描述常常会将个体与情境联系起来，下面这个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

情境中的传记深度描述

> 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紧张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坚硬的床板上。他仰卧着，那有如铁甲一般坚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一下头，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许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要滑下来了。和粗大的身躯相比，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Kafka，1952，p. 19）

这段令人吃惊的描述是一则关于人类变成甲虫的寓言，它向读者描绘了一副格里高尔的肖像。卡夫卡成功刻画了一个人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时会有何种感受。

情境中的传记描述能将特定地点的人物及其思想、声音与感想刻画出来，而且所有的场景及人物描写都是从场景中的人物的视角出发，使人可以身临其境体会其中的经历。

情境深度描述

下面这段叙述是由朱利斯・亨利提供的,它描述了亨利在一间护理室的感受,堪称典型的情境深度描述。

> 她的房子干净整洁,墙壁略微有些发黄。一个病人坐在梳妆台前,上面摆着照片、一些盥洗用品和一个心状的糖果盒。病人梳好一头卷发,扎了一根丝带。她的脸庞有些粗糙,但已涂上了粉脂,还涂了口红。(Henry,1965,p.444)

这段情境描述中有一个人物,它描述了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此外,还对墙壁的颜色和房间的整体状况做了介绍。

接下来是一段纯粹的情境描述,也是来自朱利斯・亨利的观察。

> 主厅不仅比两边的房间宽敞,而且更为漂亮。墙上涂有令人舒适的黄色,白色的天花板……地板铺满了暗灰色的地砖,四周边缘刷的是黑色……客厅两边放了些椅子,长沙发从东边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尽头……最舒适的椅子摆在一张桌子周围……墙边有一把古式的雨伞,壁龛里有一尊宗教雕像,下面是大理石垫座,雕像的拇指脱落后又被粘了上去,墙上点缀着日本丝织品,框架是用竹子做成的,上面有许多花鸟图案。

这里,亨利所描述的情境画面是一家疗养院的主大厅。

关系性的深度描述

这类描述显然是以生动再现人际关系为基本任务。前面我们曾探讨过考夫所描述的小群体交往关系,接下来的几段叙述所刻画的是这样一种交往情景:当爱人或配偶提出要中断关系,另一方当事人会怎么办。(这些叙述均引自 Vaughau,1986,p.94)

> 她开始把我的书扔到窗外去,很明显,她真正扔掉的并不是那些书。(学生,22 岁,同居两年后分手)

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半夜突然闯入公寓，他砸烂所有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我们开始在一起时购买的。（花卉图案设计师，28 岁，同居四年后分手）

她用刀刺破我的车胎，她知道那样做就可以报复我，她甚至告诉我她一定会那样做（业务员，30 岁，结婚 3 年后离婚）。

他用刀指着结婚照中的我。（门诊心理学家，36 岁，结婚 8 年后离婚）

这些描述生动刻画了关系结束时可能发生的行动。下面这段叙述呈现的是另一种场景中的交往关系终止情况：

所有人都放学回来了……门铃响了，孩子们问谁在敲门，我正在切牛肉，听到孩子们喊："妈，快来开门，有人找"。我说："我没办法走开，你们去开吧"。"是找你的"，他们说"不，妈妈，他们非要见你。"我打开门，法官递给我一张离婚诉讼传票。孩子们问我："妈，那是什么？"他们站在我的身旁。"爸爸想和我离婚"，我哭了起来，我觉得一切都完了，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转引自 Vaughau，1986，p. 157）

这段叙述描绘了交往经历中出现的一个片段，其中既有交往活动，又有对话活动，它将读者带人情境中，告诉人们那位妇女是如何收到她丈夫的离婚诉讼请求。很明显，这是一个人生发生转折的时刻。

交往性的深度描述

就像上面那个例子一样，交往深度描述也是将注意力放在两个或更多人的交往关系上。在下面这段叙述中，讲述者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开始殴打妻子的。

我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家里乱七八糟，狗儿们也挣脱了绳索，而她却在卧室里打盹，晚饭一点着落都没有。我拿出一瓶啤酒。她出来了，不耐烦地看着我喝酒，说了

一句，这话我听过起码有一千回了，我真的受够了，我把啤酒瓶朝她的脸扔去，抓住她的胳膊，对她喊到："该死的，我的晚饭在哪！你呆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她还击了我，不停地对我说坏话。她跑过去把我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木雕拿来，她对木雕大笑，说它又蠢又笨，然后往墙上一扔，这时我完全失控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她，接着她就报警了。（转引自 Denzin，1984b，p. 501）

这段叙述具备深度描述的三个特征，这是一段交往性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陈述，虽然这里有一些概括（"这话我听过有一千回了"；"这时我完全失控了"），但就总体而言，它仍是描述性的，它让那名男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他与妻子之间的冲突。

插入式的深度描述

在插入式的深度描述中，研究者可以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解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又会很难把握当事人的观点（Geertz，1983，pp. 55-69），因为研究对象的观点是透过研究者的双眼形成的。

这里有一段插入式的深度描述，在其中，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的道德及象征意义做了探讨。

斗鸡犹如血淋淋的戏剧表演，在其中，人性与兽性、善与恶、自我与本我、积极的力量与本能的破坏交织在一起，将人类社会的仇恨、残忍、暴力与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Geertz，1973a，pp. 420-421）

格尔兹在下一页里继续写道：

多数情况下，怒火冲天的公鸡每扑打一下翅膀，每啄一下，每踢一下，便会高高跃起一次，它绝对是以自己的壮美方式象征性地为什么是仇恨做了一次柏拉图式的诠释。（Geertz，1973a，p. 422）

这里，格尔兹既不是在做纯粹的描述，也没有将当地人的观点引入叙述文本中（参见下面的分析，亦可参见本书第 7 章，

以及 Crupanzano,1986,pp.68～76)。

在上面一段叙述中,格尔兹分析了巴厘岛人热衷于斗鸡的原因和动机。他将斗鸡与弗洛伊德的理论联系起来,认为其中折射了自我与本我以及破坏性的本能之间的戏剧性冲突(Cru-Panzano,1986,p.72)。在第二段叙述中,格尔兹讽刺了斗鸡本身的意义,他从柏拉图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斗鸡行为解释成仇恨的象征,并且认为,这种壮美的动物行为中所包含的仇恨不仅是纯粹的,而且是绝对的。这些都是格尔兹的解释,而不是当地斗鸡人的看法,也就是说,读者并不知道巴厘岛人在斗鸡时是如何想的,结果当地人的观点在文本中消失了。格尔兹希望读者像他那样理解斗鸡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斗鸡的描述,读者只能读到格尔兹本人的话语。

不完整的深度描述

不完整的深度描述从详细描写当前的事件或经历开始,但在一定时候描写便会中断,并对前面的描写做总结,以概括其中的重要信息。接下来这段叙述选自伊莎贝尔·伯塔克斯威姆的访谈,访谈对象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子。这位小姐 20 岁时离开了她的家乡———个小村庄,独自来到巴黎闯荡。

> 我来到一家面包房——老板人非常好,但是就我一个人驾着马车把这些面包送到周围的农场上去,这活太重了。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我驾着马车走到一个拐角时,马受了惊吓,疯了似的往前冲,之后我每天都会心惊肉跳。我离开了面包房,我决定去巴黎找那位儿时的老朋友,她父母开了一家旅馆。我写了封信给她,但是还没等收到回信,我就出发了。(Bertaux-Wiame,1981,p.20)

在这段陈述中,那名年轻女子说她之所以去巴黎,是因为有一次驾马车受到了惊吓,这是一段传记性的、历史性和交往性的深度描述,它描绘了那名年轻女子的人生转折点,但是在明确这一点之前,还是先来看看下一段叙述吧。

> 这名年轻女子受到惊吓后不久,家里给她找了一位未

婚夫,但婚约很快就解除了,她说,她必须离开这里,我早知道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Bertaux-Wiame,1981,p.261)

不难发现,这名年轻女子之所以去巴黎并不是由于驾马车受到了惊吓,而是因为未婚夫那里出了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伯塔克斯威姆考察了法国乡村的"婚姻市场",她发现,年轻女子和其未婚夫有过性生活之后便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一旦婚约解除了,按照村里的规矩,这名女子便再也不能嫁人了。她已经不是处女,如果继续留在村里,就得一辈子不结婚。她所犯的错误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只能如此(Bertaux-Wiame,1981,p.262)。

深度描述不完整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常常急于对其所描述的真实经历下一定论,伯塔克斯威姆并没有为读者留出余地,让他们去感受那名年轻女子的言语与思考,相反,年轻女子的真实感受都被她的解释取代了,就这一点而言,不完整的深度描述有点类似插入式的深度描述。

概括性的深度描述

事实上,在讨论那种看似深度描述(其实不是)的叙述范例时,我已经对概括性的深度描述做过探讨了。前文所引的格尔兹最后一段对于巴厘岛斗鸡游戏的陈述正是一个典型的概括性深度描述。

纯描述性的深度描述

严格地讲,并不存在纯粹的描述,所有的描述都是由被用来描述现象或经历的词语构成的,这里所说的"纯"仅仅是指描述中没有插入解释而已,不妨看一个例证。

> 1933 年 1 月,天刚刚亮,街上只有一个人……他叫萨缪尔·贝内特。他戴上那顶睡觉时一直放在床边的软毡帽……他的胳膊紧紧夹着一条宽大的而且裤裆已撕破的条纹喇叭裤,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接着打开饭厅(他住父母家,共有六间房)的大门。(Thomas,1964,p.3)

这段话描述了萨缪尔·贝内特是如何开始他一天生活的。再过一会儿,他便会把家里的照片和瓷器毁掉,接着离家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发展,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这段描述没有插入解释,就像萨德诺叙述其演奏经历那样,这里也只有叙述。

描述性的与解释性的深度描述

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一边描述一边解释的深度描述。萨德诺的另一段关于演奏钢琴的感受的描述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解释性的。当然,要想创作或获得这种深度描述并不那么容易,它要求解释者能够即时反思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描述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展示讲述者的解释是如何影响其交往经历的,让我们来看看萨德诺的另一点叙述。

> 我笔直地坐着,看着自己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也许在演奏过程中,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指,但我身体往后一移,便会发现自己演奏得非常得心应手,我正在用手指歌唱,表达自己的感受,纯净的声音从我的指尖缓缓流出,如同是在不停地低唱浅吟……我是在用手指歌唱,表达我的心声。(Sudnow,1978,p.52)

小　结

表 6.1 对上面讨论的各种深度描述做了归纳,其中列有不同类型的深度描述及其内容特征,包括传记性的、历史性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其实,表中所列的 11 种深度描述可以归为三大类:第 1 ~ 6 种描述为第一类;第 7 ~ 9 种为第二类;第 10 ~ 11 种为第三类。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的描述在内容特征上倾向于突出这一点特征,而其他描述则倾向于突出那一点(比如,传记和历史)。真正全面的深度描述往往包含表中所列的各项叙述与内容特征。

表 6.1 深度描述的类型

类 型	内容与重点				
	传记性的	历史性的	情境性的	关系性的	交往性的
1. 微观描述	很少是	可能是	是	是	是
2. 宏观的历史性描述	可能是	是	可能是	可能是	是
3. 传记性的描述	总是	是	是	可能	是
4. 情境性的描述	可能	是	总是	可能	可能是
5. 关系性的描述	可能	是	可能是	总是	是
6. 交往性的描述	很少是	可能是	是	是	总是
7. 插入式的描述	是	是	是	是	是
8. 不完整的描述	是	是	是	是	是
9. 概括性的描述	是	是	是	是	是
10. 纯描述的描述	是	是	是	是	是
11. 描述性的与解释性的描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表明这种描述的内容具备该特征,第 7 ~ 11 种描述的内容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优秀的与糟糕的深度描述

作为一种书写形式,优秀的深度描述绝不是概括性的、插入式的和不完整的,与之相对,糟糕的深度描述往往会肢解细节,在记录的过程中随意插入观察者的解释,或者不是省略就是简单提一下那些关键的细节。在前文中,我已经给出了许多堪称优秀的深度描述。

糟糕的深度描述

在第 7 章里,我会解释下面这段陈述,它来源于我的 A. A.

聚会的田野考察，在这里，我把它看成一个范例，用来说明什么是糟糕的深度描述。

我在第 5 章里曾经指出，A. A. 群体的新成员必须学会听懂该群体的诸多交际术语，否则便无法明白 A. A. 群体的人在说些什么。新成员必须学会倾听，研究者同样也必须学会。那么研究人员该如何下手呢？在参加了五次 A. A. 聚会之后，我做了些记录，但是，将这些记录作为范例，是为了指出研究者不要像我当初那样做记录。我只是在记录里列了以下几点，标题是“A. A. 聚会的结构”。

1）开幕，欢迎。

2）默默祈祷——安静的时刻。

3）“情况是如何好转的？”（一个人起来朗读，其他人全部静静地听）

4）12 条惯例。（一个人起来朗读，其他人全部静静地听）

5）有没有新成员？——介绍其名字（新成员）。

6）通知——每个成员均可以发布，一般是关于下一次聚会、社交等信息。

7）如果是新成员，学习第一步（和新成员讨论 12 条惯例的第一步）。

8）每个人轮流谈论第一步，为新成员提供发言机会。

9）如果不是新成员，可能会从《宝典》中选择一个主题进行讨论，也可能谈谈当天的感想或其他任何与戒酒计划相关的问题：时间、过去的经历、责任、进展状况、内疚感、宽容他人等等。

10）捐赠（通常是在朗读期间进行，当然也可能在聚会当中的任何时刻举行，取决于聚会的人数）。

11）闭幕——“还有谁想说点什么吗？如果没有，我们将按惯例结束聚会”（主持人念祈祷文，全体成员相互问候，最后说一声“记着下次再来”）。

12）成员离开，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把烟灰缸弄干净，收好咖啡杯，把椅子放好。

无疑,这是一段糟糕的深度描述,言外之意,它是插入式的、概括性的和不完整的。我并没有生动刻画场景。在这段叙述中,听不到 A. A. 成员的声音,我以为自己知道 A. A. 聚会是怎么一回事,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涉及传记、历史、关系或交往,我只是笼统地勾勒了一下 A. A. 聚会的结构。从我所列内容来看,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类糟糕的深度描述,但前提是他或她必须打定主意长期深入场景,直至弄清所有他或她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接下来我将讨论描述与解释的关系。

描述、记载与解释

在进行深度描述的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把握个人交往经历中出现的行动、感受与意义(Geertz,1973b,p. 20)。如前所述,描述之中总是包含解释,也就是叙述研究对象是如何解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记录个体对于自身交往活动的理解,进而为研究者解释事件及其意义奠定基础。此外,那些记录事件的词语同样也是解释性的。

深度描述必须把握研究对象的行动,并将其意义揭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点,研究者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包括个人经历故事、自我故事、收集交往片段、访谈等等,来记录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这一点在第 2,3,4 章里已做过讨论。深度描述既是传记性的,又是交往性的,它所描绘的特定交往经历均包含在自我故事和个人经历故事之中。

没有深度描述,便不会有深度解释(下一章将以深度解释作为讨论的主题)。深度解释不仅赋予描述以意义,而且还要解释事件(故事)中的解释。好的解释能把"我们引入解释对象的内心世界"(Geertz,1973b,p. 18),进而揭示"研究对象的行动背后的意义支撑"(Geertz,1973b,p. 27)。

意义的层次

深度解释可以建立起一个分析与理解的系统,从而将经验

世界的丰富意义揭示出来。该解释模式认为，经验的意义分为两个层次：表层（或意识层面）、深层（或无意识层面）（Freud，1900、1965）。解释得来的意义常常是象征性的，意义在这两个层面同时表现出来。深度解释致力于揭示、呈现交往经历的多重意义结构，任何一个场景中发生的事件都具有多重意义，与此同时，每个人对于经历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意义不仅是情感性的，而且是传记性的。

简单地说，深度描述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它以多元的传记方法为基础。
2）它把自传与活生生的经历联系起来。
3）它是情景性的、历史性的和交往性的。
4）它能够生动再现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个人或群体的人生历程。
5）它能够揭示个人生活经历的意义。
6）它能让读者走入它所描述的人生经历，身临其境地体会其中的基本意义。
7）它不会笼统地解释它所描述的东西。

与之相联系，深度解释的基本特征包括（下一章对此会做进一步的讨论）：

1）它以深度描述为基础。
2）它认为，意义是象征性的，分为表层和深层两个层次。
3）它试图从多重的角度揭示交往经历的意义。
4）它的目标是去解释研究对象对于自身经历的理解。

深度解释完全符合第 3，4 章里提到的那些解释标准。

意义、影响与解释

第 2 章里已探讨过意义与影响。在谈到奥特纳时，我曾指出，从研究对象那里，可以看出一系列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影响进行考察可以揭示权力的运作机制。矛盾情境中的经历、意义与影响皆是深度描述所要刻画的基本内容。深度描述

必须呈现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其周围所发生的事件的，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将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解活动揭示出来，从而为深度解释奠定基础。

结　论

本章对深度描述做了进一步探讨，并一一列出了深度描述的基本类型，其中所引用的范例既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描述实践，也有文学家创作的小说作品（福克纳、卡夫卡）。这些范例表明，解释通常贯穿于描述之中。在本章里，我提出了几个评价描述的标准。在下一章里，我将探讨解释过程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此外，还将讨论再现及表演性的描述等方面的问题。

第7章 进行解释

Doing Interpretation

本章将探讨解释与理解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进行解释。具体来说，本章的讨论涉及以下几个问题：①解释的解释；②什么是解释；③解释类型。此外，本章还将举出诸多深度及浅度解释的范例，进而分析描述、解释与理解的关系。

在本书里,解释只指阐明意义,研究者将经历一个转生为熟的过程。解释赋予经验以意义。意义是指研究对象(某个人)的内心想法。就这一点而言,意义涉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如何理解自身的一系列经历,其中包含何种意图,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意义内在于个体所讲述的人生经历故事之中。只要对这些故事进行解释,就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在理解的过程中,经历的内在意义会逐渐地被人们领会和把握。理解既可以是认知性的,也可以是情感性的。

从某种意义出发,解释互动论者致力于理解普通个体生活经历中的人生转折或心灵发现时刻。在进行解释之前,研究者会详细描述这些关键时刻发生的事情。解释是理解的基础。光有描述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将解释与理解呈现给读者。

我在第 6 章里讨论了描述的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我会在本章里讨论解释的不同类型,也就是说,我将依次讨论微观解释、宏观的历史性解释、情境性的解释、关系性的解释、交往性的解释、插入式的解释、不完整的解释和概括性的解释。此外,我还会讨论局中人的解释与旁观者的解释之间的区别,并由此引出局中人与社会科学家对于经验的理解差异。

解释与理解的重要性

我在第 1,2 章里曾指出,解释性研究需要确定一个关注焦点。我所考察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情感经验,这些经验各不相同,但均可以使个人困境和公共议题以及各类旨在解决个人困境的计划联系起来——比如,热线电话和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治疗中心与酗酒者。研究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后现代事情的个人生活困境,并和其他研究者分享自己的发现。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给决策者提供一些支持,让他们更有效地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体走出危机。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探索,来评价那些已经实施的救助计划。如果

决策者及实施者想要顺利有效地实施救助计划，就必须理解救助对象的生活与想法。奥特纳指出："理解个体的想法是解释性深度描述的核心任务"（Ortner，1997b，p. 58）。这种解释能让我看清行动和意义是如何被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这一点将贯穿于本章之中。

解释范例

从一个糟糕的解释范例开始讨论，这样做或许对我们有帮助。让我们回到第 6 章末尾列举的那段名叫"A. A. 聚会的结构"的田野考察笔记。在这段笔记里，我描述了 A. A. 聚会的重要时刻（当然是我自己认为这些时刻是重要时刻）。以下是我的解释：

A. A. 聚会

讨 论

1）反思：其基础是每位成员对另一位发言人的讲话的反应。偶尔也会有人根据发言人的讲话公开评论他的现实状况，其观点可能是赞美，亦可能是重复发言人的说法。

2）名字：只叫名不叫姓，除非该群体是由常任代表组成。有些场合里，经常会出现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比尔或鲍伯。由于成员的名字可能会相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会加上一些特定的修辞，以区分不同的成员。比如，一头金发的塔德。

3）片语："你只是个人"、"你走上正轨了"、"有一天"、"什么事情重要就先做什么"、"不难做"、"我知道我还会喝酒"、"我没动力了"、"我祈求别发酒瘾"、"我仍是个酗酒者"、"我还在喝"、"我很难回头了"、"坐在桌旁"、"桌子"、"计划"、"自从我接受治疗以来"、"俱乐部"、"我知道我说得太多了"、"还有用吗"、"我过去是个间歇性的酗酒者"。

4)解释:每位成员或发言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释当晚或当天的主题。比如"昨天我的女婿在工作时弄伤了脖子,如果我还喝酒,我就没办法应付这事了"。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做一些比较抽象的解释,比如"我戒酒后,妻子对我可好了"。

5)成员们对聚会的看法,聚会的意义:比如,"这次聚会很好"、"真高兴今晚我参加了聚会"、"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谢天谢地,这么好的聚会"。

6)从每位成员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当晚聚会所提供的戒酒计划有什么样的理解。他们围坐在桌旁,交流各自的看法,从中又可以看出每位成员各自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重要的人际交往关系。每位成员将聚会时产生的观念与理解带入自己的酗酒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四处弥漫着喝酒的诱惑和各种各样的冲突事件。

7)计划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①承认、接纳酗酒者。②制订日常措施,消除酗酒者的交往问题和性格缺陷。③每日提醒戒酒(恢复清醒)之后的好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改观。聚会时按不同层次安排桌椅位置,以起到强化作用。当新成员加入聚会时,便会和那些已经堕落或仍沉迷于酒精的人坐在一起,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知道他或她是新来的成员。

解释初步解释

从上一段解释笔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特征:①这些对于经验的解释都是概括性的,没有告诉人们任何有关 A. A. 发言人的情况,也没有解释 A. A. 语言或 A. A. 历史到底包含何种意义,更没有理解 A. A. 群体的发展史。此外,关于聚会活动以及 12 步法对 A. A. 成员有何影响,以及影响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同样也没有做出交代。②由于这些解释均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所以它们没有记录任何活生生的交往经验,言外之意,这些解释不是建立在深度描述的基础上(参见第 6 章),其中只有一些浅度的描述。③我在做这些解释时忽视了反思自我,我以为自己知道 A. A. 聚会是怎么一回事,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

④我在解释的过程中存在偏见，首先我只关注聚会的开始阶段；其次，我以为我在聚会上听到的那些朗读便是重要的朗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做笔记时，应该打听一下，哪些才是真实重要的朗读。⑤我没听清 A. A. 成员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以为大家讨论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没有必要去听每个人说了什么。⑥我以为所有的 A. A. 聚会都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在笔记里所做的解释显然是一种浅度解释，而且夹杂了许多主观臆断的成分。接下来，我还会指出，我对 A. A. 讲话中的反思性（机制）所做的解释也显得有些粗糙。A. A. 讲话能让全体 A. A. 成员关注讲述者的生活经历，当某个 A. A. 成员开始讲话时，他或她是对全体成员而不是对特定的个体讲，他或她无法知道某一成员对他（她）的讲话会做出何种反应。讲述者在讲话过程中是在和整个群体进行对话。

我后来了解到，A. A. 成员还设法记住了彼此的名字，并形成了一些口头禅，比如"一头金发的塔德"，就是新成员喜欢使用的口头禅之一。在所有的聚会上，许多成员都可以说出某个名字背后隐藏着一段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片语（比如"有一天"等等）在所有 A. A. 聚会的讲话中都会出现。这表明 A. A. 成员拥有自己的言语习惯，并且会根据这种习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后来我发现，竟可以根据讲述者的言语特征来判断他加入 A. A. 群体的时间长短，但是，在我做那些解释笔记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当时我不知道聚会上讲述者是如何将自己的讲话与人生经历联系起来的，虽然我在倾听他们，还对他们的讲话做了初步的解释，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将 A. A. 成员的讲话内容放到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来加以解释，我也因此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酗酒，以及后来又怎样把酒戒掉的。此外，我还错过了那些一心一意想戒酒的 A. A. 成员，要知道这些人可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准备戒酒的，本来我在做上面列举的第 7 点解释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还是没有把握好。总之，上面那个解释范例正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倾听的研究者可能做出的描述与解释。

时间花费

解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①研究者可能需要花费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②正如我在第2章里指出的那样，研究者必须得去考察研究对象的生平经历。为此，研究者还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的社会交往结构，否则便无法解释个体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其讲述的，也无法弄清楚他为什么会使用这种语言，讲述这样的故事。③研究者必须考察研究对象的人际交往关系。④研究者必须学会如何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反思经验的意义。这个过程被米德称为"采取他者的态度"(Mead,1934)，它既是言语性的，又是情感性的。为实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真正融入他所研究的个人或群体生活之中，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经历，否则，研究者就只能做一些肤浅的、粗糙的解释。

我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掌握了 A. A. 群体的语言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由于解释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做准备，所有对研究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或许是去研究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样的话，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便可以成为他的探索基础。米尔斯一直提倡将个人经历与社会学探索联系起来，我想这一做法正是该原则的体现之一吧。

解释做些什么

如前所述，解释的基础是描述，是赋予深度描述的人生经历以意义，而经验中的意义又是由一系列的象征符号表达出来的，在这些象征性的表达中，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无疑是最常见的形式。有些时候，内涵丰富的经验还可以通过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戏剧性的方式包括表演性的文本和其他各种表演(Bruner,1986,p. 7;Turner,1986a)。

解释者的类型

解释由解释者完成。解释者分为两种类型：①解释者亲身

经历过他所解释的事件;②非常了解情况的专家,通常是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对于同样的深度描述的经历,这两类解释者(当事人与社会学家)常常会做出不同的解释。

解释必须澄清一系列经历所产生的意义,它是在一定的解释框架之内进行的,而这个解释框架对于研究对象来说,同样也是意义丰富的,也就是说,它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所做出的解释都非常贴近研究对象的经验。正如格尔兹指出的那样,解释是要将个体经验的意义及观念结构揭示出来,正是这些意义及观念支撑着个体的经验(Geertz,1973b,p.27)。

解释理论

这(解释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个体拥有关于自身行动及经历的理论。这些理论来源于某些个体共同分享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群体的口头及书面文本来了解这些理论。用格尔兹的话来说,这些理论是以"地方性知识"作为基础(Geertz,1983),是个体或群体对自身重大经历的理解。这一"地方性的知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能够赋予经验以意义,进而帮助个体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类知识可能是宿命论的、理想化的、宗教性的、精神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政治的或荒诞的,它们可能与某些社会理论有一定的关系,无论它们性质如何,都可以通过口头或书写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以下是一个地方性解释理论(Local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范例。讲述者是一位 A. A. 成员,他戒酒的时间已有 10 年。

> 我过去每天都要喝酒,后来我加入了 A. A. 群体,从中我得知自己是个酗酒者。我参加 A. A. 聚会,阅读《宝典》,参照其中的步骤去做,就这样,我把酒戒掉了,而且成了一名 A. A. 指导者。我和一名新成员一起实施了一项精神计划。自从我做这些事以来,我再也没沾过酒。(45 岁,男性,离婚,粉刷工)

叙事、故事与地方性解释理论

在上面一段陈述中，叙述者解释了他为什么能把酒戒掉，其解释中含有 A. A. 群体内部通行的酗酒理论（将酗酒视为一种疾病）和康复理论（参加聚会、阅读《宝典》、与他人合作等等）。这种理论认为，只要你做好这些事情，就可以成功戒酒，并保持下去。叙述者的确做了，并且戒酒已有 10 年之久。他用 A. A. 理论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问题，A. A. 理论即是他的理论。从上一段陈述来看，他已基本掌握了 A. A. 理论，能用它来概括自己的经历（后面我会详细讨论概括性的解释）。他通过简短的故事或叙事来展开自己的陈述，其中既有开端，又有中间和结尾。他说他过去每天都要喝酒，接着他参加了 A. A. 聚会，并在那里知道他患了一种名叫"酗酒"的疾病。在叙事的中间部分，他接受了一项精神治疗计划，故事结尾他告诉我们，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便再也不喝酒了。

研究者的主要解释目标是去揭示故事背后的观念，正是这些观念支撑着研究对象的经历。正如我在第 1，2 章里所指出的那样，探究当事人如何解释其自身经历乃是所有解释性的研究者都必须做好的事情，否则便无法实现他们的解释目标。当研究者这样去做时，就可以将研究对象行动背后的观念结构揭示出来，相反，如果不这样做，研究者便会置研究对象的观点于不顾。与之相联系，研究者就只能把自己的观点、评价或解释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而这些解释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行动计划中，则该计划很可能就会失败。当然，研究对象自身的理解有时也是不完整的，充满诸多只为自己考虑的偏见，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必须超越研究对象对于自身经历的理解（参见下文的讨论）。

深度描述的经历中含有诸多解释因子，研究者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及文化语境中，并深入其中观察、分析研究对象如何解释（理解）他们自身的行动。这就是解释所要做的事情。

解释的象征性

我在第 6 章里曾经说过，经历具有两层意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行动的表层意义与它的深层意义并不是一回事。表层意义更具象征性，因为用来描述经历的语言是象征性的。人们可以从多重的角度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言外之意，同样的一件事常常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例如，同样是说一声“喂”，一脸怒气地说和面带微笑地说所表达的意义就不一样。既然解释是象征性的，研究者就必须留意词语、短语和手势（等等符号）所表达的多重意义，也就是说，解释必须是情境化的，情境变化了，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解释的象征性。表达的意义同样充满了象征性。这些象征性的意义表达方式常常包括故事和叙事，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常见的故事讲述模式，比如表演、社会戏剧（Social dramas）和群体内部流行的各种文本形式（Bruner ，1986；Turner，1886b，p. 41）。对这些象征性的表达进行分析，研究者便可以揭示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或个人在人生的危机时刻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解释的类型与范例

研究者可以收集到或创作出多种类型的解释文本。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与描述一样，解释也可以分为微观的、宏观历史性的、传记式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插入式的、不完整的、概括性的以及深度和浅度的，但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第 6 章里的讨论框架，我在这里只将注意力放在以下几种解释类型上，它们是深度解释、浅度解释、当事人的解释、观察者的解释、分析性的解释、描述性的解释和关系—交往性的解释。

浅度解释

浅度解释无疑是概括性的解释，而且常常是在解释行动的

因果关系。例如,“这个人急匆匆地穿过马路,因为公交车就要来了。”就像浅度描述一样,浅度解释也没有任何与情境、传记、交往、历史和社会关系相关的细节刻画。回想一下第6章里,戈夫曼描写的那个差点在大街上摔了一跤的男人,在摇摇欲坠的那一刻,他朝那些看见他被绊了一下的人们嘟哝了一句。对此,戈夫曼认为,“我们的观察对象想说这不怪他,他这样做是想告诉人们,是环境特殊(道路不平整)导致他没走好路,(所以)他是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Goffman,1981,p.89)。戈夫曼继续评论道:但是,那个人违背了下面一条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这就是“在公共场合对着陌生人说话”(Goffman,1981,p.88)。戈夫曼的这些解释都是浅度解释,它们既是分析性的,又是概括性的(参见下文),而不是建立在深度描述的基础上,因而,在这些解释中,看不到关于那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交往等等方面的陈述。

深度解释:旧病复发的酗酒者

深度解释以深度描述为基础(参见第6章的相关讨论),能够将个人经历的场景、历史及其交往关系揭示出来。下面这个例子选自我的一本专著《康复的酗酒者》(Denzin,1987b),在其中,我讨论的是那些参加A.A.聚会有一段时间却又旧病复发的酗酒者。

> 这些旧病复发的酗酒者常常认为自己“处境艰难、身不由己”。他们参加A.A.聚会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他们便可以重新做人,找回酗酒之前的自我形象。(Denzin,1987b,p.151)

如果A.A.成员在聚会上重犯自己喝酒时遭遇过的问题,他们的酒瘾就会复发。上面这段解释对旧病复发者的处境、历史、经历及交往关系做了说明,其解释基础正来源于有关酗酒者的深度描述(Denzin,1987b,第6章)。

当事人的解释、情境关系:挨打的妻子

如前所述,当事人的解释是指研究对象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来解释自身生活经历的内在意义。它既可以是深度的，也可以是浅度的。下面一段陈述是约翰逊和费拉罗提供的，讲述者是一位受丈夫殴打的妻子，其丈夫是个酗酒者。他解释道，她之所以下决心离开她丈夫，是因为她丈夫威胁说要打死她。她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此做了解释：

> 这件事反反复复，就像是晃来晃去的钟摆。他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让人琢磨不透。他一喝醉就把我痛打一顿，清醒之后又把我当成女王一般伺候着。有一天，他拿枪指着我的头，然后朝我开了一枪。只不过枪里没装上子弹。就是在这一刻，我决心离开他。接着我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财产。(Johnson & Ferraro, 1984, p. 121)

在这段陈述中，妻子是在解释自己的离婚行动，她是在丈夫拿枪指着她的头的那一刹那，决心离开丈夫。这段解释既是情境性的、历史性的，又是交往性的、关系性的。

观察者的解释

约翰逊和费拉罗指出，就上述及其他类似的范例而言，比如“某些妇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陷入危机，等待她们的将是一个逐渐走向牺牲的过程……保护生命比维持关系更重要”(Johnson & Ferraro, 1984, p. 121)，这种解释来源于这些妇女对于自身经历的理解，它使得妇女的解释获得了意义，而一点也不像我先前对 A. A. 聚会的解释或格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解读(参见下文)。后一类解释均是观察者将自己的(解释)框架强加在当事人的经验之上。

观察者解释的类型：独白与对话

观察者的解释同样既可以是深度的，也可以是浅度的。它既可能来源于观察对象的解释，也可能是研究者把自己的解释强加在观察对象的经验上。如果是后者，那么观察者的解释便成了一种独白，就会把研究对象的声音压制掉。这种解释实际上就是用观察者的话语来表达研究对象的经验(参见格尔兹的解释范例)。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解释也可能是对话性的或“复

调”的(polyphonic),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和解释(Bakhtin,1981;Bruner,1986;也可以参见下面的范例)。研究者最好使用对话的或“复调”的解释文本,因为它能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对话与“复调”的解释:12 步法

下面这个例子便是一种对话或“复调”的解释。它也是取自我的那本专著《康复的酗酒者》。在这段“复调”解释中,四名 A. A. 成员各自表达了对于“12 步法”的看法。(Denzin,1987b,p. 111)

> Tn: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个邻居,他正在拼命地戒酒。昨天我去看他,并给他介绍 12 步法,我说……他需要帮助。
>
> Ws:我叫 Ws,我是个酒鬼,我今天不想说什么。八年前的今天,他们把我带到五楼……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我在那接受“12 步法”治疗。他们说,你的 12 步法很成功……你终于清醒了。
>
> Khy:我叫 Khy,我是个酗酒者,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康复的,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加在一起远不止这些(12 步法)……
>
> Dv:我叫 Dv,我也是一名酗酒者。我正在帮一个家伙戒酒。我好了又喝,接着又好了一阵,可不久又喝上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我接受 12 步法之后成功了。

在上述四个人的对话中,每位讲述者都谈了自己对于 12 步法的理解。Tn 说他把 12 步法介绍给了邻居,Ws 描述自己是如何接受治疗的,Khy 说自己康复了,Dv 说自己在帮别人戒酒,那位酗酒者仍在喝酒。我把这段陈述称为对话的、复调的或多重声音的解释。

分析性的解释

分析性的解释是以一个抽象的而且常常是随意的主题来解释研究对象的经验。在这一点上,研究者最一般的做法是将

某种理论引入他(她)所观察的情境中,虽然有时候该理论确实是从情境中引出来的(参见格尔兹对于巴厘岛斗鸡所做的分析,下文对此会做讨论)。

描述性的情境解释:演奏爵士乐

这种解释十分贴近它所要解释的具体情境,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它必须是传记式的、历史性的,此外,它还必须关注具体的每一个细节,能够揭示每个案例或经历片段的特殊意义与结构。描述性的情境解释也有可能是"复调"的或对话性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有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接下来的一段解释中,戴维·萨德诺谈论的是他在钢琴上演奏爵士乐的"高超技能"。

> 当(我觉得)时间随着我的指尖、双手、胳膊、肩膀以及我的全身缓缓流动时,当我的演奏与整个乐曲的和弦部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我心中所要表达的一切都被我演奏的爵士乐表达出来了,而我自己也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演奏之中。(Sudnow,1978,p. 141)

在这段陈述中,萨德诺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爵士乐演奏能力。他是从"时间"这个角度展开解释的,时间在他的指尖、双手、胳膊以及肩膀里自然流动。这是一段极具深度的描述性解释。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有关情境的解释,而解释者与钢琴之间的作用关系也被生动刻画出来了。

描述性的解释:真实的与解释性的

描述性的解释分为两类:真实的与解释性的。描述性的情境解释既可以将事件或经历如实或客观地记录下来,也可以为了突出解释性这一特征,将重点放在当事人对于事件或经历的理解上。描述性的解释致力于解释事实,而解释性的叙述则是将那些已被解释的经验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解释者无须交代自己所解释的经验是否都是真实的,更没有必要声明自己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关系—交往性解释

这类解释侧重于揭示个人经历中所涉及的人际交往关系。事实上,所有的解释都会涉及某一情境中的人际交往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它必须以深度描述为基础,并且要防止它变成分析性的解释。

在前文所列举的解释类型中,可以看到许多人际交往关系方面的解释。接下来我对其中的某些范例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浅度的、分析性的以观察者为本的解释

格尔兹及巴厘岛人的斗鸡

在第6章里,我从格尔兹的巴厘岛斗鸡研究中节选了好几段解释作为范例。在我看来,这些解释常常混淆了解释与描述之间的是非界线。下面是格尔兹的另一段解释:

>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上演斗鸡,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而巴厘岛人也随着斗鸡表演一遍又一遍地被人们阅读。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通过自己的悲剧表演向我们展示其主体性,巴厘岛人也通过斗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的社会习俗。(Geertz, 1973a, pp. 450-451)

这段叙述表达了什么意思?格尔兹将斗鸡文本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做比较,并且认为它们均向读者表达了某种可以理解的主体性。那么,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事实上,这些解释都是格尔兹本人对于斗鸡的理解,巴厘岛人并没有把这些意义带入自己的斗鸡游戏中。

接下来是一段更加抽象的斗鸡解释,格尔兹认为:(Geertz, 1973a. p. 441)

> 1)斗鸡者越是了解斗鸡……就越能在斗鸡中取得领先……就越能挑出最好的斗鸡。
>
> 2)斗鸡者在斗鸡过程中的情绪越是高涨,就越是投入

斗鸡，其好斗之心就越是坚定。

格尔兹指出，这两点就是他用来解释斗鸡的逻辑结构（而不是因果关系意义的结构）的严谨范式（Geertz，1973a，p. 441）。我将他这两个观点称为关于某一重要文化文本的分析性解释。在这段解释中，包含一些值得商榷的描述，诸如"了解"、"最好的斗鸡"、"情绪高涨"、"投入"、"坚定"，格尔兹并没有解释它们的意义，而格尔兹的解释也因此远离了巴厘岛人斗鸡的真实体验。

格尔兹的这段解释有点断章取义的味道，而且一点人际交往关系的描述也没有，这是一种独白性的解释，其中根本听不到当地人的声音。它也不是对话性的，因为格尔兹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当地人的经验上。格尔兹觉得这些解释如实反映了斗鸡的形式与内容，但事实上，他忽视了当地人的斗鸡描述与解释，也就是说，关于斗鸡，我们只能得到格尔兹的理论解释。

林德史密斯：反常案例与分析性的解释

有必要对分析性的解释做进一步的探讨。我将以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的著作为例，他的著作谈到了分析性归纳的内在逻辑，与我所说的分析性解释十分接近。分析性的归纳（与解释）是一步一步地对现象进行界定与解释的过程。简单地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界定现象。

2）形成关于现象的初步解释。

3）考察与该现象相关的一个或一系列的案例。

4）找出一些反常的案例或不正常的经历，并由此重新解释现象。

5）继续上述过程，直到归纳出所有案例的共同特征（Denzin，1978，p. 192；1987b，第 8 章）。

林德史密斯将上述过程称为"分析性的归纳"，而我则把它称为"分析性的解释"，因为这是一个解释性的对事实进行归纳的过程（Athens，1984. a、1984b）。林德史密斯解释道：

在寻找案例以验证某一理论（解释）时，必须尽可能

> 地多找一些反常的案例。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研究者必须弄清楚哪些是非常关键的领域……他知道，只要将自己的理论假设放入这些领域中，很快就会发现它有什么缺陷。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寻找反常案例。（Linde-smith。1952，p.492）

林德史密斯曾研究过吸毒，他想提出一种关于吸毒的社会学理论，他假设，如果人们还不知道他所吸食的毒品是能使人上瘾的，那么就不会成为瘾君子，相反，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吸食的毒品是能使人上瘾的，而且他吸食毒品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旦不吸就会很痛苦，那么他便是个十足的瘾君子。但是，这些假设后来被推翻了，他访问了一位服用吗啡已有好几周的内科医生，该名医生知道毒品能使人上瘾，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染上毒瘾，这一反常案例使得林德史密斯只有重构自己的假设，进而提出，所谓上瘾就是某个人知道不吸毒会有多痛苦，并因此通过吸毒来消除痛苦（亦可参见 Becker，2001，p.258）。

林德史密斯就使用反常案例这一点对他的研究做了评论：

> 每提出一次假设……都是以前面的假设为基础，最终假设是对前面所有假设的重构，从而可以将那些被前面的假设当成例外的反常案例包含在内。（Lindesmith，1947，pp.9-10）

林德史密斯接着向我们谈起他是如何寻找反常案例的，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访谈那些上瘾的吸毒者，二是到研究文献中去寻找。在他看来，他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是经得起事实验证的，无论是访谈，还是研究文献，他都没有找到一个与他那个最后结论相矛盾的反常案例。

研究者使用分析性的解释是为了提出一种适合所有现象案例的解释，这类解释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一个反常案例都找不到。

分析性解释的问题与优点

使用分析性的解释必须考虑以下四个问题：①分析性的解

释所依赖的是科学模式，即提出假设，验证假设。②它认为事实可以被收集起来，以验证某种理论假设，就这一点而言，这一方法常常不能处理事实的社会建构特征（Fielding & Fielding，1986，p. 33）。与此同时，也不可能发现什么"客观真理"，纯粹客观的理论验证过程更是一种幻想（Lincoln & Guba，1985，p. 283）。③分析性的解释将解释过程简化成了提出一套不包含情境与个人经历描述的理论观点，言外之意，在这类解释文本中，根本看不到活生生的个人生活经历，而正如我在第 2 章里所指出的那样，解释互动论者决不会做这种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之类的事情。④如前所述，分析性的解释将当事人的声音压制掉了，进而形成独自性的解释文本，即以研究者的观点代替当事人的观点。

当然，分析性的解释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它具备以下一些优点。①作为一种解释策略，分析性的解释能让研究者对现象进行清楚的分类，并明确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②它可以提醒研究者注意那些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反常案例。③它能够使研究者不断根据经验来验证自己的解释。虽然分析性的解释具备这些优点，但如果它不是深度的、对话性的或多重声音的，那么研究者还是应该避免使用这种解释策略。

深度的、情境性的、交往性与多重声音的解释

伊洛哥特人的狩猎故事

这类解释可以在罗萨尔多关于伊洛哥特人的狩猎故事的人类学研究中找到。伊洛哥特人居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北的高地上，人口大约为 3 500 人。虽然伊洛哥特人是靠猎捕鹿、野猪以及种植花园为生，但实际上他们是"猎取人头之野蛮人"（Headhunters）。他们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通常是关于捕杀野生动物、冒险、害怕死亡以及人最后战胜了动物。罗萨尔多对这些故事做了记录与解释。以下几段陈述皆选自他的解释文本。

我们走远点……那儿去打猎。猎物吃光之后，我们就

会去马布打猎,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打到猎物,所以我们要去最高的山打猎。(Rosaldo,1986,p.104)

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坏人对猎人的妻子说:

别走,管好她们的阴道……和他们的阴茎。他们会把我们灌醉的,他们说,朋友,就在这时,他们(把我们)劈开了,这些都是伊洛哥特人干的。他们突然袭击过来,然后便消失了。(Rosaldo,1986,p.124)

以下是罗萨尔多对这些故事的解释:

从伊洛哥特人所讲的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现在以及未来的打猎生活。事实上,他们打猎时的感受与讲故事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狩猎体验被伊洛哥特人自己用故事表达出来了……伊洛哥特在自己的狩猎故事中扮演的是主角。(Rosaldo,1986,p.134)

罗萨尔多在解读这些故事时,是将它们与伊洛哥特的现实生活及其对未来的憧憬联系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讲,罗萨尔多的文本中既有自己的理解,又有当地人对于自身经历的解释。他没有去考察这些故事是否"真实",而是把它们当成事件来描述,该事件可能发生过,也可能从未发生,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伊洛哥特人狩猎生活的象征性表达。

作为受害者的挨打的妻子

约翰逊和费拉罗曾对"受害者的自我"做过探讨,他们将"受害者的自我"界定为"个体遭他人强暴、剥削或错误对待之后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及思想混合体"(Johnson & Ferraro,1984,p.119)。在对挨打妻子的生活经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发现:

"受害者的自我"出现于生存遭到威胁的那一刻,但是,一旦个体采取行动,建构新的更安全的生活条件,它便会消失……(它)常常出现于暴力与虐待失控的那一刻。(Johnson & Ferraro,1984,p.121)

接着约翰逊和费拉罗解读了挨打妻子的婚姻故事，从而得以对上一段解释进行情境化处理，将个人经历及其交往关系融人解释之中，最后，他们的解释文本不仅是对话性的，而且是多重声音的。该解释文本以当事人的解释为基础，事实上，它所做的仅仅是将当事人的解释如实地表达出来，而这些恰恰正是深度解释必须去做的事情：即揭示在活生生的经验世界中，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下面我将讨论表演问题以及诸多用来再现解释的“创造性分析实践”（Richardson，2000）。

表演与再现解释

“表演性文本”与其他一些文本相互作用，这些文本包括田野笔记、访谈和文字著作等等（Denzin，1997，pp. 98-99）。表演以及解释即是来源于这种交互作用。意义可以通过表演的方式表达出来。表演场景可以产生多重的意义与快感，包括美学的、知性的、情感的、参与的、政治性的和各种文化记忆等等。表演文本不仅以戏剧化的方式报道当前的文化生活，而且还能对当前的文化生活展开批判。

表演文本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戏剧性的文本、仪式、诗歌和剧本、自然文本、日常对话记录改编成的表演文本、田野笔记和谈话改编成的表演文本，此外，还有即兴的批判性民族剧，该剧将真实自然的对话融入戏剧化的场景中，人物性格也十分复杂（Mieuczakowski，1995）。

应该将这些戏剧形式与“舞台朗读”区别开来。“舞台朗读”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站在舞台上，拿着剧本朗读，这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表演形式，而且是反复排练的结果。如果是即兴舞台朗读，就需要一位导演了（通常是剧本的作者），导演把剧本分给大家，然后按顺序朗读即可。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总会想方设法地把剧本丢掉，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站在舞台上仍会保留剧本中的某些内容，甚至将在场的观众当成自己的合作

表演者。

接下来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三种表演性的再现形式，诗歌、短篇故事和分层文本。

诗　歌

有时候，解释可以通过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下面这段诗歌便是由一位田野工作者创作的，在这首诗中，她对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做了一下描述（Simonelli，2000，pp. 105-106）：

> 我们是游客……
> 在甘村、支臣伊特扎和伟大的玛雅遗址之间漂流
> 为了教导你们
> 我们想深入了解你们的斗争
> 我们贸然闯入你们的生活
> 没有权力，没有希望，无能为力，四面楚歌
> “别把我们当成坏人”

短篇故事

简·哈利曾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短篇故事，内容是关于童年时的心灵创伤：

> 这是我的成长史，我的回忆录，这是我的一切。我想我不会忘记，我随时可以回到过去，我深知它一直会留在我的记忆里。（Halley，2000，p. 349）

那么，这个留在她心里的记忆是什么呢？是儿时的她坐在爷爷的双腿上：

> 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耻辱的回忆。我坐在麦克的双腿上，麦克的手伸进我的衣服里，在我胸前抚摸……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这样做……我记得格雷姆走过来，她什么都看见了。我有许多事情想对你说……但太晚了……我可以告诉你格雷姆做了什么。她走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切，接着她转身就走了。（Halley，2000. p. 358）

分层文本

在分层文本中，表演性的写作常常会穿插一些解释。卡罗尔·兰博·罗奈曾使用过这种写作方式。她写道：

> 我光着脚，正在戴文胸，那帮男子的尖叫声把我耳朵都震聋了……一名醉汉大嚷道："庄家 15 点"……我环顾屋里四周，对着人群笑了一下，这帮冷酷无情的酒鬼。我试图让自己在这种场合里镇定下来，我有点觉得恶心，但我只能克制……当我从舞台上下来，剧团经理基第说了一句，"干得不错……"。
>
> 我在笔记里记下了当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篇有关剧团表演的分层文本。我想让人们看看，一位人类学家同时又是一名舞者或杂耍表演者会把今晚的事情描绘成一副什么样的图景。为此，我会强调文本的模糊性，并将表演者的身份与他们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我借用了德里达的"玄秘速写"(Mystic sketch)观点，以求将自己的印象表达出来……以现有的知识储备为基础，我便可以用分层叙述的方式来描述眼前活生生的经验。(Ronai，1999. pp. 114-115)

罗奈在另一处指出，"分层描述是一种后现代的写作形式，人们可以用它来颠覆'科学'话语在文本中的核心地位"(Ronai，1998，p. 407)。这种写作形式可以让作者在描述与解释之间自由穿梭。

接下来将讨论理解及其与解释的关系。

理　解

解释是澄清经验的意义，而理解则是指把握、消化作者在解释过程中所感受、所表达的意义(Denzin，1984a，：pp. 282-284)。解释在理解之前，它在一定的框架内描述个体的行动，理解个体的经验片段，并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意义的陈述。

正如描述为解释奠定了基础，解释也为理解奠定了基础。施瓦德曾指出，理解与解释是一种涉及对话的道德实践（Schwandt，1999，p. 455），也就是说，理解是一个对话性的交往过程，在其中，个体必须知道自己是如何与别人机械对话的，当然，这当中也可能会发生误解（Schwandt，1999，p. 455）。

要达成理解，研究者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或者与对方有过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经历（Denzin，1984a，p. 137）。在理解对方的生活感受时，研究者必须将心比心。这一点对于理解别人的情感体验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Denzin，1984a，p. 137）。这意味着，分享彼此的感受乃是理解过程的中心环节，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将解释与经验分享看成是理解过程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这里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两个要素。

解释：倘若研究者没有解释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便不可能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而在理解之前，研究者还必须对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做深度的描述，这就像脱离特定语境的暴力行为是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的，为了解释这一象征性的行为，读者必须知道暴力之前发生了什么，他还必须清楚暴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只有了解了语境，读者才可能解释该暴力行为的意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描述与解释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分享经验：如前所述，理解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必须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体会他的人生经验。米德称此为“采取他人的态度”（Mead，1934：）。此外，人们还使用过其他一些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包括“同情”、“感受”、“想象”以及“同情地理解”等等（Denzin，1984a，p. 133）。其实，无论使用什么措辞，其基本含义都是一样的，均是为了号召研究者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体会其中的感受，或者能够从研究对象的观点出发，来解释自己所研究的经验。这也正是我所强调的与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即便不能直接做到这一点，研究者也必须分享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如果做不到经验分享，研究者便只能进行一些肤浅、空洞或单方面的解释。

理解类型

理解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认知性的理解,二是情感性的理解(Denzin,1984a,pp. 145-146)。情感性的理解是指研究者在进行交往性的解释过程中,沿着一定情感或自我感受的线索,与研究对象展开心灵对话,分享对方的内心感受。与之相反,认知性的理解则是一个理性的有一定顺序的逻辑化过程,这个过程与情感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情感性的理解决不会采取理性的逻辑认知方式。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人们很难将这两种理解区分开来,这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既包含情感方面的内容,又蕴涵一定的理性特征(James,1890、1950,pp. 185-187)。

理解还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虚伪的理解,这种理解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研究者在了解研究对象时草草了事,或者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别人身上,也就是不愿意倾听别人的观点。当然,有时也可能是由于误解了别人的意思,或者在描述别人的行动与经历时注意力不集中,只能做一些浅度描述。

第二种是诚心诚意的情感性理解。它发生于研究者真正走人了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世界,以至于形成与研究对象相类似的生活感受,也就是说,只有以经验分享为基础,才可能产生诚心诚意的理解。

除了以上几种理解之外,还想提一下另一种理解类型。正如理解可以分为认知性的理解和情感性的理解,解释也可以分为认知性的和情感性的。认知性的解释在解释经验时常常会将情感过滤掉,它只注重事实本身,并且往往以浅度描述作为基础,与之不同,情感性的解释则处处洋溢着真实的内心感受。

举例说明

下面这段叙述的讲述者是一位康复的酗酒者,他成功戒酒已有 6 年,他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另一位 A. A. 成员听,地点是在治疗中心。

我清醒时酒瘾引诱不了我——这事都过去8年了(他曾对一名儿童进行过性骚扰),我只要一喝酒,这件事就会浮现在我眼前,然后我就会想再去做这种事,我想它都快想疯了,也许我之所以想喝酒,就是为了体会这种事带给我的疯狂。我不知道,看看喝酒把我整个人弄成什么样了,前妻把房子、车子、钱全拿走了,我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桶酒。我可以戒几个星期的酒,但之后又会喝。我怎么办?见鬼,她都快把我逼疯了,我打她,把她重重地往墙上推,现在我连家都没得回了。

我知道我是酒鬼,我也知道什么叫(戒酒)"计划"。不错,我是应该把酒戒掉的,可我做不到。你知道,我后来没去参加聚会,我没办法不喝酒,我甚至可以接受别人说我是个酒鬼,但我的肚子不管这些。我仍会喝,我就是想喝,我可以对别人说这种话——我是个酒鬼,我一点也不在意,我是不是疯了?(1985年8月1日)

这个自我故事囊括了上述所有的理解与解释类型。讲述者对于自己的酗酒行为有一种认知性的了解,也解释了酗酒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但是他对自己是个"酒鬼"这一点理解得并不深刻,而且对于自己的处境也缺乏情感性的理解或解释。他的看法有些粗糙,不够贴切。他极力将自己与喝酒造成的消极感受分离开来,就是不愿诚心诚意地理解自己的酗酒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明明知道A. A.群体的(戒酒)"计划",但却不想照着计划去做,也就是说,他没有将有关A. A.计划的(认知性)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情感,进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酗酒行为。

上述种种理解与解释便是人们据以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基本工具。只要考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它们一直在影响人们的交往活动。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它们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们应该成为解释性的社会学家的基本词汇。不仅如此,从这些理解类型出发,解释性的社会学家还可以界定出自己的解释目标,这就是在探究现象时,努力形成真正诚心诚意的理解。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解释性

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度描述，因为只有它才能刻画栩栩如生的活动场景，并让读者设身处地地体会研究对象的情感历程。

理解与应用型研究

在前面几章里，我曾指出过，许多应用型的评价研究都会去考察某一特定的计划是如何分析它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此外，我还指出，必须充分考虑计划服务对象的观点（地方性理论）。评价人在进行认知性或情感性的理解时，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虚伪的理解"，因为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现象，而且常常带有偏见，言外之意，应用型研究必须照着上述各种理解类型来反思自身的理解到底存在何种问题。

不幸与猎取人头者的暴怒

让我们回到罗萨尔多和伊洛哥特狩猎者。如前所述，伊洛哥特人有时会将人头当做自己的猎取对象，罗萨尔多问伊洛哥特人什么时候才会猎取人头，他们回答说"当他们愤怒无比时就会猎取人头"（Rosaldo，1984，p. 179）。罗萨尔多觉得他们说得太随意了，近乎天方夜谭，所以没有对他们的回答予以认真考虑。但是，1981 年，他的妻子米切尔·罗萨尔多却在菲律宾死去了，当时她正在研究伊洛哥特人，罗萨尔多对这一事件做过描述。

> 我陷入了悲伤，但愤怒压制了我的眼泪……我心如刀绞，无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悲痛。我面色苍白，四肢冰冷。我知道妻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心灵在颤抖，全身也跟着抽搐起来……雪莉死后六周，我在笔记里写道：如果我重操人类学旧业，写一本名叫"灾难与猎人头者的愤怒"的著作……我开始在笔记里进一步反思死亡、愤怒与猎人头，并写下自己的祝愿，希望有一天能解决伊洛哥特人的猎人头行为，他们比基督徒更接近现实。（Rosaldo，1984. p. 184）

在"灾难与猎人头者的愤怒"中，罗萨尔多写下了他对妻子之死的反应，他无法理解伊洛哥特人的经验，除非他亲身经

历过，否则便不能对伊洛哥特人的愤怒进行情感性的理解。当他真正走进了伊洛哥特人的生活，他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伊洛哥特人会杀死他心爱的妻子。

情感教训

从罗萨尔多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几点教训。第一，如果观察者没有融入被观察者的经验世界，他或她便无法写出真正有意义的解释文本。第二，这类解释文本也不能让读者产生激动人心的阅读体验，因为其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情感内容。我们不可能指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本人没有感受到的情感。第三，只有当作者能在文本里将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描述出来时，他或她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情感性的理解。第四，如果读者不愿进入作者的文本及其所描述的经验世界，这同样说明作者没有形成情感性的理解。

结　论

在本章里，我讨论了解释的不同类型，此外，对于解释、描述与理解的关系，我也做了探讨，并且着重强调情感在理解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将对本书做一个总结。

第8章　结论:解释互动论

Condusion:On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本章将对解释性方法的基本特征做一次总结,并将解释互动论与后现代时期联系起来。具体地说,本章将讨论以下几个主题:①解释的步骤与阶段;②人生经历的基本结构;③解释的阅读与写作;④虚构与解释;⑤后现代时期的解释互动论。

本书所探讨的基本主题乃是如何运用解释互动论从事质性研究。之所以讨论这一主题，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阐明解释性研究的基本结构；二是为了揭示那些能够改变人生意义的重要生活经历。在本章里，我将对这两个目的做一下回顾与反思。如果解释性的社会学者想在整个人文学界亮出自己的立场，那么就必须进一步阐明解释互动论的基本构成元素。

解　释

解释性研究所要考察的是那些意义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此，我从詹姆士·乔伊斯那里借用了"心灵发现"一词，来描述各种对人生产生了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交往时刻。一般来说，个体在这些时刻都陷入了某种困境，而这些困境后来又演化成了公共领域关注的话题（Mills，1959）。有时，心灵发现对个人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马丁·路德·金坐在厨房的饭桌旁，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声音。解释互动论者所要寻找的正是这些曾经有过"心灵发现"的人。我在本书里曾列举过一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包括谋杀者、挨打妻子、寻求帮助的酗酒者和失去妻子的丈夫。

解释的步骤

解释过程分为7个步骤：

1）勾勒出关于"如何"的问题（"How" question）。

2）将个人困境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

3）解构所要研究的现象。

4）把握所要研究的现象。

5）化约现象。

6）建构现象。

7）现象的情境化。

这里，我只想简单评论一下第三步。

解构与文本研究

一旦确定了“如何”问题,研究者就应该将所有关于现象的前在观念悬置起来(Lindesmith、Strauss & Denzin,1999,p.186)。不然的话,研究者的视线就会受这些前在观念的束缚。为了不受前在观念的干扰,研究者必须广泛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其中的理论框架进行解构。

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是由各种文化理解及文本构成的,正是这些文本赋予问题重重的经验以一定的意义。例如,有关酗酒者的影片能够告诉观众,酗酒者是如何酗酒的。有的影片甚至可以向人们展示 A. A. 聚会的工作机制,或者介绍酗酒者在治疗中心的活动状况。这类影片常常是以酗酒者的日常生活及其家庭关系作为主要内容(Denzin,1991)。

由此可以引出,解释性研究的首要步骤便是围绕所要研究的问题收集相关的文本资料,然后认真阅读(解构)这些资料,他或她必须牢牢把握那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并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文本的基本结构。倘若文本中出现了女性人物的生活经验,研究者还必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文本。有时,文本中还会出现有关工作、金钱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描述,对此研究者不仅要识别出来,而且还要进行批判性的梳理。在对文本进行解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将那些关键的代码找出来,同时指出其意义,如此才可以批判性地解读文本,揭示其内在的价值观及基本假设。

人生经历

人生经历的丰富意义通常出现在人生发生转折的时刻,而人物性格也往往是在这些生存陷入困境的时刻表现出来。由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时刻的经历结构做一下探讨。

四种经历结构

就陷入困境或“心灵发现”时刻而言,可以从中区分出四

种经历结构类型:第一种是那些重大的对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影响的经历。这种经历的影响当即就会显现出来,而且之后仍会继续很长一段时间。第二种即所谓的"心灵发现",它既可能意味着一段经历的突然中断,也可能是为持续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事件重新做出反应。第三种经历比较琐碎微小,但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人际交往关系即将陷入困境的迹象来。第四种经历的影响十分直接,但当事人常常事后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我将这四种问题经历分别称为:重大的心灵发现、积累顿悟型的心灵发现、启示性的微小心灵发现和事后醒悟的心灵发现(当然所有心灵发现都可能是事后醒悟,而事件经过回顾之后还可能产生新的意义)。这些心灵发现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不同的人生或交往阶段,某一事件可能起初是重大的心灵发现,接着又变成了微小的心灵发现,然后又变成了事后醒悟的心灵发现,而积累型的心灵发现最终当然会演变成重大的心灵发现。下面我将针对每一种心灵发现给出相应的范例。

重大的心灵发现: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第2章里,我曾引用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段叙事,并将其视为深度描述的典范。任何阅读过《罪与罚》的读者都知道,谋杀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生当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在这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折,包括被捕、审判、入狱以及监狱中的宗教体验。

积累顿悟型的心灵发现:回想一下约翰逊和费拉罗所描述的挨打妻子,她与酗酒丈夫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直到有一天,丈夫用枪指着她的头,正是在这一天,她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并离开了她的丈夫。这位妇女的人生转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过去一系列经历积累起来的结果。

启示性的微小心灵发现:看看下面一段对话,四个人围坐在厨房的饭桌旁,桌子靠近窗户,从窗外望去,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个鸟笼。这四个人是杰克,55岁,未婚男子;杰克的女友雪莉;杰克的母亲玛依以及杰克的朋友保罗,47岁,刚离婚不久。杰克把他的新女友带回家,让母亲看看。保罗不久前见过玛

依。玛依为杰克不能成家立业,做个体面的已婚男士曾和杰克争吵过许多年。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玛依:(朝窗外望了望)我的天,鸟食吃光了,这些天鸟笼好像一直空着。

杰克:我会加食的,妈,没问题,鸟食不会少的,不是吗?

玛依:别走,去加点鸟食,至少加满到一半(她转向杰克前面的雪莉和保罗),他从未听过我的话,总是把鸟食洒在地上,简直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杰克朝后门走去,取了些鸟食,然后走到鸟笼前,把鸟食加进去,加到溢出为止,其他人坐在那看着杰克。)

玛依(朝窗外大喊):你这个白痴,我说了加满一半就够了,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转向雪莉和保罗)他从来不听我的话,总是这样,他为什么就不照我说的去做呢?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母子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它不是转折性的时刻,但却折射出母子二人过去的交往有过不和或裂痕,儿子不想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去生活。这一点也表现为他不听母亲的话,没有把鸟食加满到一半,而是加到溢出为止。这一经历片段便是所谓微小的心灵发现。

事后醒悟的心灵发现: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第 7 章里提到的一件事,即米切尔·罗萨尔多仍在思考妻子之死的意义。对他的一生来说,妻子之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并使他重新反思了自己与人类学的所有关系。

研究心灵发现

当研究者着手考察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时,他或她会观察到以上四种心灵发现。在解释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地收集、分析各种类型的心灵发现经历,否则他或她就无法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经历进行深度描述与解释,这一过程也可以称为从事“存在主义的民族志研究”(Existential ethnography)。

阅读与写作解释

此刻讨论一下解释(文本)的阅读与写作无疑是相当合适的。这种分析必须包括读者、作者、文本以及话语体系等方面。所有的话语体系都是再现世界的基本方式,复杂的话语体系常常被称为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话语实践,例如,美国的道德规范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文本是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包括人们可能读到、看到、听到的所有形式的印刷、影像、口头或视听资料(比如音乐)。文本通常会注明作者,它的作者既可能是交往中的普通个体,也可能是专业的学者或其他职业人员。读者是指那些阅读、倾听、观看或解释文本的人们,诸如普通人、专业人员或学者。作者是文本的创作者,可以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个机构或制度。作者可能是一个对别人讲述故事的普通人,也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作者,比如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或批评家。读者、作者以及文本均属于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语境(Barthes,1967)。这些要素都是在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

读　者

在前面几章里,我曾指出,解释性文本的作者需要"心甘情愿的读者"(Willing:Readers),也就是说,读者必须愿意走进文本所描绘的情感经验中。科尔里奇将此称为"心甘情愿地相信"——言外之意,读者必须信任作者,然而,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会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乃至对文本进行重构,这意味着在读者这里,文本既没有什么绝对的观点,也没有所谓的"零度"(Barthes,1953,1973)。该观点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在读者这里,文本的意义不是模糊的,读者在体会文本所描绘的经验时,必然会将自己的体验带进来。

第二,读者会对文本中的词句做出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第三,在与文本进行情感性及认知性的交往过程中,读者可能会被文本深深吸引,也可能会感到乏味,之后,他们或者对文本表示赞同,或者表现得无法理解文本。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完全接受文本。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中立的。

这里有一位口头文本作者,他在 A. A. 聚会上对别人讲了一段话:

> 你可能不会喜欢我将要讲的东西,你可能会恨我,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撒过谎,骗过人,还偷过东西。我对别人动过粗,有一次我打伤了别人的背,因为他不给我拿酒。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在这里只是说我想说的东西。(Denzin,1987b,p. 191)

作为自己的文本的作者,这位讲述者事先估计听众将不会对他的讲话内容抱以兴趣,他知道,所谓客观中立的听众压根就不存在。

接下来的一段陈述是另一位 A. A. 成员做出的,他听了上面一段讲话,他的反应证实上面那位讲述者估计得没错。

> 他究竟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是谁?难道他觉得自己举世无双吗?不管怎么说,他接受治疗的时间才多久?竟然说只为自己,而无须考虑那些听他说话的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像他这样的人我见多了。(Denzin,1987b,p. 191)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意识地挑选文本,言外之意,对某个读者来说,有些文本可能会比另一些文本更能吸引他。有的读者喜欢那类能让他们产生心灵共鸣的深度描述文本,而另一些读者则可能喜欢那种简单明晰、观点明确并且不包含情感内容的文本。

作者与文本

作者创作的文本乃是由语言、意识形态、性别、神话、历史、传统以及风格等等要素构成的。

语 言

语言当然是写作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文本所描写的经验均是由词语界定的,作者能写出什么,取决于语言的语法结构及语义结构。例如,我不能把"牛"称为"狗",并对你说,我是在写"牛",而不是在写"狗";我更不能说"牛"在写我,并告诉你我在写"牛"。语言规则限定了我们能写什么,同时也限定了读者能阅读到什么。

我所写的每个字以及所描述的每一件东西均内涵一定的意义,如果我写的是"经历"或"心灵发现",你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词语,并形成自己的意义。如果你查字典,又会得到许多不同的解释与意义。词语充满了意义,作者写什么在一定意义上已事先被他所使用的语言决定好了,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也是如此。

意识形态

巴尔特提醒我们,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事件的记录及其赋予日常生活的意义均是由社会的文化及知识体系建构起来的。这些文化及知识体系包括法律、医学、宗教、体育及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大众媒体等等。这些再现、记录以及文本形式通常借用"客观中立"之名记录、书写各种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常常会"对现实进行修改,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现实,而这个不容置疑的宿命又是历史演变的结果"(Barthes,1957,1972,p. 11)。通过将事件描述成客观现象,这些文本便可以把历史与自然混为一谈,"历史并没有告诉人们什么,它所发生的一切均是自然而然要发生的"(Barthes,1957,1972,p. 11)。这意味着,读者不能把这些文本当成是对社会状况的"文化"再现,而事实上,它们所表达的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东西,其所反映的正是文本生产者的"偏见"。

性 别

文本通常内涵某种父权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的解释偏见,

它们是从男性的视角来俯视社会,其中只有男性的声音。它们常常将男性与客观联系在一起,而将女性与主观联系在一起。这些均表明,它们暗含的是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父权主义(Cook & Fontow,1986,p.6)。和神话一样,这类文本也会再生产后现代时期的性别区分体系。

神 话

社会学家创作的再现文本有点类似于神话。这里所说的神话是以日常现象为描述对象,它讲述故事,为事实、现象或事件提供各种各样的解释,其所使用的语言不仅是广为人知的,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的解释看上去合情合理,容易被人接受。总之,神话表达的是关于现实的"真理"。

我在前面几章里给出过许多神话范例。在第 6 章,我从科林斯那里引用了一段关于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复杂约会体制的解释,在其中,科林斯向我们揭示了约会体制中的暴力因素。在他看来,有些妇女希望自己被强奸,只要她们觉得自己之后可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这正是一段神话般的有关特定事实的陈述。

神话常常会歪曲事实,复制其所属文化的种种偏见。从科林斯关于约会体制中的暴力现象的描述来看,读者也许会觉得,有些妇女会鼓励男人对她们实施性暴力,这等于是说,强奸的责任应该由妇女来承担。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神话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它们不是维护现状,就是挑战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右翼的神话支持现实社会状况,而左翼的神话则强烈呼吁进行社会变革(Barthes,1957,1972,pp.145-150)。

历史、传统与风格

除了语言、意识形态、性别和神话等方面的因素会影响文本写作之外,传统与风格同样也会对文本写作产生影响。传统是指已有的各种再现方式或模式,风格是指某一写作传统之内的各种变化形式,它通常与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著作有关。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领域流行过两种支配性的写作传统,第一

种是科学论文,第二种是人文散文。科学论文的基础来源于追求客观真理的社会科学神话,其中常见的术语包括"假设"、"验证假设"、"可靠性"、"有效性"、"归纳"、"误差"等等。在科学论文中,不会使用第一人称,之所以这样写作,正是为了使科学论文看上去是在陈述经验事实的"客观真理",每个科学论文作者都是在这一写作传统之内建构自己的写作风格的。

人文散文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这类写作致力于扩大主观性神话的叙述范围,并且强调人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它不会采用科学论文的严谨形式,因而总是避免使用"验证假设"、"可靠性"之类的术语。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使用这种写作模式的社会科学文本在写作风格上与文学写作较为接近,而阅读这类文本的读者也觉得自己是在阅读文学文本。

解释(文本)写作的风格

毫无疑问,解释性写作可以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文写作传统。在过去的十年里,解释性写作日益发展壮大,对此,里查德森曾用"创造性的分析实践"一词做过概括(Richardson,2000)。我也曾在第7章里讨论过解释性写作的不同方式,包括独自、对话、复调、事实描述和解释性的叙事,等等。接下来,我想从另外三种写作风格入手做进一步的探讨。这三种写作风格是主流的现实主义、解释性的现实主义和描述性的现实主义(Rabinow,1986)。

主流的现实主义:这一写作风格认为作者有能力对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现实生活做客观的描述,从而揭示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客观构成要素。比如,主流的现实主义研究者常常使用这些传统的概念,包括宗族、经济、宗教体系、规范与价值、异化、社会控制,等等。他们通过这些概念来把握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在主流的现实主义看来,诸如宗族、政治体系之类的结构事实上就存在于人们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中,因而可以把它们"客观"地解读出来。主流的现实主义常常导致独白性、分析性的解释文本(参见以上关于科林斯的讨论)。

解释性的现实主义:具有该写作风格的作者认为,他们能够理解别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正是以创作这类文本著称于世。但是,在这类文本中,观察者的解释代替了当事人的想法。解释性的现实主义者常常认为自己"在那生活过,所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殊不知,这里所谓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并不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而是观察者的亲身经历。

描述性的现实主义:看好这类写作风格的作者试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为此,作者常常会以多重的声音出现在自己的文本中。接下来是一段电影评论,作者在这段评论中探讨了约翰·休斯顿导演的影片《死者》。这部电影是根据乔伊斯早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作者认为,乔伊斯的叙事让休斯顿体会到了现实主义的潜在价值。他引用了威兰德·舒尔克尔(《死者》的制片人之一)的话,舒尔克尔指出:

> 或许休斯顿从乔伊斯那里学会了这一点,即故事不应该去解释生活,而应将生活本身的秩序与解释描述出来。乔伊斯和休斯顿均向人们展示了故事主人公的生活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主人公的思想、意识、言语以及行动中。它们重叠在一起,有时相互补充,有时相互冲突。这是一种行动的现实主义,两位作者在自己的文本中并没有直接做出交代,但不难发现,行动的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写作的共同风格:叙事随着故事主人公的观点变化而逐渐推进,所有的场景描述均体现了这一点。(Kakutani,1987,pp. 1,50)

描述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对话式、复调式的写作。它让主人公以自己的言语来讲述故事,在讲述的同时,它也会解释,但却不是作者的解释,而是故事主人公的解释,它揭示生活经历的冲突性质,并指出,没有哪个单一的故事或解释能够完完全全地把握故事中出现的生活问题。描述性的现实主义主张一种合情合理、行之有效的理解,同时认为经验描写应该由当事人来完成。总之,作者叙述的都是当事人的生活经验。

这里有一个范例,它选自温森特·克拉帕扎诺 1980 年出

版的专著《图哈米:一位摩洛哥人的肖像》。图哈米是一位瓦匠,他对克拉帕扎诺讲了一些他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幻想,根本就没有"真正"发生过,但图哈米觉得它们都是真实的,下面就是图哈米的讲述:

> 这就是我昨天告诉你的事情……我做梦,梦见了一些真实的事情。我梦见自己在打架,除了安拉之外,我谁也没讲……今天我发现自己的四肢受伤了……当你把香点燃,它紧紧扼住别人的脖子……我马上就要自由了,因为我在屋子里看见了米香兰。我醒来的那一刻,看见了她。(Crapanzno,1980,p. 172)

图哈米相信自己梦见的都是真事,他生活在幻想之中,他有能力在个人生活史(Personal history)中的"真实"和自传(Autobiography)中的"真实"之间做出区分(Crapanzno,1980,p. 5)。

个人生活史的真实是指文本或叙事与外在的可观察到的经验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自传的真实"位于文本之内,除了我即叙事者之外,它再也没有任何外在的联系"(Crapanzno,1980,p. 5)。描述性的现实主义致力于获取各式各样的传记叙事(个人经历故事和自我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构的,但事实也好,虚构也好,对讲述者来说,这些故事都是他的生活经验,言外之意,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意义与结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接着会讨论虚构与解释。

虚构与解释

虚构是某种在经验的基础上编织起来的东西,它常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叙事。虚构与真实的东西并非截然对立(Geertz,1986,p. 6),它也是了来源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思、所想和所行的事情。所有的解释都带有一定的虚构性,它们叙述的是研究者或研究对象对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对这些事情的主观理解。虚构是真实的,但只是在故事中如此。如果某件事

是可以想象的,它就是真实的(Denzin,1984a,p. 211;Satre,1948,pp. 165-166)。图哈米的虚构,他的幻想与梦想,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些事都是真事,而描述性的现实主义者或存在主义的民族志学者所要寻找的正是这种真事。

声称所有的解释都带有一定的虚构性,这一主张对于解释文本的作者来说具有以下五点启示意义。第一,解释性文本的作者必须从旧有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这个观念就是他们从不写虚构的东西。第二,解释性文本的作者必须从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解释性的现实主义这两大写作传统中解放出来。第三,解释性文本的作者必须学会倾听当事人所讲述的全部故事,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第四,解释性文本的作者必须学会如何按照故事的本来面目倾听故事,进而体会其中所描绘的困境经历。第五,解释性文本的作者必须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表达解释,包括通过电影、小说、戏剧、歌曲、音乐、诗歌、舞蹈、绘画、摄影、雕刻、陶器、工具制造乃至建筑,等等。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用来描述、解释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尝试这些方式,研究者可以扩大视野,这意味着,解释互动论者必须将自己的研究与后现代时期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后现代时期的解释互动论

"所有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很关心其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Mills,1959,p. 165;Lemert,1997b,p. 161),也就是说,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以及人性是如何塑造而成的,以求向人们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里各式各样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的命运状况(Mills,1959,p. 165)。

人类历史至少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古代、中世纪、现代以及当前的第四个时代或后现代时期(Mills,1959,p. 166)。经历过 20 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展望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正处于晚期后现代的中间阶段(它开始于二战结束)。这段时间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国合作、卫星通讯系统、独立的世界经

济体系、种族主义与种族不公、单亲家庭、全托儿童、在职母亲、美国的"忧郁"、核毁灭威胁、环境污染、日益受制于生物医学技术、吸毒酗酒问题，中东、中北美以及南非地区的武装冲突。

后现代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人类的日常生活日益受制于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所积累起来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大众媒体告诉人们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商品成了社会目标，人类经验以及社会关系也被商品化了，无论是谁，只要他打开星期日的报纸，浏览其中的旅游版及其假日观光副刊，他立刻便会明白这一点。

这也是个怀旧的时代。追求个人利益与成功，伴以物质财富的炫耀，构成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人们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有关资料证明，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成人在寻求心理治疗或其他专业帮助。许多人在个人、家庭、性生活、休闲以及工作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而且变得日益严重起来(Lemert,1997b,p. 159)。

身处晚期后现代的解释互动论者有义务去探究这一历史时刻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塑造每一位个体的日常交往生活的，每个人以及每一种交往均可以视为"普遍中的特殊"，或者说，它们不过是后现代时期总体特征的特殊表现而已。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大众媒体、异化、经济、新家庭和托儿体制、日益增长的技术化以及核毁灭威胁，等等。解释互动论力求将个人与社会、传记与社会统统联系起来，从而向人们揭示，个人困境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议题的。在此过程中，它努力将通常是隐蔽的个人困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个体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其生活意义正是由这些经历赋予的。

无论如何，让别人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乃是解释者的主要目标(Merleau-Ponty,1968)。这意味着，我们想去搜寻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成功，理解他们曾经有过的创伤、恐惧、焦虑、梦想与希望。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平凡却意义丰富的故事。无疑，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解释计划，而我们所要承受的挑战也很清楚，这就是描

述那些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历程的,并将这些历程“表演”出来(参见 willis & Trondman,2000,p.6)。

本·阿格尔说,我们需要一种“不辱其宗旨”的社会学,这是一种探索“社会问题”的公共社会学,而且这种社会学在写作上也要相当出色。1972 年,劳蕾尔·里查德森险些被一场车祸夺去生命。两年后,她重新回到了写字台前,她说:“写作是一种我用来建构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她意识到:她是在“为自己的生命从事写作”。我想,关于什么是出色的写作,没有比她说得更好的了。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为别人的生命,才从事写作的。

让我们回到我在第 2 章结束时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来源于 C. 怀特·米尔斯和威廉·福克纳。社会学家必须谈论在 21 世纪最初的这几年,恐怖与辉煌的人类经验世界。因此,在这里,在第七时刻结束之际,在 21 世纪开始之时,我们将克服所有压力,向世人展示,批判性、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是如何致力于世界的改造,并使之朝积极的方向前进的,这就是本书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术语表

Glossary

说明(account):对一组行动或经验所作的解释。

分析性的解释(analytic interpretation):将某种抽象并且常常是随意的解释框架强加在某组经验或行动上,这些框架往往来源于某种科学理论。

传记经历(biographical experience):指那种塑造个人生活的经历,它可以表明现实是如何呈现在个人意识中的(Bruner,1986,p.6)。此外,它也是解释互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主题(还可以参考问题性的经历)。

传记(biography):有关个人生活史的书面描述,亦指创作此类叙述作品的艺术。

化约(bracketing):将正在考察的(人生)经历中所包含的主要特征提炼出来。

把握(capture):获取与所研究的现象相关的各种案例。

叙述(cause):有关某组行动或经验的描述,它既可以是日常陈述,也可以是科学化的陈述。

建构(construction):解释步骤之一,位于化约之后,它包括将现象的基本构成要素按暂时确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从而为下一步的情境化处理做好准备。

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将化约之后的现象重新置于活生生的经验世界。

传统(convention):既定的再现模式,它既可以是人文主义的,

也可以是科学主义的。某一传统之内还可以分为多种写作风格。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探究领域之一,其主题常常是分析某一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产品的意义,而解释性研究所考察的则是文化生产体制所塑造的问题生活经历。

解构(deconstruction):对已有的各种研究与解释文献进行批判性的梳理。这些研究与解释均与正在研究的现象相关。

描述(description):指一种描述艺术,是对事物所作的文字说明,它有两种类型:深度与浅度。

描述性的现实主义(descriptive realism):让正被研究的世界自己解释自己,从而生成对话或复调式的文本。

对话式的解释(dialogic interpretation):该解释模式表现为观察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多声或复调式的,从而区别于独白式的解释,后者往往会压制研究对象的声音。

概括(engulfing):建构一种能将所有与现象相关的知识均包括在内的解释,它常常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心灵发现(epiphany):个人遭遇问题并显露性格特征的时刻,这一时刻常常表明个人生活的转折点,它包括四种类型:重大的心灵发现、启示性的微小的心灵发现、积累顿悟型的心灵发现、事后醒悟型的心灵发现。

民族志(ethnography):一种生活经历研究,包括描述与解释。

存在主义的民族志(existential ethnography):民族志类型之一,其任务是搜集、研究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并且常常是人生发生转折时发生的问题型经历。

表达(expression):揭示个体及其交往经历的形成过程。经历表达常常是象征性的,包括戏剧、表演、仪式和讲述故事(Bruner,1986,pp. 6-7)。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将性别不对称置于社会世界(包括学术世界)的中心,没有性别中立的知识,类似的主张还包括民族、种族,后者同样也是影响探究与经验的基本因素。

虚构(fiction):依据经验编写而成的故事,就其叙述的故事而

言,虚构常常是真实的,所有的解释都带有一定的虚构性。

笼统的解释(gloss):肤浅并且常常是片面的有关某一现象的解释,它分为两种类型:日常的和科学的。

解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所有解释都会陷入解释循环之中,既不可能超越解释,也不可能从事所谓"纯粹"的客观研究。

意识形态(ideology):有关事物如所是和应所是的一种说明,最典型的莫过于政治教条。

个体研究(idiographic research):这类研究认为个体乃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个体,并由此视角出发,来考察个体的经历。这类研究也被称为主位研究,以区别于非主位研究,后者是为了归纳所有对象的。

见多识广的读者(informed reader):这类读者能听懂故事中的语言,了解故事讲述者的人生经历,能够接受讲述者的立场观点。对于故事中的经历,他或她曾经有过体验,而对于自己有关故事所做的一切解释,他或她愿意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丰富的解释理论,并能够用它们巧妙地解释正待研究的故事。

互动(interaction):象征性地接受另一方的视角,并按这一视角采取行动,互动总是自然发生的。

互动片断(interactional slice):某一被记录下来的交往序列。

互动文本(interactional text):这类文本可以在个体身处某种社会情境的任何时刻出现。

解释(动词)(interpret):阐明意义,将某一现象解读或转译成可理解或熟悉的东西,从而形成理解。

解释(名词)(interpretation):是指一种为理解奠定基础的解释行为。它可以是情感的、认知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审美的。解释按类型可以分为:浅度的、深度的、当事人的、观察者的、分析性的、独白性的、对话式的、复调式的、情景描述型的、关系交往型的。所有解释都应是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情境化的、对话或复调式的。

解释者(interpreter):向他人阐明或转译意义的人,分为三种类

型:当事人、科学家型的揭示者和见多识广的人。

解释性的传记方法(interpretive biographical method):一种使用个人经历故事、自我故事和个人生活史的解释方法。

解释性的评价(interpretive evaluation):一种解释性的项目评价或政策制订研究,它能让调研者成为某项(社会)计划的倡导者或参与者,并为该项计划所服务的人群对象效劳。

解释互动论(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发表观点,以揭示并传达各种问题符号互动的意义,倾向于使用一种不受任何前在概念影响的话语模式,其所赖以形成的基础乃是从生活经历(叙事)中提取的第一手概念。

解释过程(interpretive process):包括六个步骤或阶段:提出研究问题、解构现象、把握现象、化约现象、建构现象和现象的情境化。

解释性现实主义(interpretive realism):是一种写作模式。作者认为自己能够解释他人的现实。该写作模式与主流现实主义关系甚密,而后者常常与独白性的文本相关。

解释性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作为一种解释计划,该研究常常是以意义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为它的探索主题。

解释性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有关某种经验的理论、解释和描述,它既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科学化的。

议题(issue):是指那些转化成公共问题的个人困境。

现身说法(lay theory):经验的解释性说明,而揭示者正是那个对此经验有过亲身体会的人。

生活(life):某个人的人生经历,它包含两个层面:表层和深层。

活生生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真实的经验世界。

主流现实主义(mainstream realism):一种写作风格,它试图“客观”报道某一群体的现实生活。

意义(meaning):个人对于经验内涵的理解,可以通过意图和结果予以界定。意义通常包含三个方面,涉及个人的交往关系、目标以及为此目标采取的行动,所有意义往往是交往性的,没有固定的结果,因而也是模糊、难以界定和充满矛盾的。

神话(myth):常常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故事文本,声称是在表达现实的"真理",它或是代表左派的立场,或是代表右派的立场,其作者既可以是普通大众,也可以是专业的社会观察家。

叙事(narrative):有情节,有开端、中间和结局的故事。

叙事者(narrator):讲述故事的人。

自然主义(naturalism):在自然的日常社会生活世界中展开探索,也可以指用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

参与式的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ation):研究者参与他或她正在研究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在其中一边参与一边观察。为此,研究者需要在他或她所研究的世界中学会如何倾听、观察和交谈。

个人经历叙事(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这类叙事能够将讲述者的自我与已经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人生经历联系起来。

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以访谈、对话、自我故事和个人经历故事为基础,对某个人的生活经历进行重构。

后现代(postmodern):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二战以来的生活,另一层意思是指那些试图描述后现代时期生活经验的(理论)话语模式。

问题经历(problematic experience):个人生活中的心灵发现或危机时刻。

问题交往(problematic interaction):指那些最初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的交往经历。

过程—回溯法(progressive-regressive method):也称为批判性的解释方法,指将某一阶层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时刻的研究方法,它首先追踪一系列经历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接着又向后回溯,分析促使对象采取行动的历史、文化及个人生活条件。

纯粹的解释(pure interpretation):仅仅是为了建构意义丰富的解释,以求理解社会、文化及人生问题。

读者(reader):泛指阅读、倾听、观看或解释文本的人。

现实主义(realism):指文本与现实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它分为三种风格:主流现实主义、解释性的现实主义和描述性的现实主义。

现实(reality):活生生的经验世界。

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该问题界定了解释性研究所要探索的主题,通常表现为"如何(how)"型问题,而不是"为什么(why)"型问题。

自我故事(self-story):指那种能够将个人经历的基本结构勾勒出来,并对其进行解释的叙事,讲述者的自我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

符号分析(semiotic analysis):指对叙事及交往文本中的词语、符号进行解读的方法,该方法能使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文本当中那些起组织作用的代码、隐喻和转喻上,并认为文本是由诸多两元对立的结构(比如男性对女性)编织而成的。所有文本都暗含多元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意义和信息,而符号分析能将它们揭示出来。

社会类型(social type):个体通过他或她的行动反映某一社会情境中的典型行为方式。

风格(style):某一写作或语言传统之内的变量。

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人类的交往经验是由语言及符号这一中介表达出来的。

时序图(temporal mapping):将个体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包括安排时间顺序,确定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的情境,其重点乃是弄清楚谁和谁,何时,在哪,做了什么。

文本(text):泛指各种可以用来阅读、评论或观看的印刷、图像、口头或声音材料,读者在阅读它们的过程中也会创造文本。文本的意义常常是不确定的。读者、作者以及文本均是由语言、意识形态、性别、神话、历史、传统以及风格等力量塑造而成的。

理论(theory):指那些能够赋予某组经验以意义的解释框架,它可以是被观察对象的现身说法,也可以是专业的,常常来源于某一群体的文化理解能力。

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指那种能够深刻把握某一问题情境中所发生的经验及其意义的叙述,它以丰富、严谨并且细腻的笔触揭示意义、历史、传记、各种人际关系和情境交往过程以及意图。与之相对应的是那种只报道事实的浅度描述。深度描述按类型分为:微观的、宏观的历史型的、传记式的、情境性的、关系性的、交往性的、插入式的、未完成的、笼统的、纯描述的、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

浅度描述(thin description):缺乏细节的描述,只是报导一下行动,至于行动所赖以形成的环境及其意图则不涉及,因而十分含糊。它分为日常概括、社会科学领域的概括性描述以及抽样描述等类型。

困境(troubles):个体在其生活世界内直接遭遇的问题,个人困境常常会转化成公共议题,并引发各种旨在解决它们的制度性反应,包括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强奸、酗酒、吸毒以及艾滋病,等等。

理解(understanding):把握、领会现象经过解释之后的意义,它既可以是情感型的、认知型的,也可以二者都是。理解是一种涉及经验分享的情感交融过程。这一过程可能造成真正的理解,也可能导致虚伪的欺骗。解释的目标是为了针对正在考察的现象,建立起真正相互分享的理解。

普遍的个体(universal singular):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个人乃是某一普遍性的特殊例证,个人的历史特征正是由这一普遍性所决定的。

作者(writer):又称作家,生产阅读及视听文本的个人、机构或制度,作者既可以是普通大众,也可以是各类专业人员,包括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小说家。

参考文献

Abu -Lughod, Lila. (1997).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after television. *Reflections*, 59, 109-134.

Abu-Lughod, Lila. (2001). Locating ethnography. *Ethnography*, 1, 261-267.

Adler, Patricia A., & Adler, Peter.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Agger, Ben. (2000). *Pubic sociology: From social facts to literary act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Alcohol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 (1976). *Alcoholics Anonymous* (3rd ed.). New York: Author.

Alcohol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 (1989). *Twelve steps and twelve traditions.* New York: Autho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Allport, Gordon W. (1942).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grosino, Michael V., & Mays de Pérez, Kimberly A. (2000). Rethinking observation: From method to context.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673-702). Thousand Oaks, CA: Sage.

Appadurai, Arjun. (1991).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ichard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pp. 191-210),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thens, Lonnie H. (1984a). Blumer's method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In Norma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5, pp. 241-257). Greenwich, CT: JAI.

Athens, Lonnie H. (1984b). Scientific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qualitative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5, pp. 259-268). Greenwich, CT: JAI.

Bakhtin, Mikhail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 C. Emerson,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rthes, Roland. (1967).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 Wang.

Barthes, Roland. (1972). *Mythologies* (A. Lavers,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Barthes, Roland. (1973). *Writing degree zero.* New York: Hill & Wa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Becker, Howard S. (1967a). Introduction. In Howard S. Becker(Ed.), *Social problems: A modern approach* (pp. 1-31). New York: John Wiley.

Becker, Howard S. (1967b). Whose side are we on? *Social Problems*, 14, 239-247.

Becker, Howard S. (1973). *Outsi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Becker, Howard S. (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Selected paper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oward S. (2001). Response to the manifesto. *Ethnography*, 1, 257-260.

Becker, Howard S., &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86). Radical politics and sociological observation: Observations on methodology and ideology. In Howard S. Becker, *Doing things together: Selected papers* (pp. 83-102).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eyla.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Bertaux-Wiame, Isabelle. (1981).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l nigration. In Daniel Bertaux(Ed.), *Biography and society: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pp. 249-266). Beverly Hills. CA: Sage.

Beverley, John. (2000). Testimonio, subalternity, and narrative authority.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55-5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Birringer, Johannes H. (1991). *Theatre, theory,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ttomore. Tom. (1984).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Tavistock.

Brady, Ivan. (2000). Anthropological poetic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949-979). Thousand Oaks, CA: Sage.

Branaman, Ann. (1997). Goffman's social theory. In Charles Lemert & Ann Branaman (Eds.), *The Goffman reader* (pp. xvi-lxxxii). Malden, MA: Blackwell.

Bruner, Edward M. (1986). Experience and its expressions. In Victor W. Turner & Edward

M. Bruner(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3-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Bruner, Edward M. (1989). Tourism, creativity, and authenticity. In Norma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 A research annual* (Vol. 10, pp. 109-114). Greenwich, CT: JAI.

Bruner, Edward M. (1996) Abraham Lincoln as authentic re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 397-415.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udith. (1997). *Excitable speech :A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udith. (1999). Revisiting boodies and pleasur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6, 11-20.

Carey, James W. (1995).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heodore L. Glasser & Charles T. Salmon(Ed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pp. 380-402). New York: Guilford.

Carspecken, Phil Frances.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Routledge.

Chandler, Raymond. (1995) Twelve notes on the mystery story. In Raymond Chandler, *Later novels and other writings* (pp. 1004-1011). New York: Penguin.

Charity ,Arthur. (1995). *Doing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Charmaz, Kathy. (2000). Grounded theory: Obj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method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09-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o, Joo-Hyun. (1987). *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violence: The case of Ko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o. Joo-Hyun. (1988). *Battered wives: Violence and ressentiment in the Korean famil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Christians, Glifford G. (2000). Ethics and polit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33-155).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ristians, Clifford G. , Ferre, John P. , & Fackler, P. Mark. (1993). *Good news: Social ethics and the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pp. 1-26). Berkeley: Uni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1998).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2nd ed.). New York: Peter Lang.

Coffey, Amanda. (1999). *The ethnographic self.* London: Sage.

Cohen-Cruz. Jan. (1998).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Jan Cohen-Cruz(Ed.), *Radical street performance: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pp. 1-6). New York: Routledge.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1973). Biographia Literaria. In William Heath (Ed.), *Major British poet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7)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Collins, Randall.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nquergood, Dwight. (1985).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 1-13.

Conquergood, Dwight. (1998). Beyond the text: Toward a performative cultural politics. In Sheron J. Dailey(Ed.), *The futur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Visions and revisions* (pp. 25-36). Annandale, V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ok, Judith A., & Fonow, Mary Margaret. (1986). Knowledge and women's interest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56, 2-27.

Couch, Carl J. (1984). *Constructing civilizations.* Greenwich, CT: JAI.

Couch, Carl J. (1988). Towards the isolation of elements of social stuctures. In Norman K. Denzin(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Vol. 10). Greenwich. CT: JAI.

Cowley, Malcolm. (1967).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Faulkner, *The portable Faulkner reader* (Rev. ed., Malcolm Cowley, Ed.). New York: Viking.

Crapanzano, Vincent.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apanzano, Vincent. (1986). Here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51-7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eswell, John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uller, Jonathan. (1981).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sh, Leon. (1997). *Rosa Lee: A mother and her family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Davis, Angela Y. (1998). *Blues legacies and black feminism: Gertrude Ma Rainey, Bessie*

Smith, and Billie Holiday. New York: Pantheon.

Dawson, Patrick. (1996). Not another fish story from occupied Montana. In Rick Newby & Susan Hunger(Eds.), *Writing Montana: Literature under the big sky* (pp. 10-23). Helena: Montana Center for the Book.

Degh, Linda. (1995).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orman K. (1970). *The research act in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Denzin, Norma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orman K. (1983).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In Gareth Morgan(Ed.),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129-146). Beverly Hill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84a).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Denzin, Norman K. (1984b).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domestic, family viol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483-513.

Denzin, Norman K. (1987a). *The alcoholic self.*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87b). *The recovering alcoholic.*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87c). *Treating alcohol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89a).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89b).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Denzin, Norman K. (1991). *Hollywood shot by shot: Film and the American alcoholic.*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Denzin, Norma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Denzin, Norma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98). Narratives of the self, co-dependency and the inner child: Emotionality, meaning and gender in a cyberspace community. In Gillian Bendelow & Simon J. Williams(Eds.), *Emotions in social life: Critical them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pp. 97-119). London: Routledge.

Denzin, Norman K. (1999a). Cybertalk and the method of instances. In Steve G.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130-142).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1999b). Performing Montana. In Barry Glassner & Rosanna Hertz (Eds.), *Qualitative sociology as everyday life* (pp. 147-15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2000a).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897-

922).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2000b). Rock Creek history. *Symbolic Interaction*, 23, 71-81.

Denzin, Norman K. (2001). *Reading race: Hollywood and the cinema of racial violence.* London: Sage.

Denzin, Norman K., Fields, A. Belden, Feinberg, Walter, & Roberts, Nicole. (1997).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recent racial politics. *Taboo: Journ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2, 191-208.

Denzin, Norman K., & Lincoln, Yvonna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 Lincoln, Yvonna S. (Eds.). (2000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 Lincoln, Yvonna S. (2000b).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 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 pp. 1-2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orman K., & Lincoln, Yvonna S. (2000c). Preface.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ix-xx).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acques. (1981) *Positions*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llard, Annie. (1982). *Living by fi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Dihhey, Wilhelm L. (1976).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Doig, Ivan. (1978). *This house of sk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Dolby-Stahl, Sandra K. (1985, January-April). A literary folkloristic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personal narrativ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2, 45-70.

Dostoyevsky, Fyodor. (1950). *Crime and punishment.* New York: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6)

Douglas, Jack D. (1985). *Creative interview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Douglas, Jack D., & Johnson, John M. (Eds.). (1977). *Existenti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ning, David B, (1987). Deconstruction's scruples: The politics of enlightened critique, *Diacritics*, 17, 66-81.

Du Bols, W. E. B. (1920).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New York: Schocken.

Faulkner, William. (1957). *The town.* New York: Vintage.

Faulkner, William. (1959). *The mansion.* New York: Vintage.

Faulkner, William. (1964). *The hamlet.* New York: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Faulkner, William. (1967).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William Faulkner, *The portable Faulkner reader* (Rev. ed.; Malcolm Cowley, Ed.; pp. 723-

724). New York: Viking.

Fiedler, Leslie. (1988). The Montana face. In William Kittredge & Annick Smith(Eds.), *The last best place: A Montana anthology* (pp. 744-75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ielding, Nigel G. , & Fielding, Jane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Fine, Michelle, Powell, Linda C. , Weis, Lois, & Wong, Loonmun. (1997). Preface. In Michelle Fine, Linda C. Powell, Lois Weis, & Loonmun Wong(Eds.), *Off white: Readings on race, power and society* (pp. vii-xii). New York: Routledge.

Fish, Stanley.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ske, John. (1994). Audiencing: Cultur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9-198). Thousand Oaks, CA: Sage.

Flick, Uwe.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Alan M.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Foucauh,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 L. Marshall, J. Mepham, & K. Soper,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h, Michel. (2000).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 3; James D. Faubion, Ed. ; Robert Hurley et al. , Trans.). New York: New Press.

Freud, Sigmund. (1965).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New York: Av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Frow, John, & Morris, Meaghan. (2000). Cultural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315-346). Thousand Oaks, CA: Sage.

Gadamer, Hans-Georg. (1975).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 Ward.

Gamson, Joshua. (2000). Sexualities, queer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347-3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arfinkel, Harold, Lynch, Michael, & Livingston, Eric. (1981).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1, 131-158.

Gayle, Addison, Jr. (1997). The black aesthetic.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 Nellie Y. McKay(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1870-1877).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Geertz, Clifford. (1973a).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In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pp. 412-453).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lifford. (1973b).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pp. 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lifford.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sser, Theodore L. (Ed.). (1999).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offman, Erving. (1961a).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offman, Erring. (1961 b).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Goffman, Erving.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Anchor.

Goffman, Erving.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Goffman, Erving.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offman, Erring. (1983).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17.

Graber, Doris, McQuail, Denis, & Norris, Pippa. (Eds.). (1998). *The politics of news: The news of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Graetz, Rick. (1997, July-August). Sojourn to the sky: The Beartooth Highway. *Montana Magazine*, pp. 18-26.

Gubrium, Jaber F. , & Holstein, James A. (2000). Analyzing interpretive practice.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487-508).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pta, Akhil, & Ferguson, James.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Akhil Gupta & James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 1-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lley, Jean. (2000). This I know: An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childhood and knowing now. *Qualitative Inquiry*, 6, 349-358.

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rington, Walt. (1992). *Crossings: A white man's journey into black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Harrington, Walt. (1997a). Prologue: The job of remembering for the tribe. In Walt Harrington (Ed.),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pp. vii-xvi).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rington, Walt. (1997b). A writer's essay: Seeking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In Walt Harrington (Ed.), *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pp. xvii-xlvi).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idegger, Martin. (1962).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Heidegger, Martin. (1982).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nry, Jules. (1965). *Culture against man.* New York: Vintage.

Hill, Randall T. G. (1997). 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pioneer Colorado.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7, 236-255.

Hollway, Wendy, & Jefferson, Tony. (200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differently.* London: Sage.

Holstein, Jsmes A., & Gubrium, Jaber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stein, James A., & Gubrium, Jaber F. (2000). *The self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ghes, Langston. (1962). *The ways of white folks.* New York: Vintage.

Husserl, Edmund. (1962).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New York: Colli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Jackson, Michael, (1998). *Minima ethnographic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mes, William. (195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0)

James, William. (1955). *Pragnatism and four essays from the meaning of truth.*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Jenkins, J, E. (1999, May 2). Narrating the action while taking part in it. *New York Times*, Arts and Leisure sec., pp. 9, 19.

Johnson, John M. (1977). Ethnomethodology and existential sociology. In Jack D. Douglas & John M. Johnson (Eds.), *Existential sociology* (pp. 153-17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John M., & Ferrao, Kathleen J. (1984). The victimized serf: The case of battered

women. In Joseph A. Kotarba & Andrea Fontana(Eds.), *The existential self in society* (pp. 119-1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nes, S. H. (1999). Torch. *Qualitative Inquiry*, 5,235-5,250.

Joyce, James. (1976a). Counterparts. In James Joyce, *The Dubliners, in James Joyce,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Harry Levin, Ed.; pp. 97-110). New York: Vik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4)

Joyce, James. (1976b).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n James Joyce,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Harry Levin, Ed.; pp. 245-526). New York: Vik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6)

Kafka, Franz. (1952). The metamorphosis. In Franz Kafka,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Random House.

Kakutani, Michiko. (1987, December 13). John Huston's last legacy. *New York Times*, pp. 1, 50.

Karenga, Maulana. (1997). Black art: Mute matter given force and function.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 Nellie Y. McKay(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pp. 1973-1977).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Kemmis, Stephen, & McTaggart, Robin. (2000).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567-6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ncheloe, Joe L., & McLaren, Peter. (2000).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2nd ed. , pp. 279-3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ttredge, William. (1987). *Owning it all.*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ittredge, William. (1994). *Hole in the sky: A memoir.*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ittredge, William. (1996). *Who owns the West?* San Francisco: Murray House.

Kotarba, Joseph A. (1998). Black men, black voices: The role of the producer in synthetic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Qualitative Inquiry*, 4,389-404.

Kotarba, Joseph A. , & Fontana, Andrea. (Eds.). (1984). *The existential self i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amer, Mark. (1995). Breakable rules for literary journalists. In Norman Sims & Mark Kramer (Eds.), *Literary journalism: A new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merican nonfiction* (pp. 21-34). New York: Ballantine.

Krieger, Susan. (1996). *the family silver: Essay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dson-Billings, Gloria. (2000). Racialized discourses and ethnic epistemologie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257-277). Thousand Oaks, CA: Sage.

Iangellier, Kristin M. (1999). Personal narrative, performance, performativity: 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for sure. *Text and Perfonmance Quarterly*, 19,125-144.

Lather, Patti.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ther, Patti, & Smithies, Chris. (1997). *Troubling the angels: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Boulder, CO: Westview.

Lees, Gene. (1996). The poet: Bill Evans. In Robert Gottlieb(Ed.), *Reading jazz: A gathering of autobiography, reportage, and criticism from* 1919 *to now* (pp. 419-444). New York: Pantheon.

Lemert, Charles. (1997a). Goffman. In Charles Lemert & Ann Branaman(Eds.), *The Goffman reader*(pp. ix-xliii). Malden, MA: Blackwell.

Lemert, Charles. (1997b). *Postmodernism is not what you think.* Cambridge: Blackwell.

Levin, Harry. (1976). Editor's preface. In James Joyce, *The portable James Joyee* (Harry Levin, Ed.; pp. 17-18) New York: Viking.

Lieberson, Stanley. (1985).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merick, Patricia Nelson. (1997). The shadows of heaven itself. In William E. Reibsame (Ed.), *Atlas ofthe new West*(pp. 151-178). New York: W. W. Norton.

Lincoln, Yvonna S. (1997). Serf, subject, audience, text: Living at the edge, writing in the margins. In William G. Tierney & Yvonna S. Lincoln(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pp. 37-5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ncoln, Yvonna S., & Denzin, Norman K. (2000) The seventh moment: Out of the past.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047-10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coln, Yvonna S., & Guba, Egon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incoln, Yvonna S., & Guba, Egon G. (2000).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163-1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desmith, Alfred R. (1947). *Opiate addiction.* Bloomington, IN: Principia.

Lindesmith, Alfred R. (1952). Comment on W. S. Robinson's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analytic in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492-493.

Lindesmith, Alfred R., Strauss, Anselm L., & Denzin, Norman K. (1999). *Social psychology*(8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 &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dison, D. Soyini. (1999). Performing theory/embodied writing.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9,107-124.

Maines, David 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7-38.

Majchrzak, Ann. (1984). *Methods for policy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rcus, George E. (1998).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cCall, Michal M. (2001). Three stories of loss and return. *Cultural Studies < =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1(1), 50-61.

Mead, George Herbert.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arles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4).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73). *The prose of the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ienczakowski, Jim. (1995).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ography into theater with emancipatory potential. *Qualitative Inquiry*, 1,360-1,375.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 (1963).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New York: Ballantine.

Olesen, Virginia L. (2000). Feminis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t and into the millennium.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215-255). Thousand Oaks, CA: Sage.

Ortner, Sherry B. (1997a). Introduction. In Sherry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Special issue]. *Representations*, 59, 1-13.

Ortner, Sherry B. (1997b). Thick resistance: Death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gency in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In Sherry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Special issue]. *Representations*, 59, 135-162.

Paget, Marianne A. (1993). *A complex sorrow* (Marjorie L. DeVault,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34).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 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63).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 7-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inbanayagam, R. S. (1985). *Signifying act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helan, Peggy. (1998). Introduction: The ends of performance. In Peggy Phelan & Jill Lane (Eds.), *The ends of performance* (pp. 1-22).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helan, Peggy, & Lane, Jill. (Eds.). (1998). *The ends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ike, Kenneth. (1954).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Vol. 1). Glendale, CA: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ollock, Della. (1998). Performing writing. In Peggy Phelan & Jill Lane(Eds.), *The ends of performance* (pp. 73-193).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sathas, George. (1995).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234-2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ines, Howell. (1986, November 30). [Review of the book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by David J. Garro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33-34.

Reason, Peter. (1993). Sacred experience and sacred sc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 10-27.

Reason, Peter. (Ed.). (1994). *Participation in human inquiry.* London: Sage.

Red Lodge Chamber of Commerce. (1982). *Festival of Nations, Red Lodge, Montana* [brochure]. Red Lodge, MT: Author.

Richardson, Laure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aurel. (1999). Paradigms lost. *Symbolic Interaction*, 22, 79-91.

Richardson, Laurel.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 pp. 923-948).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oeur, Paul. (1979).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Paul Rabinow & William M. Sullivan(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pp. 73-10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coeur, Paul. (1985). *Time and narrative*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fel, Lisa B. (1994). Yearnings: Televisual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21, 700-722.

Ronai, Carol Rambo. (1998). Sketching with Derrida: An ethnography of a researcher/erotic dancer. *Qualitative Inquiry*, 4,405-420.

Ronai, Carol Rambo. (1999). The next night *sous rature*: Wrestling with Derrida's mimesis. *Qualitative Inquiry*, 5, 114-129.

Rosaldo, Renato. (1984). 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On the cultural force of emotions. In Edward M. Bruner(Ed.), *Text, play, and 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 (pp. 178-198). Washington, DC: Americ an Ethnological Society.

Rosaldo, Renato. (1986). Ilongot hunting as story and experience. In Victor W. Turner &

Edward M. Bruner(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pp. 97-13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osen, Jay. (1994). Making things more public: On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edia intellectu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 362-388.

Ryan, Katherine E., Greene, Jennifer, Lincoln, Yvonna S., Mathison, Sandra, & Mertens, Donna M. (1998).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using inclusive evaluation approaches in evaluation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19(1), 101-122.

Ryle, Gilbert. (1968). *The thinking of thoughts* (University Lecture No. 18). Saskatoo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Sams, Ferrol. (1994). *Epiphany.* New York: Penguin.

Sartre, Jean-Paul. (1948). *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Sartre, Jean-Paul. (1956).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Sartre, Jean-Paul. (1963).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artre, Jean-Paul. (1981).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eler, Max. (1961). *Ressentiment* (L. Coser, Ed.; W. H. Holdeim,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2)

Schutz, Alfred. (1964). *Collected papers: Vol. 2.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wandt, Thomas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ndt, Thomas A. (1999). On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Qualitative Inquiry*, 5, 451-464.

Schwandt, Thomas A. (2000).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189-2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arle,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erman, David. (1985).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ociology: Describing the social world.* Brookfield, VT: Cower.

Simonelli, Jeanne. (2000). Field school in Chiapas. *Qualitative Inquiry*, 6, 104-106.

Sims, Norman. (1995). The art of literary journalism. In Norman Sims & Mark Kramer (Eds.), *Literary journalism: A new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merican nonfiction* (pp. 3-19). New York: Ballantine.

Smith, Anna Deavere. (1993).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Smith, Dorothy E. (1989). Sociological theory: Methods of writing patriarchy. In Ruth A.

Wallace(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pp. 34-64). Newbury Park, CA: Sage.

Smith, Dorothy E. (1993). High noon in Textland: A critique of Cloug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83-192.

Smith, John K., & Deemer, Deborah K. (2000). The problem of criteria in the age of relativism.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877-896).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ke, Robert E. (1978). The case-study method of social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7 (2), 5-8.

Stake, Robert E. (2000). Case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435-454).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nselm L. (1959). *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Strauss, Anselm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inger, Ernest T. (1996). *Action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udnow, David. (1978). *Ways of the h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udnow, David. (1979). *Talk's bod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aussig, Michael.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Tedlock, Barbara. (2000). Ethnography and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455-4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Thomas. Dylan. (1964). *Adventures in the skin trade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Thompson, Paul. (1978). *Voices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erney, William G. (2000). Undaunted courage: Life history and the postmodem challenge.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37-553). Thousand Oaks, CA: Sage.

Titon, Jeff Todd. (1980). The life 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3, 276-292.

Turner, Victor W. (1986a).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Turner, Victor W. (1986b). Dewey, Dilthey, and drama: An essa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In Victor W. Turner & Edward M.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3-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ds Press.

Ulmer, Gregory. (1989). *Teletheory: Grammatology in an age of video.* New York: Routledge.

Vaughan, Diane. (1986).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st, Cornel. (1993). Foreword. In Anna Deavere Smith,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pp. xvii-xxii). Garden City, NY: Anchor.

Wilkinson, Charles. (1997). Paradise revisited. In William E. Reibsame (Ed.), *Atlas of the new West* (pp. 15-150). New York: W. W. Norton.

Willis, Paul, & Trondman, Mats. (2000). Manifesto for *Ethnography*. *Ethnography*, 1, 5-16.

Wittgenstein, Ludwig. (1922). *Tractac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olfe, Tom. (1973). The new journalism. In Tom Wolfe & E. W. Johnson (Eds.), *The new journalism: An anthology* (pp. 1-52). New York: Harper & Row.